雪中足迹

Footprints in the Snow

圣严法师自传

圣严法师◎著
释常悟　李青苑◎译

第一本在大陆公开发行的圣严法师自传

圣严自传

Footprints in the Snow

第一本在大陆公开发行的圣严法师自传

在平凡中遇见大师的真智慧、真性情！

我今年七十七岁，我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这本书可说是我一生的回忆，乃印象及记忆所及……对我来说，个人生命中的细节是不足为道的，但对读者而言，或许会觉得有趣，可以将之作为了解佛理、感悟人生的书籍。

世间危脆，常处动乱；生死流转，犹如苦海。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宇宙的一次呼吸。遭遇一切烦恼，都要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我如今的一点点成就，是因缘际会的结果，我没有闪避，而心甘情愿去承担起来，因为我希望帮助别人离苦得乐。现在，是该放下的时候了。

——圣严法师

Footprints in the Snow

上架建议：人生哲学·人物传记

ISBN 978-7-5613-4619-8

9 787561 346198 >

定价：2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中足迹/圣严法师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613-4619-8
Ⅰ．雪…　Ⅱ．圣…　Ⅲ．圣严法师（1930～2009）—人生哲学
Ⅳ．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3526 号

图书代号：SK9N1017
上架建议：人生哲学·人物传记

FOOTPRINTS IN THE SNOW © 2008 by Chan Master Sheng Ye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han Master Sheng Yen c/o Gail Ros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雪中足迹

著　　者：圣严法师
译　　者：释常悟　李青苑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困于1984　辛　艳
装帧设计：张丽娜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8
版　　次：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13-4619-8
定　　价：28.00元

雪中足迹

Footprints in the Snow

圣严法师自传

圣严法师◎著
释常悟　李青苑◎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无限感念

圣严法师是一位伟大的人生导师，我对他的学养与智慧充满信心，也钦佩他在东西方推广佛教的贡献。能够身为他的友人，我感到非常荣幸。

——一行禅师

这本自传明确地告诉我们，即使生存在今天这么复杂的世界里，保持一颗知足常乐的心仍是可能的。这本书以一种既温柔又深具怜悯的口吻写就，亲切而动人，一如禅学本身。

——西尔维亚 · 布尔斯顿（Sylvia Boorstein）

《快乐佛法书》作者

2003 年初秋，常复师姐引荐，接起与师父殊胜的法缘；

2009 年小除夕，常复师姐叮咛，为师父的自传写序；

2009 年初九，常复师姐急电，师父已舍报圆寂。

圣严师父是末法时代大修行者之典范，

他老人家虽然什么也没带走，但留下一切的慈悲、爱与

智慧在人间。

回忆师父如此慈悲的智者，我又如何能用文字语言表达心中的感悟？

唯有推荐这本《雪中足迹》给大家，

请一起用心感受“人间净土”的境界。

——李连杰

出身贫困的孩子，发大愿，度众生。

法鼓山不是一年建造起来的。

圣严师父的执著与从容，给我启发，给我力量。

——林怀民

圣严法师，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带给社会向上提升的力量。

——张忠谋

无上甚深的妙法在圣严法师的手中传承，从中我们领悟心的力量，一份安定自在的美好。

——张淑芬

师父是正信佛法的先行实践导师，永植在我的内心世界。当我需要的时候，师父给我佛法、智慧，没有时间、空间和死亡。

——张辉明

一个平凡少年走上不平凡的宗教之路，成就人间佛学，照亮俗世，普度众生。阅读本书，如沐于大师智慧与慈悲的恩泽中。

——萧万长

他总是在人心彷徨不安时，即时提供安心的力量。

——严长寿

目录

第一章　芒鞋/013

第二章　敞开的门/021

第三章　狼山/033

第四章　上了天堂/053

第五章　超荐亡魂/065

第六章　一个和尚的教育/075

第七章　忠诚的军人/085

第八章　桶底脱落/097

第九章　自由了/109

第十章　棒下出孝子/117

第十一章　野生地瓜叶/141

第十二章　批评与害怕/159

第十三章　在日出之国/167

第十四章　前进西方/175

第十五章　吃苦/183

第十六章　流浪/195

第十七章　第一张佛桌/207

第十八章　山中禅/223

第十九章　鼓震东方/233

第二十章　圆满/239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248

序言

我是一个平凡的中国佛教僧侣，十三岁出家，今已七十七岁。我的一生宛如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缩影。

在此书之前，我的个人传记已有三册：有我自己写的自传，也有他人为我写的传记。我在三十来岁完成的第一本自传《归程》，记述我所成长的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动荡的中国社会；一九九三年，我从另一角度记述此生历程，写成《圣严法师学思历程》一书。这两本书的主要读者都是华人，在华人社会是受到重视的，尤以《圣严法师学思历程》一书，至今已有二十三万册的销售数字，算是一本长销的中文书了。二〇〇〇年，一位台湾文学女作家施叔青为

我写了一本传记《枯木开花——圣严法师传》，读者群也有很好的回响。

现在这本英文传记 Footprints in the Snow，是我生平的第四本传记。本书缘起于十年前，一位 Mickey Desend 先生来到纽约我主持的东初禅寺，跟我学习禅修，他在禅修过程中很受感动，又对我的一生充满兴趣，因此主动提出采访要求。一九九六年入秋开始，他一共来采访我十余次，每次现场都有录音。日后由于他的工作变动，自美国东部（纽约）迁往西部，我们的互动因此中断，而本书的后续采访，也就暂且搁置了。

到了二〇〇五年，一位服务于出版界的 Kenneth Wapner 先生，他在听了我的受访录音之后，非常感兴趣，主动写成一份出版计划书，问询 Doubleday 出版社为此书出版的机会，结果得到积极的回应。

今日此书即将出版，我要感谢所有与此书产生因缘互动的朋友，以及在访谈过程中为我居中翻译，乃至于在初稿完成后，在我与作者之间担任桥梁，为追究某些细节而一次又一次再采访确认的李世娟女士；她本身是一位大学教授，也是我的弟子，经常为我主持的禅修活动担任英文翻译。

至于此书与我过往的三本传记，有哪些异同？凡是述及我这一生所走过的人生旅程，那是无法变更的事实，必然相同，可是基于访谈者本身历练以及对于我这个人生平的兴趣，所发

问的角度与思索，便有不同；此外，访谈者的提问，也多多少少反映了读者所可能感兴趣的部分。

本书所呈现的内容，即访谈者对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我这一生所经历的特殊生命行旅，比如我多灾多难的贫困童年、年少因战乱饥荒而出家、当了十年军人、三十岁再度出家、我师父所给予我的严厉训练、山中闭关六年，以及我以小学学力赴日本留学而取得硕、博士学位，乃至日后我到了美国……这些过程全因采访者的好奇，一次次细问、追问，才让我答得更详细。否则对我个人而言，这些都是过往小事，实在不需再提。

可以说这本书的特色，就是从生活面角度呈现我这一生的生命经历，以及我所抱持的人生态度。换句话说，是作为一个跨越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僧侣，我所走过的困境，我曾历经的欢喜，和一个东方僧侣如何融入西方社会的历程。特别一提，某些经历是经由采访者一次一次地补充采访，总算满意，终于定稿。对此我很感激，也很佩服。

不过，由于两任访谈者都是西方人士，似乎对我从事的佛法推广和佛教修行的部分着墨甚少，乃至包括我的宗教师与禅师身份，在晚近二十年来之于东西方社会的影响、之于世界和平的努力，也很少提及；还有我在台湾、美国创办“法鼓山”禅修和文教体系，推动教育、文化、公益、关怀及佛教修持等

种种的工作，也因作者访问面向的选择，而被搁置在侧了。

最后，感谢出版社出版此书，也为所有读者祝福。

圣严

2006 年 12 月 14 日于纽约象冈道场

（编注：本文原为英文版所做的序，但英文版仅摘录部分，今由法鼓山文教基金会提供圣严法师当时所撰的全文，作为中文版序。）

自序

我今年七十九岁，我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西方读者或许知道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历史变迁，但不是那么熟悉。出版这本自传的动机是想与西方读者接触连结。这本书的内容与我前两本中文自传及另一本中文传记均不同。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是中文自传曾刊载的，大部分是新的。

这本书可说是我一生的回忆，由印象和记忆所及，所以不是完整的纪录，因为有李世娟及 Kenneth Wapner（编辑者）的采访，我才能追溯过去的经历。对我来说，个人生命中的细节是不足为道的，但对读者而言，或许会觉得有趣。这也是两位采访者不断地再回来找我访谈的原因，所以，我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 Doubleday 出版社出版这本书。

感恩、祝福我所有的读者。

第一章 芒鞋

我在一九三〇年，马年，农历的十二月四日出生，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幺，那年我的母亲四十二岁，父亲四十一岁。据我母亲说，我出生时，非常瘦小，没比小猫儿大多少，很多人还说我看起来像只田鼠。于是我的父母亲给我起了个名字——保康，永葆健康。

我出生的地方靠近小娘港，位于扬子江入东海的海口西边，我对这地方没什么印象，因为就在我出生几个月后，一场大水把所有的东西都冲走了，我们的家，我们的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消失在河里了！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知恩报恩为先，利人便是利己。

大水过后，我们先到南通附近的亲戚家暂住，接着搬到了上游，离海约一百五十公里，正对着南通港，一处名叫长阴沙的地区，父亲在租来的一亩农地上搭起了一间三间房的茅草屋，我们一家人就住了下来。

夏季时，白天很热，夜间则有河边吹起的

凉风，穿透芦苇编织的墙壁送进了凉意！冬季时，天暗得早，大雪把我们覆盖住了，用泥土把茅草的缝隙补起来御寒。如果有钱买灯油，就拿旧布条做灯芯点燃小石灯，我的母亲、姐姐们会在灯下做针线活、编织；我的父亲和哥哥们则在编麻绳和做芒草鞋。

我们全家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和衣而睡，床实际上是四支木桩支撑着的木板组合成，上面铺着干草，再盖上棉布被子。早饭是玉米或燕麦粥，有时是没有味道的，因为没钱买盐！

老幺的工作就是到田里捡拾动物在夜间留下的粪便。我把狗、马和驴子的排泄物铲到草篮里，再把铲柄穿过草篮提把，举起草篮扛在肩上，然后继续寻找下一堆粪便，铲柄上有个钩子固定着草篮的提把。这夜间的粪便，和我们的粪便（收集在户外粪坑中的大陶土罐中）就成了田中的肥料。

我的父亲和哥哥们是技巧熟练的渔夫，无论是撒网捕鱼，或是涉水走入扬子江的渠道中赤手抓鱼，都是高手。我们家在两个渠道中的一块土堆高地上，扬子江横跨整个地区，显得巨大、深邃及寒冷。在广大的天空下，这块地是那么的平坦。江边筑着堤堰，马路开在高土上，除了河堤上，看不到绿树，所有可耕地都种着谷物。

我们汲取河水灌溉农田，一个人骑踏在水车上，稳定地踩

着踏板，通过大轮子的转动，将盛在轮片间的河水输送到田里，水牛帮我们犁田，像是朋友般，所以，我们从不认为它们是食物。我们不曾拥有水牛，唯一的一头还是借来的！

除了捡拾粪便外，我还要拾草喂猪与羊，喂猪的草要先煮过，羊可以吃生的；除了草之外，我们别无余物可喂，我们饲养、变卖牲畜，换取盐、糖、油、布，我们很难得吃到肉。

我的父亲和哥哥们也常到外地为其他地主工作，他们带着午餐以及在田间炊食用的锅盆，一早离家上路，带着的工具有形似板球短槌的短柄铲子、镰刀，用来挖掘黄豆根茎的铁钩子及装土的竹篮子。耕种的作物有黑麦、棉花、黄豆、稻米、小麦、蔬菜、红萝卜、瓜类、花生，及做药用油的百合花苞。

在家里，我们燃烧棉花及黄豆的枝梗，生火炊食，厨房的台面是用黏土覆盖砖头砌成的，使用的餐具是筷子及用来盛着一天三顿粥的粗糙陶碗，陶碗粗重到即使掉在地上都不会破裂。午餐和晚餐，我们会在浓粥中加入地瓜和腌渍菜。发酵过的咸味萝卜干加在平淡的粥中增添了美味，是难得的佳肴。

我们物资贫乏，工作辛苦，但在记忆中，一家人过得很快乐。我的父母亲是完美的结合，从来没有看过他们争执、吵架，主要是因为我的母亲，她是一个非常聪明、有能力的人。我的父亲只要去田里工作，提供家人食物与金钱；而我的母亲

则支撑着整个家，主导着我们的生命。我的父亲非常感恩我母亲，他接纳了母亲的坚强与力量，而我的母亲则以敬爱回报他。

他们之间真诚付出的相处之道，深深地影响了我，每当我与人互动时，我会学习着与他们和谐融洽地相处，就像我父亲对待我母亲一般，他的行为、想法和心意，皆受到她的智慧与意志引导。

七年后，我们再次搬回长阴沙，我目睹了洪水带来的灾害，虽然我们住在几里外的村落，未受到直接的伤害。我记得有一回，天空下了一个多月的雨，台风接连地来，风不停地起、不断地飚，雨则是绵密地厮打着。经过几天的狂风暴雨，天空暂时放晴，接着又不停地继续下起雨来，如浪潮般的雨，浸湿了一切！一星期后，长江水位开始上涨，河水蔓延到边上的土地，水位上涨的速度愈来愈快，土壤与绿树全被吞噬，江边堤防也被冲断了。我们不再需要那踏水车的人来引水灌溉，田里处处充满了鱼！

当台风终于停止，风也歇了，父亲带我去探访二姐的家，虽然他们的房子还在，但是在堤岸外的土地却全部消失了，在洪水退去的地区，其他人家也只剩下残留的茅草屋顶。被冲毁的东西漂浮在水上，饿得半死的狗和猫啃噬着残骸，人的尸体

在水波上浮浮沉沉。他们的衣服全部被扒光了，躯体开始肿胀、腐烂。

男尸面朝下漂浮着，身体弓起来，只有背部露在水面。我猜想可能是他们的肚子比较少脂肪，但从来没去证实过。女尸多数是面朝上漂浮着，头后仰，头发散乱，两脚垂在水面下，他们身体也弓着，只是肚皮朝上。小孩的尸体则吹胀得像河豚；惨白的肚皮浮肿，披着像麻疯病患者的鳞状灰色背皮。鸭子们啄食着他们眼球。

雨终于停了，艳阳高照，腐烂的尸臭味弥漫着整条河水。这真是个悲惨的经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在夜半噩梦中惊醒，生命的脆弱让人如此震惊，不只是成人，连孩童都感受到了。我亲身目睹的惨象，就像释迦牟尼佛证悟的道理一样：世间危脆，常处动乱；生死流转，犹如苦海。

那时，我全然没有宗教信仰。站在那令人作呕的江边，看着一具一具的死尸漂浮着，我霎时领悟到，任何人随时都可能死亡。如果我们是住在那一区，我们也已经死了，看着那么多的尸首，生命无常的观念就印在心中。然而，我感受到能活着是那么美好。在这场撼人的惊吓中，在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是恐惧，而是生命是美好的，我们应该珍惜它！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残骸带来的恐惧逐渐褪去，取代的是

接纳的心！在这幼小的年纪，我已领悟了当死亡来临时，我们无计可施，只有无条件地接受它！

在这一生中，我经历了许多的死亡，来自于战争、饥荒与病疫。我现在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很快地，有一天我也会死去。在这场洪水中，我所领悟到的道理仍存于心中，我知道担心死亡是没有用的！

重要的是在死亡来临之前，好好地、全力地过生活。

第二章 敞开的门

孩童时代，我常常生病，身体羸弱。三岁时开始走路，五岁才会说话，学习事物非常缓慢。家中的墙上有个吊钟，我的父母、哥哥、姐姐们都教我如何看时间，但这对我来说太难了！记忆中，那些箭头指向四面八方，像密码般的奥妙与难解，让我很困惑。我爱吃西瓜，但五岁了还不会说“西瓜”，只知道西瓜必须切开才能吃，所以，叫西瓜为“开开”，家人认为我长大后，必是一个傻瓜。因为我很迟钝，所以被分配到不用大脑的工作，就是去照顾羊群，我实在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带羊儿去溪边或到另一处水草肥沃的地方后，就任由它们去！

回家后，妈妈问我：“羊儿呢？”

我回答说：“它们要吃草，不想回来。”然后，我的父母就必须去把羊赶回来。最后他们决定，我只需要去拾草喂羊就好了！然而，这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尽心尽力第一，不争你我多少。
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

对我而言也太难了，这些山羊是挑剔的，只吃一种草，我也不清楚是哪一种，常常抱了一束草料回家，它们碰都不碰。

多数的时间，我没有玩伴，独自一人玩耍，我的父母兄姊在醒着的每一刻都很忙。白天时，我会跑到麦田里，躲在那儿，特别是扁豆栽植区。扁豆的花很香，豆子又是唾手可得的零食。我不知道我们家的田与别人家的有区隔。记得有一个夏日，在浓密的树阴下，我懒洋洋地躺在温暖的泥土上，做着白日梦，顺手就在低垂的茂叶中摘下了豆荚，突然间，一个陌生人把我从那惬意的小天地中揪出来，用严厉的口吻质问我在做什么？我吓到了，原来我不经意地游逛到邻居的田里。那天，幸亏哥哥解救了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踏进家门，母亲从炉灶旁转身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做贼？"那一刻，我羞愧地低下头来，害怕得浑身麻木。

小时候，父亲的房子只有二间房，四壁是芦苇做的，天花板很低，也是芦苇做的，大人们很容易就可触碰到。竹子做的梁架支撑着天花板，梁上吊着铁丝可以挂蔬菜。在稍有斜度，泥土与稻草做的屋顶之下、天花板之上，有个低矮的空间，是存放物品的地方。房子的大梁与横柄用的是木材，支撑四面墙

的柱子则是粗的竹竿，大人们站在餐桌上就可轻易地触摸到屋脊。每年春天，我们在屋顶上种植各种瓜类，夏天时瓜熟累累，像彩饰般地垂挂着，装点着房子，带来了生气与活力。

卧室中有四张床，一张是父母与我睡的，另外三张是哥哥和姐姐的。哥哥们睡的并不是真正的床，而是放衣服与被褥的箱子。姐姐的床是用竹条编成的。唯一一张真正的床是父母亲与我睡的那张木板床，床角有四根柱子，连结着四条横枝，上头挂着蚊帐。

餐桌很简单，旁边是一个小灶，四尺长二尺宽，只能放一大一小两个锅。灶的后头有一个烟囱，烟囱的右边，在离地四尺高的地方，安置着灶神，是我们家的神祇。

夏天，在层层茅草的屋顶下，屋子是凉爽的。我时常会怀念那种茅草芦苇屋，充满着夏日田野的气息。是一种在穹苍下，河流环绕的沃土中，所散发出的土壤气息。

母亲亲手缝制我们的衣服，从自种棉花，到纺成纱、织成布，再裁剪成衣服。她的这手好手艺，至今仍让我赞叹不已。

我穿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留下来的，轮到我穿时，已添上了由父亲的旧衣缝补的补丁。因为我个子矮小，哥哥们的旧衣都太大了，穿在身上就像是个小侏儒穿着巨人服一样，而我的母亲不肯替我修改，让我非常气恼。记得有一年，过新年时，她

又给我一件不合身的上衫做新衣，我气愤地说："为什么我老是穿旧衣，而别人都有新衣穿？"

她回答："这是新补过的，所以也是新的，能让你保暖了。"

棉花籽油和蔬菜籽油都不是我们能享用的炒菜油。我的妈妈和姐姐们只能收集木屑和芝麻花，打碎浸在水里，再过滤出来做发油。母亲没有用过化妆品，只有当她那双操劳的双手冻裂时，才敷上茉莉花香味的冻伤膏。当她帮我穿衣时，冻伤膏的香味扑鼻而来。如果她的伤口大到连冻伤膏都没用时，她会拿草药敷在患处。

九岁那年，真是料想不到，我居然上学了！一位博学多闻、会算命、看风水的老先生，把我找到他的私塾去念书。他劝服了我的父母让我受教育。教室就在他的家中，一间放了二十张桌子的房间，我没有书包，就拎了个篮子，装着毛笔、墨汁、砚台及纸张。但是在我上学的配备中，最重要的是那个竹子编的午餐盒。

上学的第一天，为了表示我的敬意及求学的愿心，因此必须向老师行跪拜礼。这位老先生给每个学生单独授课，而不是全体一起上，他教我如何写字。我描画着一些字，像是"上大

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这些都是笔画简单的字，意思是："孔夫子是大上人，教育三千学生，七十名成士大夫。"我摹写并复诵着这些字，其他的学生有不同的字句，教室里充满着复诵的嘈杂声，而老师无视于这嘈杂声。大声朗读地强记、复诵法是中国乡间传流的教育方式。当我们遗漏了字句，老师就会请我们吃"板栗子"（拿手关节敲我们的头）。我老是被敲，虽然常常是记得的，但是因为太紧张，所以念不出声。半年后，我已经会念三字经了，但那时老先生的健康逐渐衰坏，没办法再教下去了。

一个年轻人抓住了机会，开了一间私塾，把老先生的学生，连我在内，都接收去了。我们读《大学》，这是儒家的经典之作。但上学途中，我常常被拦下来拉去玩耍。当老师问我："为什么迟到？"我就撒谎："家里忙，需要我。"午餐时，我又撒谎说："要回家帮忙做事。"就跑走了。实际上，是我已经和朋友们约好下午去玩。有时候，我整天都没去上学，我从家里带了午餐盒，跟一群朋友去玩耍，吃完饭后再去找另一群朋友玩，直到有一天，被我母亲意外地撞见。

她说："我们家是多么地辛苦才能送你去上学，我希望你能成功，飞上枝头，但你却白白浪费这机会。"她痛揍了我一顿，而且哭了。我可以感受到她是真的伤了心，对我失望，接

着我也哭了，流下了疼痛与羞愧的眼泪。

我边说边流泪："我不要去上学，也许我再也不回去了。"

我不是一个不求长进的小子，不想上学的原因是，对一个十岁才开始识字的小孩子来说，老师教的东西太难了。挣扎地铆足全力去读一本我根本无法了解的书，得到的却是羞辱与挫败感。

我又回到田间与哥哥们一起工作，继续拾粪便。比起读《大学》这本书，捡粪便真是太容易了，只需要靠我的鼻子。但如果要拾牛或羊的粪便，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那些农夫们会自己拾了去。那些粪便是我们种花、种麦、栽植豆子的肥料。我也采拾野菜，有些野菜也生长在纽约市的中央公园内，我常想，长在那儿没人吃真是可惜，它们还真美味呢！除了拾粪便、摘野菜外，我也帮忙父母在夏季时种稻，冬季时种麦，春夏天种豆与蔬菜。

记忆中，无论任何季节，再怎么努力耕种，收成永远不够我们吃。或许是因为盐、糖、油都太昂贵了，而政府又控制供应量的关系。有时一百斤的麦子才换来二斤的盐。大部分的盐与糖供给了军队，政府会配给一斤的糖给产后的母亲。当母亲没有母奶可喂食新生儿时，可以用糖水来代替！

十岁那年的年底，我遇见了第三位老师，他是我们的邻居，一位二十多岁的中医。因为他的病人不多，就开了间私塾教学生。他的太太也来帮忙，我们几乎有了两位老师。我终于进了一间好玩的学校，也学到了东西。这两位年轻的老师真心地关怀学生，在我入学的头半年，已完成了二年级的课业。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我的邻座是一位比我小一岁的女孩，她的家里开着糖果店，每天都会带一粒糖果来学校，偷偷地塞给我；她不跟其他孩子玩，只跟我玩。后来她生病，就没来上学了。不知道是想念她，还是她的糖果，我期盼着她的出现。但等她真的回来上课时，她的一只眼睛却瞎了。因为她变得残缺，我觉得难堪，所以拒绝她继续坐在我旁边。她因而受了伤，再也不来上学。这是我一生犯下最糟糕错误中的一个。内疚啃噬着我，忏悔也无法弥补我的过失。

我跟着这位老师读了一年的书。然后，内战爆发了，不停地打仗。孩子们上学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后来学校也停课了。

上课时碰到打仗，我们就躲到桌下，用毯子覆身。如果在家附近爆发了战斗，我们也是同样地应变。枪声彻夜响个不停。后来，我复学了，跟另一位老师读《大学》。这次不同了，

我意识到如果不读书，不会有前途，因此，我发奋学习。我记住了整部的《中庸》,《论语》及半部《孟子》，至今仍记得书中的每一个字。

上了几年的学校，我也会记一些简单的簿记。写一封信，至少要念三年的书，在我的家乡，那已是相当难得的事。老师通常是当地能写书信的人，不过，当时上海西边的长江平原很少有人离乡背井，所以也没有什么需要写信。

我的大哥住在上海，在一间供应饮用热开水的店工作，还兼拉人力车。每隔一年，他会请人代书，写信寄钱回家。当我们接到信时，必须付钱给一个识字的人念给我们听，然后再花钱请人写信回复哥哥，告诉他钱收到了！

信不是直接寄到家中，而是寄到镇上的一家米店。镇上的每户人家都在这家米店买邮票、寄信和收信，偶尔我们会到店里查查看是否有信件。远距离的紧急通讯非常困难。如果是急件的信，我们会烧掉信封的一角，米店的工人会立刻送信来，当然收信人必须为这项服务付费。今天我们的信件寄送量这么多，真是件了不起的事！

小时候念书的故事说得很多了，不再赘述，只再说一件。我继续努力地求学，进了一所新的小学，校名就是我们小镇的

镇名——“乐余”。学校是一位当地的地主营办的，离家半小时的脚程。

学校要求穿制服，而我的父母负担不起，我还是被允许入学了。但没穿制服的人必须站在班上同学的后面，而且不能参加庆典集会。

我乞求母亲：“请帮我做套制服吧！”

她说：“这是西式服装，得用特地的布料，我不会做。”

我低声地说：“那给我钱买一套。”

“我们没有钱，我们甚至连给你买双鞋的钱都不够。”

我通常是赤脚上学，但我仍然不死心地一直央求父母亲给我一套制服，他们对于无法满足我的要求，心里很歉疚。

早先的强记读书法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学校的教材，我轻易就能阅读，也成为班上的优秀生。有一回考试，好几个同学没考过，被叫到老师办公室，一个一个重考。老师问一个问题，学生接着回答。我站在敞开的窗外聆听，学生在窗内站着。我轻声地将答案经由敞开的窗户传送过去。这样子第一个学生通过了。轮到第二个学生时，我仍轻声地讲出答案，但他害怕地僵住了。老师发现了我的行为，用戒尺打我的手心惩罚我。

虽然学校给我奖勉，免收我念五年级及六年级的书籍费，

但我们实在太穷了，我不得不辍学。家里需要我去工作，才能维持一年到头仅能糊口的日子！

当日本军队初抵镇上时，父亲和哥哥们看到他们用刺刀杀人，也听说妇女被强暴，甚至有些孩子也被杀害。残杀持续了几个星期，当日本人确定居民都屈服了，才停止暴行。

我们家不起眼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偏远的路上。当日本人来到时，邻居的女孩，以及逃到乡下避难的镇上妇女和女孩们，都躲到我们家来。因为他们过惯富裕的生活，所以我们把床让给他们，自己则睡在饭厅泥地的稻草堆上。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是远亲介绍来的。

因为屋内太拥挤了，白天大家都待在屋外，由一人负责警戒。如果她看到日本军人，大家就跑进屋内，抱在一起，一起持诵观音菩萨及佛的名号。那时虽然年幼，对佛教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却观察到有趣的现象，当危险一过，人们就停止念诵佛号了。

日本军人的出没是可以预测的，他们每天在同一时刻出现，而且不会检查像我们家的小房子。我的母亲开启大门，接纳了这些女孩，就像母鸡张开翅膀保护小鸡一样。虽然我们很穷，仍能帮助人，提供他人保障与庇护，母亲的喜悦与骄傲仍

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我对日本军人非常畏惧，即使在我被征召去服劳役后，这种感觉仍持续着。日本人一定要我们家派出一个人，而所有的大人都必须到田里工作，所以我就去了。我做着防躲炮弹的洞穴及防御建筑的工作，并在日本军队住宿的民宅四周搭建围墙。

那时我对敌人是没有慈悲心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不是活佛。直到出家做了和尚，我才知道什么是慈悲。如同往常般，母亲是家中的定心石，她没有过度的焦虑或害怕。她认为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努力去做，用心去找。我现在清楚地看到，她的智慧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地影响了我，塑造了今日的我。

第三章 狼山

母亲也接引我接触了宗教的生活。她是当地观音会的一份子，她们每年聚会三次，约有二三十名妇女一起持诵观音名号。“大悲观世音菩萨”听闻、解救众生的苦难。母亲如同多数妇女，不识字，所以他们低声唱诵着简单的观音颂文。

那些妇女们要我加入她们的行列，因为大家普遍地认为小孩子的心灵纯净，没有被不良的念头，如贪婪污染，比起成年人来，更能进入心灵的修持。我认为母亲在微妙的潜意识中，希望藉由持诵观音圣号，引导我进入宗教的殿堂。

我跟着唱诵了。一个骨瘦如柴、竹竿似的小孩在一群穿着厚重棉袄棉裤、体格硕壮的村妇中，努力、笨拙地学着她们的声调，引得大家都笑了！

我们晚上聚在不同人的家里，点着油灯，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忙人时间最多，勤劳健康最好。
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乐。

围着木制圆桌，坐在木板凳上。桌子中间放置着观音雕像，前面供着香、烛、果。

他们持续不散的笑声激励了我。我渐渐喜爱上了唱诵，常在做杂务或走路时这样做。我一点都不意外，日后在我成为出家人时，礼拜观音菩萨成了我的主要修行的法门。我自认在前世种了一些善根，所以今生在孩提时就能持诵观音圣号。与观音菩萨的这段因缘，延续至今，是我一切所作所为的根基。

除了持诵观音圣号外，我也随着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参加了理教的聚会，他们是主要的理教教义支派。理教常被称为"如理之教"，结合儒家、佛教、道教，崇信观音。

理教的始祖——杨莱如，结合明代遗民企图推翻满清。明代的高官大臣被邀请入清为官，但都拒绝了。有的做了和尚或隐士，有的则以宗教之名成立了地下组织，希望能秘密进行推翻满清的工作，这情形持续了几百年，一直到一九一一年，中华民国成立，理教才成为公开组织。

理教的集会在能容纳数百人的大演讲厅举行，正好也是镇上的行政中心。一座观音的雕像在大厅内凝目注视着。观音是理教的表征，所以我从来没想到理教与母亲的观音会有任何不同，因为二者都信仰观音菩萨。

信众们听开示，持诵观音圣号，大厅内的气氛祥和，感觉上，信众们的关系比家人还亲密，大厅的观音雕像使人犹如置身寺院中。有茶、果、餐点供应，禁止肉食、烟、酒。每个人都穿上好衣服，仪容整齐，行止得体。那儿没有阶级的区别，彼此平等地对待，然而回到日常生活中，富人蔑视穷人；稍好一些的，也会表现出十足的优越感。我还小，听不懂开示，但是食物讲的话，我都听得懂，我喜爱那儿的食物。这些聚会让我感到安慰与沉静，但我不觉得长大后，想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的另一类宗教的经验，是佛教的出家人及道教的道士来村里驱魔显灵。我好奇地观看这些奇异的事件。一个出家人，能帮助死去的人，从这个世界通往下一个世界，真是太奇妙了！这些仪式很美丽，且充满尊严与不为人知的魔力。

驱魔过程中，道士们持剑扬幡起舞，弯身起腰，抖动双臂，振起袍袖，横扫空中，刻画出种种弧度与圆圈。笛管同奏，伴着鼓声，形成了一片缭绕、多彩多姿的喧哗景象，这对我们这些村野乡民而言，可是上好的声色娱乐。道士们挤压精神异常者身上的穴道，使得他们身体扭曲、发出尖叫，意味着恶魔已脱离了他们的身体。道士驱魔，会在泥地上用硃砂笔画符号，戏剧化地跳起来，挥剑斩魔；或者打出手势，起身跳

跃，吸出恶魔，装入瓶内，千年囚禁，除非瓶子破了，恶魔逃脱。我被这些仪式吸引住了，我希望能当场看到魔被驱出，神灵进入他方世界，跳舞、欢唱及圣赞。

一九四三年的夏天，邻居戴汉清在一个雨天来访。他忘记带伞，全身淋湿了，我们给了他粗麻布把脸上及头上的水擦干。我从一个泥土色的陶制大茶壶中倒了一杯我们天天喝的凉麦茶给他。他坐下来欣慰地啜饮着，礼貌地寒暄、问候家人，然后他问我："长大后要做什么？"

那时我十三岁，清楚知道求学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双亲无法负担学费，更别提买课本了！我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他，母亲也陷入迷惘中，不知答案。终于，母亲说："无锡附近有户人家，要他做女婿，他们有田有产，不过女儿不会说话。保康是我们的幺儿，我们不能遗弃他，他是个好孩子。他以后长大了，我们不会有足够的钱给他娶房媳妇，他真是投错了胎、生错了家。"

"不会这么糟的吧！是吗？保康。"戴先生讶异地看着我，我常和他儿子一块玩耍，所以我认得他，他也认得我。家人敬重他，他常旅行到河的北方，我们认为他是位见多识广的聪明之士。他蓄着短发，没有猪尾巴，在我看来是非常时髦、亮眼的。

"噢！不会吧！"我礼貌地回答着，以一种特有的轻松态度，不把困难当作一回事，其实我只听到一半而已，因为我的心早已掉入悲惨的臆想中，想着娶了一个又聋又哑、又不会写字的太太。母亲合计着这桩婚事，说："那你俩怎么沟通啊？将来生了孩子，你还得照顾他们。"我感激母亲没逼我娶她。

那时候，父母安排的婚姻比比皆是，媳妇娶进门，夫家的父母要给女方的家庭一笔聘金，并支付婚礼费用、购买新人的家具。而我的情况，我是要入赘，招入女方的家里，因为我的家太穷了！

母亲开玩笑地说："干脆送他去当和尚好了。"戴先生看起来有些错愕。

"您真的愿意让他去当和尚吗？"

"为什么不？只要他愿意就行。"她转向我笑着说："保康，你想当和尚吗？"

"当然好了！"

母亲哑然无语，最后，她回答说："你真是太调皮了！哪家寺院会要你呢？"

戴先生对我说："狼山要找人出家，你愿意去吗？"

"当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虽然对出家做和尚一无所知。从我所听过的故事中，印象中的狼山是仙人聚集之所。

事实上，戴先生与狼山广教寺的和尚们交好，他知道他们想吸收新血，却不愿送他的儿子去那儿，因为他只有一个儿子，必须继承家祠。我们家有四个儿子，所以他想到了我们。事实上，他就是怀着这个目的，在那雨天来访。

戴先生向母亲要了我的生辰，拿去给狼山的和尚们，请求佛陀应允，才能接受我出家。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请求是必须要把我的生辰放在狼山的开山始祖的塑像前。一晃眼六个月过去，他们在开山祖师像前询问这个孩子是否能成为一个好的和尚，接着占卜开始，寺院的方丈摇晃着一个竹筒，筒内是刻着预言的竹签。筒的顶端有个洞，大小刚好够一支签滑出。筒子翻过来，洞口朝下，如果连着三次，都是相同的竹签出来，那么这孩子就被接受了。竹签上的数字必须与佛经上有吉兆的偈子相应。要符合这么多变数，有人会被选上，还真是奇事了！

今日在我的寺院中，我们不行此法，那些在适宜年龄内，想成为比丘或比丘尼的人，须经过一年的观察适应期，才能落发出家。我们要知道他们入僧团的动机，了解他们的背景，譬如说，如果我们发现一位发心出家的人曾犯过罪，那我们就不会接受他！这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决定，也不是怀疑他的真诚恳切，或是他是否准备好了、适宜过出家生活，而是警察迟早会抓住他，因而损坏了寺院的名声。精神异常的人也不能出家。

但如果是出了家成为僧团的一份子后才精神异常，那我们会照顾他。

当时，我的双亲以为戴先生在开玩笑，没再提狼山的事了。但我一直在等着回音，常常在夜晚收集粪便时，朝向北方看着远方的云层，以为狼山就在那些云朵后面，臆想中的广大自由，让我渴望成为一个和尚。

夏天过去，秋天来临，就在我即将放弃的时候，他出现了，刚从狼山回来，一踏进门就对我说："穿好衣服，做和尚去。"

我兴奋地跳了起来，准备离开我的家、俗世生活及充满辛苦的日子，但母亲震惊地要我延迟离开，她告诉戴先生："他需要制新衣。"

戴先生回答说："现在先让他去，看他是否喜欢那儿。"并不轻易妥协。"他可以以后再决定是否要成为一个和尚，最重要的是他是否能习惯那儿的生活、那儿的老和尚是否喜欢他，那时再来谈新衣吧！狼山的和尚们是财神。当他们下山来时，就像是从金银宝山下凡来了。你不用担心衣服或其他的东西。"这让我母亲无话可说。狼山以香火闻名，燃着的香从未断过，钱财也不停地滚进。做和尚不是件体面的事，娶不到老婆的男人或是被社会遗弃的人有时会入庙出家。不过，狼山是有名望

的。那儿的和尚受到良好教育，当时社会看重教育，我的父母被这个前景诱惑着，期盼我可以在狼山受到他们所无法提供的教育。他们也无法让我娶一个媳妇，所以他们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全家人等待着戴先生的来到。我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已经结婚了，住在别处，仍赶来与我告别。家中弥漫着特殊的气氛，我非常的兴奋，编织着以后在狼山过日子的美梦。母亲仔细地注视着我，对我的兴奋若有所思。

“你要去做和尚了，你一点都不难过吗？我养了你十三年，你不会想我吗？你不在意离开妈妈吗？我可是会想念你的。”她擦掉眼泪，“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穷……但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母亲不是爱哭的人，我也不是。但我没有像她一样的难过，让她很受伤，所以她哭了。几乎是极端不情愿地，我意识到自己在解读她沾着泪水、沮丧的面容，她才五十出头，仍然充满活力。她的头发粗而黑，健康而有生机地从头上的小圆帽中迸散而出，但是她的双颊及额头留下了艰辛、清苦生活的纹路。当我下次见到她时，不知她会老成什么模样？离棺木多近？她给予了我这么多，我知道我是无法完全回报她的爱。这时我的泪水也流了下来。

那是一个爽朗的秋日早晨，八点钟我们离开家了！疏松的云层滑过天空，当我们靠近长江时，听到渡轮传来的汽笛声，这不是我第一次渡河，每年我们都会渡河去探访北边的亲戚。戴先生从口袋里掏钱出来付了船费，一方面是帮助我们家，另一方面，因为他是狼山的忠实信徒，帮忙寺院寻找有资质的人来出家。

长江有十公里宽，横跨大片波浪起伏、风势强劲的水域。这艘渡轮是木制的船，没有引擎，挂着一片老旧与露出缝线的风帆，可乘载五十名乘客，但那天只有三十人。乘客们从摇摇欲坠的甲板上，笨拙地爬上船，带着包袱与装着食物的篮子。一个小女孩拎着一只鸡笼；一个下巴留着白色山羊胡的老人奋力地吸着已熄灭的烟管，灰蓝色的眼睛覆着一层白色薄膜。赤着脚的船夫们像只猴子，在缆索旁跑来跑去，细瘦的腰上以裤腰带系着裤子。他们吆喝着、吹着哨子，抛开船绳。其中一人拿着长竿子，站在舢板上，把船撑开。岸上喧哗顿起，送别的人挥手道别。风帆升起，在微风中狂野地飞舞，被风灌满的帆，犹如鼓面般紧绷着。这艘平底船微微晃动着，接着加把劲，昂首破浪，切入长江中。河水的味道弥漫各处，海鸟列成弧形，掠过头上，在强风中，奋力前行。海风迎面吹拂，将母

亲和家抛诸脑后了，随着顺风前行的船及划过天空的云，我感到无限的自由和面对新生命的喜悦。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过了江，在任家港靠岸。整个镇在海港后边展开，低矮的房屋参差林立，夹杂着狭窄多灰的街道，燃煤的公车行驶于南通与海港间，我们没有什么行李，所以决定步行。顺着河流往南行，我们走在泥土路上，伴随着载货人力车，摇摇晃晃的老卡车，偶尔出现带着煤渍痕迹、挤满乘客的公车，稀少又令人羡慕的拖拉机，以及拿着芦苇秆赶着哭泣羊群的小孩。

就像无数贫穷的百万百姓般，我们赤着脚走着，负着微薄的行囊，妇女们背着成捆的柴火，用水草绑在背上。太阳高高升起，天气变得暖和了，戴先生和我沉静下来。我们绕过兴盛、工业化的南通市，继续北行。狼山逐渐从平地上耸立而出，横展在眼前；山势盘旋上升，接近云端；岩石峭壁，浓林密树，灰色石瓦的庄严宝塔点缀其间，犹如神话。我们穿过三门，走向一尊又大又胖的笑面弥勒佛。“哇！这么巨大、开心的佛像！”但当我走过再回过身来看时，背对背的是一尊韦陀菩萨，这座护法大菩萨就像一个穿着盔甲的将军，手持短杵，可将骨头打碎，我的念头随之而起：“真有这样相貌凶恶的菩萨吗？”

在我们进入大殿的两道门后，我简直不敢相信眼睛所见到的，巨大的佛像几乎是家中的一百倍。我仰起头来看他的脸，戴先生告诉我佛像上堆积的尘土，一年有十二桶之多。（多年后，我再回到狼山来时，这尊佛像已在文革时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尊小的仿制品。）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沙弥撞了一下钟后，在佛前礼拜，诵着“南无九华山地藏王菩萨，地狱之师”。他的声音美妙、清朗，将我带入了另一个世界。我心想：“这就是我要待的地方，我将来也要像他一样。”这位年轻的沙弥，拿起木槌敲了一下铜质的大磬，另一位沙弥则在佛前拜下。戴先生说：“仔细地看他拜，学起来。”然后教我学会如何礼拜，但我没有注意看。不知怎么地，那位正在礼拜的小和尚头顶上的圆形发髻，吸引着我无法移开视线。他好像是个演员，或者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修士。我希望自己也能变成那个模样，但那是不可能的，我后来才知道，那种发型是年纪更小的孩子的专有发型。

我以为已经抵达了，但戴先生说目的地是在狼山顶上，我们又再往上爬，陡峭的小径旁，陈列着石碑，刻着来访知名文人的名言、书法及佛经。我们路过如餐桌面大小的石龟，龟甲上嵌着纪念的文字。各式各样的庙宇罗列在缤纷的枫红秋叶中，有道教的庙宇，供奉着关公、财神爷、护眼神、保长寿的

北斗星神，还有长江河神。

人们在家中，朝着狼山的方向膜拜，向着狼山的守护神——慈悲的大圣菩萨祈求。人们相信，大圣菩萨会指示其他的神明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当他们的祈求灵验时，善男信女们会回到山上来还愿，盖塔立像。

一路上，除了碑塔外，食铺林立，卖着多汁的肉馅或红豆馅的热包子、杏仁饼、蛋塔及姜糖。戴先生买了块蛋糕给我，真好吃。我们还喝了茶！途中遇到乞丐，多数都瞎了。他们伸出手掌，手指扭曲颤抖着，口念佛名地祝福我们。空洞无神的眼窝，向我投射出哀求。朝圣的队伍也在道路上，个个手臂纤细、身材清瘦，褴褛的衣衫和零乱的头发上，沾满了香火气味。

我们终于上到了山顶。明亮成片的阳光和云团如画般地渲染着山峰，这儿凉爽多了！我们进入了洞穴般的佛殿，暗处燃着烛火，香烟缭绕，空气中浮沉着千年的信仰与祈求。另一尊巨大的佛像占满了这间殿堂，庄严地散发着闪亮的金光。香、金橘、荔枝、苹果和铜钱都放置在佛像底部。朝圣者在礼拜，前额触碰冰凉的石头地板面。和尚们在大殿走动，身上的长袍发出窸窣的声音，忙着他们的化外事务，以一种超然而神圣的慈爱心，看着进行中的活动，照料着全殿的气氛。

孩提时代，村野送尸和驱魔仪式中，所遗留的戏剧化欢乐气氛，已在此地净化为强力的安神妙药。数百年来，人们亲吻这片地，代代的僧众在这庄严、历经岁月的圣殿中，进行着相同的宗教仪式。天庭高悬，围绕的彩梁画柱上，沾染着烟熏黑渍，那是虔心供奉的香火，在狼山上的殿堂中不停地燃烧着。

戴先生告诉一位着灰色长衫的和尚，我们要见方丈，和尚消失在大殿的灰暗中，戴先生到佛前礼拜。几分钟后，他回来告诉我们方丈在他的房间内会见我们。我们跟着他穿过苔石，走着穿过上上下下的弯曲小径，过了一扇又一扇的门。山上长满了各类的树，鸟儿们在枝头跳跃；秋天的树叶缝间中露出了红墙灰瓦的寺院楼宇，屋檐的四角向上翻翘，像是鸟的双翼。我从未看过这么多的房间、屋宇、优雅华丽的建筑，渐渐迷失在其中了。最后，我们走入一间喧哗着的室内厢房，当所有的僧众一看到我时，都停止了谈话，抬起头打量着我。

其中一人问戴先生："这就是那孩子吗？""是啊，就是他。"这位和尚示意，"来！让我给你介绍，这是开山祖师，这是曾师祖，这是师祖，我是你的师公，你的师父今天不在。"我的师父是另一位沙弥，比我大一岁，我们住同一寮房，我们每天四点起床，晚上十点才疲累地爬到床上。头几个月的寺院生活迷糊地过着，我只依稀中记得，自己曾看顾园中的蔬菜，殷勤

地接待访客，期待他们多捐点钱，并照看着乞丐们，不让他们伸手入功德箱拿钱。

我们诵经，做早晚课。只有年长的僧众打坐。他们说我有许多的业障，必须拜佛忏悔，因为有这么多业障，我才记不得课诵的经文。我以为是我的记忆力不好。三个半月后的一个经验，证明了他们是对的，也让我完全地投入狼山的生活！

我每天早晚在观音像前礼拜五百拜，这位观音菩萨就是我和母亲一起持诵的大悲观世音菩萨。通常，我拜得很辛苦，汗流浃背。一天早上，就在例行的礼拜中，我感受到一股力量从顶门而入，贯穿全身。接着的拜佛动作自然而毫不费力。动作持续着，但我的心已不再指挥着身体去拜。我感受到全身清凉、清新，我的心也明亮、透彻起来。好像菩萨降临，赐予我什么东西，那种感觉就像是从未意识到的茅塞被破除了，脑子开了窍！之后，我的心变得灵敏清楚，记忆力增强，学习快速许多。有了这次经验，我深信拜佛是可以帮助消业障的。我们要了解，当我们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时，会遇到障碍，这也是为什么禅的修行特别重视毅力与精进。

这是第一次的宗教体验，如果从佛法的观点来说，这个经验回溯了我的过去生，并与今生连接起来。一个人如果在过去生中修行，可说是种下了一粒种子，今生如果因缘成熟，种子

就会发芽。这不是开悟的经验，只是让我生起了信心。

年长的和尚们注意到了，没说什么。而我却开始明白他们眼中深沉的目光，当他们穿梭在殿堂中，不起眼的长衫下，轻灵飞舞的脚步，也展现了新的意义。突然间，我开了眼，在这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开始学习。

我的师公朗慧老人，请了两位老师帮我学习，一位教我儒学，一位教我佛法。两位老师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他们曾一度出家，之后又还俗。我跟着那位教佛法的老师学习早晚课诵及仪轨，这让我对佛法有了正确的认识。早晚课包括了佛法的主要精义。整本课诵本约一寸厚，做早课及晚课需一个小时的时间。

课诵的内容包括佛法住世的关键——佛、法、僧三宝，也解释了佛法中的三学。三学中，第一是持戒，与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有关，佛教禁止杀、盗、淫、妄及饮酒、吸食毒品；第二是修定、集中心，从禅坐中炼心；第三是修慧，正确地了解业（因果法则）、缘起法（一切事物的存在，全是因缘和合的结果）、无常（一切事物不停地变化，没有持久不变的实体），及苦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当一个人了解“幻我”的本质与实相，才是得到了智慧。这些观念使佛教有别于其他有神论的宗教。佛教探求苦的原因，离苦之道不需外求，而在我们每一个人

内心。

课诵中另一重要的部分是“四弘誓愿”，尤其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个愿。此外，还有《阿弥陀经》、忏悔文，及《华严经》中讲述的“三世诸佛，唯心所现”。

这些佛法教义让我更正了对世间事物的对立、二分化看法。我了解到我们的心与世间是不分离的，而人、我的对立区别，正是人们痛苦与冲突的根源。

如果能了解课诵的内容，就能了解佛法的基本道理。多数的人不知道课诵在讲述什么，我很幸运，狼山的师父请了这些老师来教我。

和多数人的教养成长过程一样，我的心中有着根深蒂固儒家观念中的忠诚与责任感。以前受过教诲，如今在狼山，又经我的儒学老师加深灌输这些思想。一个有品格的人，必须规范他的思想与举止，行为从容得体，清楚地知道任何行动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这样才能与人互动，建立关系。孔子也教导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如果你是在家人，你对家庭有首要的责任；如果你是出家人，你同样地对你的寺院有责任。孔子勉励我们要成为有用的人，他教导我们如何能与这世界微妙、温和地共存，如何修身养性与身边的人建立和谐、慈爱的关系。儒家的责任感和忠诚心引导我的人生，与我所信仰、了解

的佛教，是兼容相契的！

平静的寺院日子，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五年，当时日本人投降，内战爆发。新四军首先到了狼山，天真的我们及邻区的乡民还不知道新四军就是共产党。当他们出现时，我们很高兴，经过长期日本人的迫害与占领，好运终于降临了！共产党宣称是为人民，属于人民的党，他们看起来和善、周到、有纪律。他们不索求食物，也不威胁人民。

我跟之前一样，依然做我的功课、种蔬菜，照顾我的师公及我的师祖贯通老人。我的咳嗽持续着，后来才知道我罹患了肺结核，我的姐姐与姐夫后来也是死于此病。我很幸运，虽然肺部的损害没有经过治疗，但后来都自然钙化了。这又是个奇迹，因为我向来瘦弱多病，曾患过两次严重的疟疾，还有一回因为被伙伴们怂恿去爬树，结果从树上摔下来差一点死去！

我的幼年时代，几乎是在不安、动乱中度过。后来国民党来了，控制了乡间；共产党转入了地下，开始打游击战。

国民党的军队进驻我们的寺院。每回有新的兵团到达，我的师父就会为他们准备特别的晚餐，而他们却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成群地下山，在共产党不经意的时候袭击、围堵他们。很快地，国民党的军人害怕起游击队，因此当他们进城时，便会

换穿平民衣服，并要我陪着。他们是衣衫褴褛的一群，除了美制的武器，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他们军饷微薄，常常挨饿，士气长久低迷，他们把古老寺院的门板拆下来当床；打烂了无价的古董桌椅，拿去当柴烧；殴打僧众，当他们抗议时，连我也被打，只是我还小，所以没有受到太多的肉体惩罚。

他们拆毁寺院，使乡间陷入恐惧，寺院无法再待下去了，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相继离开，终于，轮到我走了。我去了上海，到了狼山的下院——大圣寺。我离开了这间古老的寺庙，这个让我找到生命意义与目的的地方。

第四章
上了天堂

离开了留下来照顾狼山的两位老和尚，朗慧师公和我乘船顺着长江从南通到达上海。那年我十五岁，由于要离开这座我已称之为“家”的古老寺庙，因而感到哀伤及些许紧张。但也因为还是个孩子，即将要去一个从小就听闻的大城市，眼见种种美妙的风光，所以感到很兴奋。

这段路程，在今天只需两个小时，但当时却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我们的交通工具是艘烧煤炭的大汽船，它的叶轮滚动起来，就像水车一样慢。出发的时候，河水灰浊，天空低沉而多云。天气变坏了，我和其他的乘客只好等在甲板下令人窒息的船舱里，等天气一转好，我们全都冲上来呼吸新鲜空气，但烟囱喷出的煤渣如雨而下，我挺身走向船首，迎面而来的风吹散了煤渣。我深深地吸进了含着浓重河水湿味的空气，对于一无所知的未来怀着好奇。当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心量要大，自我要小。
要能放下，才能提起。
提放自如，是自在人。

时中国在嘈杂动乱中面对未来，我的心却是平静的，但这平静的心不是来自于了知阐释无常与变异的佛教经典，而是因为我历经了水患、战争、贫穷和永远吃不饱的饥饿。这些让我了解到，人生是危险的，也是珍贵的。对这世纪大事所引发的人类大逃亡，我是无法完全明白的。当时年少的我满怀着年轻人具有的乐观。生命展开在即，我倾身向前，迎风伫立，期待着它的来临。

那晚，我选择睡在甲板上，而没有待在不通风的船舱里。船缓缓地在雾中前进，木桨离水声“空、空、空”地回荡着，湿漉漉的我蜷曲着身体入睡了。从海上直扑而来刺耳的鸟鸣声叫醒了我，我一脸污黑，沾满了煤烟。

上海看起来像是山岭区，高耸直入灰蒙蒙的天空。当船进港时，我简直是大开眼界。从未见过的西式洋房，我一直以为是高山，难以相信这样的高楼大厦是人盖出来的！

师公和我一下船，替旅馆拉生意的人马上成群地围上来，争着拿我们的行李。看起来上海人真友善，毕竟他们是来欢迎我们的，还要帮我们提行李。师公紧张地要我紧盯着我们仅有的微薄行囊。

码头旁停着一辆黄包车，师公开始跟车夫讲价。师公告诉

我：“上海人爱欺负乡下人。”他跟一个车夫讲好了价钱，我们上路了。当我叹为观止地看到房子在路上跑时，师公解释着：“那是公车和电车。”我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浅灰色的电车行驶在轨道上！当我稍微平静下来，眼前的景况突然显得有点可笑。电车像个大甲虫，而轨道就像从它头部伸出来的触角。

“他们住在电车上吗？”我问师公，他笑我傻，我无法想象那是交通工具。这就是十五岁时的我，单纯无知，在我生长的世界中，几世纪都未曾有大的改变，却在突然之间，跃进了二十世纪。

我很快地发现这是个吵闹与忙乱的世纪。街上的人急着赶路，看起来忙碌而有目的，我不知道他们要赶往何方，也不知道他们的人生是什么模样。这是个喧哗动乱的城市，电车铿锵地左摇右晃，火车嘎嘎地煞着车，电车劈啪闪着火花，人们大喊大叫。到处都在骚动，在这一片混乱中，我们那辆小小破破的黄包车，在车夫一路的吆喝下，划破了嘈杂的声浪，摇摇摆摆地走出了它自己的路。

我们经过的一些小店和摊子，卖着我从没见过的东西，我感到很好奇。有些店里没有商品，只有人，我不懂这些店是做什么的。师公告诉我，这些是办公室，不是店。我问他：“这些人怎么赚钱啊？”

他回答："这很复杂的。"

看守在办公室和富裕人家门口的守卫人员都留着胡须，头上包着头巾，师公说他们是东印度人。

我说："释迦牟尼佛也是印度人。"并兴奋地想着，佛陀一定看起来很像这些守卫人员。我也想到了达摩祖师，依照描述，他有一头长发、胡子和大大的眼睛，因此我以为守卫们也是佛教徒。

"也许我们可以请他们教我们佛法。"我对师公说，师公不解地看着我。后来我才知道包着头巾的印度人是锡克教徒。事实上，很少印度人是佛教徒。但我还是对他们感到亲切，因为他们来自佛陀诞生的地方。

当我们接近当时全上海最高，三十三层楼的国际饭店时，我几乎叫了出来。我对师公说："这比狼山的宝塔还高呢！"旅馆的窗户探出人来，我问："他们是天使还是神仙啊？"在我的家乡，只有非常有钱的人能够住两三层楼高的房子。既然这些人能够住那么高的楼房，他们一定是了不得的人。

"旅馆里多数住着外国人，"他解释，"他们从世界各地来的。"

我们到上海时，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上海早就是

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有许多区域被外国租借了。国际饭店坐落于原为英国人的管辖区，由于英国人已经撤离，所以又归还给中国人。外国商人仍旧在上海经营着生意。不过，主要还是这群人住在这家旅馆里。

等待着穿越马路的人们像群鸭子，全盯着红灯看，等着它变成绿灯，然后就像溪水般川流不息。我感觉到每个人都是那么渺小。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只是广大人群中的两个人而已。

然后我开始替我们的黄包车夫难过起来。从码头到寺庙，他拉了一个多小时。在乡下也有黄包车，但我察觉到在上海是更加辛苦，车夫们必须时时警觉。这里有混乱而骚动的电车、公车，还有匆忙的行人，我们的车夫夹杂在其中，叫喊闪躲，闯出他自己的道路来。后来，我总是尽可能地避免坐黄包车，车夫们太可怜了。可是我的师兄们指出，如果没人搭黄包车，所有的车夫都要挨饿了，所以我只好偶尔光顾他们一下。

离开了城里的商业区，我们走进了两边由许多墙壁和大门所围着的窄巷，那些巷道仿佛组成一个永无尽头的迷宫。这是个比较安静的世界，有着隐秘的院子和看不到的私人生活。围墙后面到处都是砖瓦屋顶，宅邸之中飘出炭火和烹饪食物的味

道，也听到流水拍打石头的声音。我们经过小桥和阴暗的人工运河，运河的味道就像污水和腐坏的蔬菜。

师公和我终于来到大圣寺，寺院位于普通住宅区中一间纺织工厂后面的窄巷里。寺院正在扩建与转变，迫使我和师公离开狼山的压力，也同样地驱使着其他乡下地方的和尚们，遗弃他们的寺庙逃生去。城里挤满了来自各地、从战乱中逃难来的人。

大圣寺的四座建筑物都面朝东。两栋寮房在大殿的两侧。这些建筑简朴、实用，但带着霉味，没有浓郁丰富的格调，也没有明显易见的狼山传统。然而，当我见到正殿佛龛上的佛像，闻到袅袅熏香时，我的心情变得高亢：我觉得回到了家。我跪拜礼佛，起身时，一种既甜又苦的感觉涌上心头。在狼山短短的几年，我已体认到了，有佛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双亲和我们那间茅草泥土屋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当日本占领上海的时候，中国傀儡政府的一位官员是佛教徒，他筹了钱兴建第四栋大楼，但是战后，他因叛国罪被处决了。这栋楼未完工，空空荡荡的，只有土地公、城隍和他太太的雕像。

这些神像来自一些迷信的信众，他们护持的静安寺，也是我后来念佛学院的地方。静安寺很为难，既不想把这些神像丢

掉，也不愿供奉，所以就送到大圣寺来。

刚到大圣寺时，我问住持："这些神是不是佛教的？"

他面无表情地回答说："这些神只是借我们的地方住而已。"

我什么也没说，但有点惊讶。可以说住持是用了一个方便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可是，即使我年幼，没有什么训练和经验，也感到他的回答有点奇怪。虽然佛教具有广大的弹性和包容性，我仍觉得住持太容易妥协而且也太松散了。现在再回头看，可以说大圣寺代表了当时佛教在中国的情况——过于妥协，以至于失去了清楚的原则和目的。

如果我是大圣寺的住持，我早已经把那些神像移走了。当时我就认为中国佛教需要重整，不能跟民俗信仰混杂在一起。这样的混淆让许多人误解佛教只是迷信。那时候，中国很少人研读或教授佛经，多数的出家人，只会行宗教仪式、办法会。连令人景仰的狼山也到处都是神像。虽然寺里不许供奉，但摆在寺外的山坡旁，让人们来祈求钱财、健康，或别的愿望。

和尚们涌进上海，开始居住在大圣寺的空屋内。屋前有一口井，每天都有人来打水和洗衣服。我们也在那儿打取饮水，所以每天早上都十分繁忙，感觉是街坊妇女来往闲聊的地方，

而不像个修行道场。

大圣寺后面有一大块空地，寺庙和纺织厂都在那儿种菜。再远一点，市区的外围地带则没有规划，小块的农地穿插在住宅区、工业大楼和仓库之间。蟋蟀的叫声彻夜不停，温热的傍晚，蚊子蜂拥群集。在破晓前一刻钟的晨曦中醒来，公鸡正啼鸣着。虽然在寺庙门口外，环绕着中国广大的乡村农业，然而在上海这个城市的生态区域内，人们依然能感受到它的活力、热气及大都会的文化。

因为我有农作的经验，所以种植谷物是我在大圣寺的工作之一。我不但会种菜，也会种最宝贵的粮食——米。这是非常重要，且非常被需要的技能。虽然国民党占领了上海及附近的区域，但城里不是很安全、很平静。通货膨胀很严重，日常生活也不稳定，所以我们很难买到米。奸商把米囤积在仓库里，造成短缺，然后哄抬价钱，赚取暴利，我们称他们为“米虫”。

在大圣寺，我们吃稀饭，有时也吃煎饼、油条、包着油条的饭团和豆浆，但这只是在状况好的时候。通常我们是吃稀饭配豆腐乳、花生和酱瓜。午餐通常有两三道菜，还有汤，很少有四道菜吃。每一盘都很简单，红萝卜、青菜、豆腐，晚餐也差不多。有时我们用酱油炒黄豆，也吃腌萝卜和咸菜，在上海称为“咸鸡”。

生活在上海时有威胁，出去买东西时，街上的人听到我的乡音腔调，会笑我“乡巴佬”。我听得懂这句上海话，因为听起来像我的家乡话。别的我就听不懂了，年轻人说话常穿插着英文句子——已转变为上海话发音的英文词句。

西方影响遍及各处，商店有英文招牌，多数人都穿西服，传统中式服装保留在正式场合穿。我看到女人穿高跟鞋，还真替她们担心。那鞋跟又细又高，不知她们何时会摔倒。

人们吃面包、牛奶等乡下看不到的食物。我第一次看到马铃薯和西红柿，我们叫马铃薯为“洋芋”（西洋的芋头），叫西红柿为“番茄”（番区的茄子）。我也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是战后留下来的英国和法国人。他们住的外国租借区又干净、又没蚊子。中国人的地区有着臭味，滋生着各种蚊虫。我对这样的差别感到很好奇。有人告诉我，外国人的下水道系统可以有效率地排放污水，而中国人的却经常会阻塞。

到了大圣寺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让邻近地区的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傍晚，我和其他的和尚在寺庙边凉爽的田地上耕作，看到两只白色的狐狸在农田中找食物。本来还以为是行动迅速的白猫，后来才看到它们蓬松的尾巴、竖起的

耳朵，还有尖尖的鼻子。它们低趴向前，贴近地面，左右张望着。

中国人相信白狐狸是神仙的化身，白色的皮毛代表它久远的年纪。看到一只已很难得，同时看到两只更是稀有。事情传开了以后，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大圣寺。其中有个人决定每天捐两个鸡蛋给这两位神仙。他每晚把蛋摆出来，隔天早上那里只剩下没有破裂的空蛋壳。狐狸怎么能够不打破蛋壳就把蛋吃掉？这些空蛋壳于是变成了纪念品。

其中有一个信徒不相信狐狸是神仙，开始叫它们“臭狐狸”，让崇拜的人们抓狂。他讲了这种不顺耳的话后，有一天早上起床，他发现衣服不在床边了，而被挂在房子的梁上。我的师父告诉他，他冒犯了狐仙，必须忏悔。忏悔的隔天，衣服回到了床边，整齐地摺好了。

我还太年幼，才从乡下来，只有好奇和惊讶。当时在大圣寺，充满了似嘉年华会的欢闹气氛，民间神话冲霄而上，弥漫着歇斯底里的情绪及了不可知解的神秘气氛。

第五章

超荐亡魂

我的和尚生涯在大圣寺有了新的转变。虽然名义上是间禅宗的寺庙，但绝不是一个修行禅法的地方。禅修是在日常生活中，从定时作息的起床、饮食、打坐、劳务、早晚课和睡眠来调心、安心。当心是平稳的，就比较能观照心的状态和变化，进而了知心的实相。

然而大圣寺的和尚们却忙碌地在城里跑不停。这个寺庙是以做超荐经忏来维持，我们常常穿梭于殡仪馆与亡者的家。我们与三家殡仪馆有合同。他们提供整套服务，从棺木、和尚念经、火化到送至墓地。我们就是旗下的承包商，每当我们穿着和尚衣袍出现，张口唱诵，殡仪馆就可赚取一笔佣金。

佛教相信六道轮回，人道是其中的一道。超荐亡灵的宗教仪式源自明朝，本意是要帮助往生者投生于善道，让往生者心里平静，不会被贪、瞋、痴的念头所牵引，而投生到畜生、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识人识己识进退，时时身心平安；知福惜福多陪福，处处广结善缘。

饿鬼或地狱道中。平静安定的心能引导他们投胎至较好的一道，例如人道。简要地说，就是将助念的功德回向给亡者，使他们能生于善道中。

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想法，我了解西方人可能会觉得怪异。然而多数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子的，也如此相信。

每个超荐仪式需要五个人，我们常去守灵，陪伴亡者至凌晨四五点，之后回大圣寺睡觉，三四个小时后，又要开始一天的作务。当殡仪馆非常忙碌的时候，我们几乎没睡什么觉。

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如果每天我们有一处要做经忏，我们就有足够的钱吃饭。但除了饮食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需要：看病、房屋维修、电费、电话费。所以，我们一天须到三处做经忏，才有足够的钱来维持寺院。

奇怪的是，丧葬也有季节性。旺季时，去世的人比较多，淡季时，比较少，有时二三天都没有超荐工作，那我们就休息了。每个人都极度缺乏睡眠，只要能够，我们会睡到早餐过后。不幸的是，那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戒小，我必须做早晚课。戒长的法师不需做晚课，我常常单独一个人做。我学会了在法会上需要使用的法器，能够准确、适度地摇铃、击鼓、打木鱼。我一点训练都没有，因为没有人教我。必须自己

学会，也因为有这个需要，我自然就学会了。起初，我打的次序不对。譬如：木鱼敲错次数，或是用的力道太强或太弱。慢慢地，经过了些时候，我打得愈来愈熟练了！

回想起来，既好玩也悲哀，我学会了敲打这么多法器，是为了让寺外的人们听了以为有许多和尚在做早、晚课，维系着固有的寺庙传统，而不是只有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沙弥，在那儿连站都站不住地在打瞌睡。

我从未看到其他的和尚在自修或打坐。这间庙连一间法堂或禅堂都没有。传统中，禅堂是僧众们安住的地方，他们打坐调心，吃、睡也在里面。并不是所有中国的寺庙都像大圣寺一样。只是在那个特别的年代，上海的情况是如此，上海之外的寺庙有修行的空间。在中日战争期间，有许多新建的寺庙，僧众听闻佛法、打坐修行。战争过后，许多和尚离开了乡间，这些寺庙成了废墟。所以，寺庙成了一个复杂的地方，不同意图的人聚集在一起，龙蛇杂处。

我们去大小不同的殡仪馆，大的有多至十二间大小不同的厅室出租。大的厅租金昂贵，包括各种乐器，如：钢琴。小一点的厅，从外面请人来演奏国乐。有钱的人，喜爱地位排场，中、西乐团都请。这纯粹是在作秀，让人感觉是很多人在为亡者超荐。实际上，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特定的宗教信仰。他们只

是希望面面俱到，该有的都有了，这个超荐仪式是源自于民间信仰，没有什么宗教情操。

有些殡仪馆有存放棺木的房间，尸体放在厚木棺材里密封住，不让臭味外溢，四个叠起放在架上，就像是美国停车场内的车子一般。有些棺木是暂时停放，等待墓地整理好；一些是等着运回亡者的家乡。然而仍有一些是无家无眷、无处可去的。在这种情形下，殡仪馆也就成为墓地了！

有些人家也会请我们去做超度的佛事，在亡者生日那天，第一年及第三年的忌日，或是亲人往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这通常只有富裕人家才会做。

如果他们家里挤不下或是亲朋人数众多，佛事就会在大圣寺举行。那么奇怪的事件就会发生，虽然对这些不是在寺庙度过大半辈子的居士们来说，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许多外来的居士吃荤，在这些超荐佛事期间，他们会外包请人来庙里煮鸡鸭鱼肉，也供应酒，当这些佛事结束后，大圣寺里泛滥着煮熟的肉味。这种情形让我很难接受，我问住持，为什么我们允许酒肉进门。

“我们让他们在这儿做超度、吃肉，我们就可以有素食吃。”他回答：“如果不让他们这么做，我们就会挨饿，光是诵经赚的钱养活不了我们。我们不过是为了维持生活。”

经历了几次这种事后，我开始想离开大圣寺了，如果寺庙可以被包下来煮荤食以超度人，那我们不是在奉行佛教。戒长的和尚们似乎并不这么认为，更别说去体认、实践佛法的基本教义了！虽然在这么幼小的年纪，我受到仅有的一点点训练及经历这样的出家过程，然而几乎是天生地、很快地，我就变得非常的虔诚了。这不是经由选择，而是我就是这个样子。在我亲近佛教及出家做和尚的路途上，从来不曾是为了“过日子，讨生活”！

因为大批的出家众涌入上海，为亡者诵经超度的工作变得抢手，非常竞争。为了保持竞争力，我们必须降价及扩大服务的地区。我们赶啊！跑啊！横冲直撞地穿梭在都市的狭窄街道中。袍子飞起、汗流满身、喘着气、闪躲着脚踏车及人力车，试着不去撞倒人，每天要跑上四十公里的路。我们工作辛苦，睡眠少，常处于疲惫中。

有许多年轻、精力充沛的和尚们注射或吸食海洛因来提神。这些和尚们多数来自大的寺院，而且许多是非常杰出的——聪明，佛学知识广博，梵呗唱诵熟练。他们看起来都很庄严，没有一个相貌丑陋，现在想起来，倒是有些奇特。

因为觉得乏味无趣，他们多数离开了原来的寺院。他们都

是等待着应聘的新秀，或许以为其他的寺庙会延请他们做住持。就好像是一个从大公司出来的人决定到其他的地方试试运气一样。虽然他们很优秀，但大的寺院对他们抱持观望，因为他们的流动性很大。所以，他们最后到了像大圣寺般的小庙，而且变得懒散。他们不打坐、不读经、不拜佛，其中不少人被上海吸引住了，在超荐亡魂的变相买卖中攫取利益。

海洛因帮助他们提神。但这是个恶性循环，他们必须增加工作量来维持毒瘾的花费；当他们工作愈多，对毒品的依赖性也愈重。当海洛因进入他们的体内时，他们口中发出嘶嘶声，感觉美妙无比，在尚未注射前，他们鼻涕遍流、精疲力竭。一旦注射后，他们变得清醒、有力，可以做任何事情。

当没有经忏可做时，这些人就到上海主要的红灯区——第四街的窑子去。有一个晚上，在我去赶经忏的途中，我路经那条街。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儿会有这么多的女人。那些女人对我们这些和尚很感兴趣，直问我们要不要跟她们一起回家。我们以为她们要我们去超度亡灵，所以告诉她们：“我们很忙。”当我们回到庙里，那些见过世面的和尚们问我们知不知道那些女人是谁，还笑我们纯真无知。还好我没接受她们的邀请，我真的不知道她们是妓女。她们打扮美丽，一点都想不到。

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卖了一些麦子，担着让家人受饿的风

险，在家乡请了一位裁缝为我做了几套僧服，亲自拿到上海来给我。我在狼山没有进行正式的剃度典礼，在大圣寺时也是穿着在家人的衣服做经忏。因为我的家庭没钱，所有成为和尚必经的正式仪式都被免除了。和尚的俗家须支付所有落发、受戒的费用，包括：僧服、宴请剃度恩师与授戒恩师的供斋大餐。我很高兴有了新的衣袍，也对家人的牺牲深深感动。

有一天，一群警察来到大圣寺寻找海洛因。当然，他们找到了。实际上，这间寺庙已成了存放毒品的仓库。新闻传开之后，对佛教界非常不好，对我们的寺庙可说是件灾难。人们不再请我们诵经，寺中的收入大跌。但几个月后，人们忘掉了这事，又开始雇用我们了。

或许你们会奇怪，为何大圣寺的住持没有对寺中的毒品泛滥采取任何行动。其实，他一直是个现实的人，因为这些和尚引进财源，所以他不希望这些和尚们离开。

回想过去，在大圣寺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混乱的时候。那儿没有规律的生活，和尚们随时来来去去，没有用餐的特定时间。不过也没有纠纷与竞争。毒品是我们最糟糕的问题。除了那几个焦芽败种外，我们仍是茹素，守持淫戒。

日子变得更难过了。一些不守戒律、被逐出寺院的和尚们

还俗后，在街上摆起铺子。他们娶妻生子，穿着在家人的衣服。他们也削价做起超荐诵经的事。当他们要做法事时，就把旧的衣袍穿上。

因为每场法事要五个和尚，所以这些街铺就联合起来成为一霸。他们每次拿到生意，轻易地就可动用几十个“和尚”，而政府和佛教团体却对他们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些还俗的和尚们，人数多得淹没了我们。但如果碰上了我们忙不过来，需要人手时，我们也会去雇用几个这样的“和尚”。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彼此竞争，另一方面也是互相合作。

我终究开始思考在这条出家的路上所面临的选择。如果我一直待在一个寺庙，终老时会有依靠。那些做到管理阶层的和尚们，年纪大时可拥有私人的房间，还有其他的特权，他们不用遵守寺院的日常作息；当他们生病时，能得到医生的治疗。担任住持的人，可以住在前任住持的房间，直到死亡为止，即使他的任期过了。他还有一名私人侍者及一份供养。不过，其他的寺院也会邀请退位的住持。有些具有名望的和尚们，一生中曾担任超过十处寺院的方丈，因而也能选择一处他们决定要去终老的地方。

像我这样一个小和尚，所能期望的最好前景就是这些了。

如果我像“马绺子”一样，一处一处跑，我清楚地知道没有人会保障我的安全，或提供我的生活所需，当我生病、年老时就惨了！我看到这样的寺院生活，的确是提供了一个安全保障。如果一个和尚乞求待在一间寺庙，他们必须收留他。

大圣寺在兴旺时期，有二十多个和尚。主要的和尚们来自狼山，只会诵经、做法会。其他的和尚们技艺可多了！有些会唱戏曲、演话剧或吹奏笙管。有几个会同时用嘴吹奏两个喇叭，有些会吹更多；用嘴巴吹二个，用鼻孔吹奏另一个。他们会武术功夫，也会使用各种武器。当我们举行丧葬仪式，在中场休息时，他们有时会加入这些表演，这些和尚们还会用厚的彩色纸做灯笼、旗子及幢幡来庄严佛事。

大圣寺的住持极力要我学会吹奏笛管及喇叭，那样我也可以演出。但因为我的肺活量很浅，所以我无法演奏需要肺活量的乐器，结果这对我反而是好的。如果我学会了其中的一项乐器，我将会成为一个艺人，流落到那种进退两难的日子、局限的事务中，我也不可能会被允许去念书，而在日后优游浸润于佛教的智慧之海中了。我内心深处知道——虽然那时候没法很清楚地表达这意思，我要的是一个不同的生活，是一个读书、学习及传承佛法的生活。对我来说，读书与修行这两条路交织着，不可分离。

第六章

一个和尚的教育

虽然大圣寺迫切地需要我做经忏的收入，一九四七年，朗慧师公还是让我进入上海静安寺的佛学院念书。能再回到学校念书实在让人太兴奋了，尤其这次是进入一所教授佛法的学校。

静安佛学院的环境与大圣寺截然不同，在教室里，我们坐在指定的位置，两个人共享一张桌子。因为近视，所以通常我会被安排坐在前面。桌子和椅子都很低，我老是眯着眼看自己写的字，然后抬起头，眯着眼看黑板和老师，一整天下来使我的脖子痠痛！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提得起放得下，年年吉祥如意；
用智慧种福田，日日都是好日。

静安寺有台钢琴，我们跟着一位外来的音乐老师学习佛曲。学院中没有图书室，但教室的一角有几层书架，放着三本全国通行的中文佛教杂志及一些非常好的文学期刊。

奇怪的是，我们的书很少。我们被告知要专注于功课上，不要阅读课外读物。我们甚至

没有一本像样的佛教字典。

少数同学觉得无聊，因为他们从别的学院毕业，对我们学习的教材已经熟透了。当老师上课时，他们在底下阅读。可以想象得到，老师们给学生的回应不是很好，但我们喜欢那些老师，因为他们帮助我们学习。毕业时，有几个同学撕毁了他们的文凭，因为他们说文凭无用，他们已经在别的学院拿到了几张文凭，依然无法找到教书的工作。

我们研读中国佛教的重要著作，例如《圆觉经》、《大乘起信论》，和有关瑜伽唯识、中观、华严及天台各宗的教理文献，这些都是佛陀的教诲，蕴含着佛法中心思想的典籍。我在狼山禅门日诵中学到的是基础的佛法课程，是我身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佛弟子，所必须去学习、去奉行的。那个课诵本让我了解到，大圣寺的和尚们，行为不如法，不像个和尚的样子。

我在佛学院的课程就不一样了，是教授“心”的学说。这些论述是由对佛法有深入了解的伟大哲学家所撰写的，把佛陀的话语及思想中的真义发扬光大。这是较为深入的佛学课程。

这个佛学院是由太虚大师领导的一群人所创建的，太虚大师是现代中国佛教的伟大复兴者。他投注于建立佛学院的努力是惊人的，他在中国各地兴建佛学院。倡导佛教教育也是我终生的目标与信念。静安佛学院的院长曾在日本的高野山大学就

读。中日战争后，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他创办了这所一般大众可就读的佛学院。

快速地浏览过广大、繁杂与深奥的佛法后，我开始了解到祖师的法脉与悠久的传承，是奠定狼山修行与道风的磐石。静安佛学院不是个知性探讨及辩论的教育中心。我们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死背来学习。批判式的思维与观念的剖析是不被鼓励的。我们记住每个宗派特有的名相。研读经书也是用相同的方式。老师们认为我们只需要强记背诵，假以时日，自会了解。他们是对的。我记住了许多的东西，日后当我的程度比较好时，我开始会去思考我所学过的东西，并能以我自己创新的方式去了解。

但事情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的。起初我听不懂课堂上在教什么！我试着从老师的声调与表情来解读他的意思，而我也能猜出一些。我抄下黑板上的文字，与同学们讨论，他们有些人已在其他佛学院读过，所以懂得。讨论有助于了解笔记，在理解课文与考试上，我都做得不错，多数都至少有九十分以上。虽然在入学时，我落后其他的人，但毕业时我名列前茅，而且被甄选去读研究所。

除了佛法与戒律学之外，我们也学英文、数学及中国古典

文学，由高中老师和大学教授来授课。佛学院也注重体育课，我们跟着一位从知名的少林寺来的老师学习太极拳及少林拳。

静安佛学院注重忏悔法门的修行。我们打坐，但不清楚正确的打坐方法，所以很难在修行上得力。我知道身边有些人有很深的修行体验，也有人是被验证开悟的。他们从未解释或形容他们的经验。当他们彼此讨论时，谈话内容有些奇特，意思难以捉摸。我问了几个已在禅堂打坐几年的年长师兄。当我请教他们打坐的事，他们会说："那简单，就坐在那里，等你的腿不再痛时，就成了！"

偶尔，有人会被给予一个公案去参，但整体来说，是没有系统性的禅坐训练。有一回，参加了学院的禅修活动。我们有句话说，要坐到"黑漆桶底脱落"，但我一直坐在那儿，直到香板打出经行的讯号。没人告诉我要做些什么，或给我任何指导。有时我坐在那里，会想："我到底该做什么呢？念佛吗？或别的？打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问自己这些问题，直到自己变成一个大疑团。我被疑团困扰了许多年，压力沉积在心中。不安，甚至苦恼，如波浪般地在心中翻搅。

不幸的是，我的学业又再度中断了，老师、同学们紧张地应付着反宗教的来袭。我的家庭是无产阶级佃农，没有自己的

农地，所以我不怕那些偶尔会来寺院的官员。共产党友善、表现出对佛教的兴趣，邀请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怎么生活？他们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国家变得腐败、后退，只要国民党掌握政权，我们这个国家就会毫无生气，颓丧败坏。

我的几个同学加入了他们，还回到静安寺来要其他的人也入党。后来，我的这些同学转为共产党的地下分子。国民党逮捕了其中几人，并枪决了他们。

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底进占上海。我记得城市的周围堆起了沙包，那些应该是防御用的，但其实只是做做样子。共产党抵达时并没有发生战斗，他们长驱直入地拿下了整个上海市。

没有人吃惊。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进占上海是一定会成功的，虽然国民党誓守上海，但他们对御守上海没有信心。我们心里清楚，还俗是迟早的事，无法避免。我记得问过一个好朋友，他是从江苏无锡来的和尚，“你有什么打算？回家乡吗？还是还俗？”

他说：“我姐姐住在上海，她已帮我物色了一个女朋友，找到了一份工作。”看起来，他对前景颇为兴奋。

我问另一位来自扬州的同学：“你打算做什么？”

他回答说："我家有两艘货船，刚抵达上海。他们给了我在家人的衣服，我可以在船上做些劳力。"

另一个同学坦言道："我没什么勇气。我不想回家乡，我也害怕加入军队，我就留在这里看着办吧！"

在一九四八年的下半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有些同学搭机去了香港、广东和台湾。他们的师父有钱，带着他们一块走，他们走得很秘密，半夜溜出，直到他们不见了，我们才发觉他们的潜逃。

我问师祖是否我也该逃走，他说："老和尚都不怕，你这小和尚怕什么？"我的师父也反对离开大陆。但守成法师——我在静安佛学院的师长，已抵达台湾，写了封信给我，问我是否要追随他。他要我寄去几张照片，帮我申请台湾入境证明。可是他在台湾没有关系，也没有钱，所以无法提供太多的帮助。当然，我本身也没钱，从上海到台湾的船费是十块到二十块银元，我的单银每个月还不到一块银元。

另一个机会来临了。一位中日战争的名将——孙立人将军，驻扎台湾，正为他的军队在大陆招揽军官。孙立人有非常高的声望。他毕业于美国的军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事联合作战中，在缅甸的一场关键性的战役中击败了日军。

孙立人招收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入伍，在台湾高雄的基地受

训。静安佛学院的学生们收到了一封来自常州天宁寺的信，邀请我们加入孙将军阵营，成为年轻军官。

我的一位同学遇到了国民党通讯营的募兵人员。他决定加入他们，而他的军事识别证让他可以免费乘车。当他告诉我们这事时，我们都印象深刻。我和另两位同学就直接找到那个招募中心，在通讯营上登记了名字。我们问是否是加入孙立人的陆军队伍，被告知是确定的。直到我们抵达台湾时，才发现我们的队伍——二〇七军，曾经被孙立人带领，但他已调任其他队伍了。

陆军支付我们一路抵台的费用。我只携带了简单的行李——二十本佛教书籍、一条毯子、几件内衣及一张身份识别证，就是这么多了。在上海，我把我的和尚衣袍收了起来。

那时，我的大哥住在上海，以贩卖热水的小摊子维生。当我离开上海时，他的热水生意已不行了，取而代之的是卖豆浆。他拮据地过活。我去找他，依然穿着我的出家衣服，告诉他，我要从军去了。我没有说明原因，他拿了碗豆浆，微微激动地递给了我。他实在是太穷了，没法给我任何帮助。在我去看大哥时，我带了一只木箱，里面放着书、照片、论文、手稿及衣服。我请他带回家乡或留在上海，等我们以后回大陆时，再还给我。当我一九八八年回到大陆时，我问哥哥他是否还保

存着那只箱子。他拍了一下脑袋，说早已遗失了，因为这些年他一直在流转迁移中。

一九四九年的五月下旬，当我离开上海时，有几个同学来送行。大圣寺仍是一间寺庙。若干年后，我听说那儿的僧众都被迫还俗，包括我的师父及师祖。年轻的结了婚，年老的化成了灰土。

一九八八年回到上海时，听说大圣寺在文革期间已改成为一间工厂，几乎无法想象能再把它还原成一间寺庙。所有的佛像在文革中都被销毁。当一九七八年开放时，大圣寺需要有人来经营寺庙，曾做过和尚的人，白天经营寺庙，晚上回到家里过在家人生活。我的师祖还俗时是五十多岁，后来结了婚，也生了孩子。

我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大陆，一个年轻的和尚、热切的学生，脱下僧袍，换上军装。这不是个容易的抉择，不过我被逼入死角，没有其他的出路。我的目的不是要做终生的军人。一九四九年的春天，中国处处喧嚣动乱，处在革命的剧痛中，我踏上了长程的越海之旅，一路东南行，茫然地驶向未来。

第七章

忠诚的军人

台湾是个多山的海岛，海岛的西部有条由北到南狭长的平原，是工业集中地，也是多数人居住的地区。一九四九年五月，在我开始新兵训练的年代，台湾不是像今天看到高度工业化的已开发地区。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台湾为日本人占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联军后，台湾才回归大陆。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战败，把他的政府及军队迁到了台湾。总计超过一百万的民众离开大陆，抵达台湾。他们多数是富裕人家、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像我一样的军人。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身心常放松，逢人面微笑；放松能使我们身心健康，带笑容易增进彼此友谊。

我的人生再度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家乡的村落和茅草屋已离我远去。逝去的还有狼山上香云朵朵的佛殿、山间的迷雾、翻翘的屋檐及自古流传的清雅风味。拥挤的街道成了往事，大圣寺中的疲惫生活，虽然充满了妥协，仍不失为佛子。而我现在是个军人——近视、患

病、体重只有五十公斤，像是竹竿似的，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面临什么。

我们在台湾北部高耸山区的山脚下接受训练。我们单位的指挥官灌输我们，拿破仑的字典里是没有“难”字的，所以我们要克服种种困难，没有抱怨。我们用手搭建起营房及伙食区，拿草铺盖屋顶及墙，竹子做柱子、横梁及床。四周没有树，所以我们种树。当远行时，我们睡在桥下、路边及坟场。

陆军是贫穷的。我们没有军服，在夏天，通常只穿条短裤。我们的训练课程叫做“三光政策”——光头、光脚、光身子（上身）。我们暴露在日晒雨淋中，皮肤很黑，像是非洲来的一样，只看到白白的牙齿。下雨天就是我们的洗澡天。因为太阳晒得太多了，雨水沾到身上就滚落下来，好像皮肤是层防水的塑胶布。

我们没有鞋子穿，当行经旷野时，脚可不好受。我们用沿着河边生长的草和植物来编织鞋子。每双鞋大概可穿两星期左右。有些军人不会编织鞋，我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收集好材料，我会帮他们做鞋子。他们很感谢我，要送我礼物。他们问我要什么，我说：“我不喝酒，也不吃肉。有什么好买的？”他们买了炒花生米给我，很难得的，通常只有上尉和中尉们才可以享用。

除了中尉外，没人有手表，墙上也没钟。我们听着军号声起床、吃饭及睡觉。每天早晨，天还没亮以前，我们跑步五公里。回来后，休息一阵，接着在体操设备上训练体能：鞍马、单杠、双杠及爬竿。

九点左右吃早餐，那时我们已经累坏了。我们坐在地上围成圆圈，当中放着一碗水，水中有点盐和几片蔬菜叶子。大家分着那碗“汤”，配着主食米饭来吃，米是配给的，每人一天二十七两，不到一公斤。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只够吃二餐，不是三餐，我们的饮食完全没有蛋白质，第二餐是在下午四点吃。当我们需要更多食物时，我们拿米去换价钱便宜的番薯。

因为缺乏蛋白质及其他的营养，所以我们都饱受营养不良之苦。入伍两年后，开始收到美国援助物资，这很有帮助。美方提供面粉、黄豆及医药物品。早餐增加了豆浆，一个小如拳头大小的馒头。政府也发给我们维他命。每人领取一瓶八十粒装。我们应该一天服用三粒。一个同袍说：“一天吃三粒，真麻烦。干脆一次全把它吃了！”几个人都照着做了，结果他们的肠子痛得像火在烧，之后被送到医院灌肠。之后，队长一天发给每人三粒，还提醒我们一次只能服一粒。

每天都有部分时间要上政治教育课。课后再练习行进操练。我们排成各种队形，直的、横的、三行或单行一条长的。

我们觉得这种训练真是好笑，因为真正打仗时，大概不会排得这么整齐。但是这种训练，把我们变成一个团结的单位。我们全体超过一百人，但只有两支步枪，还不能开火，不过枪口上装着刺刀，我们轮流背着这两管步枪，并模拟着如何当哨兵。其余的人，把竹竿当成枪杆，在行进时背着。

在政治教育课中，我们学习了军事策略，这些课程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我们还读司令语录，每星期共同讨论一次或两次。我们也学习吸收孙中山的思想，以及他倡导的三民主义。孙中山说："民族主义的国家应提供日常所需，如：衣服、食物、交通、娱乐及教育，给需要的人。"

我们的教官说："在大陆，民众住在公社里，每件衣服要穿九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除了训练外，我们得不到什么讯息，与当地没有什么接触；我们听不懂他们的方言，而他们认为国民党的军队是以外来的武力占领了当地。国民党只发行一种报纸，只有两页的篇幅，而军队有它自己的报纸。我们不觉得言论上有什么不自由，因为我们的想法都相同。当时几乎看不到外文的报纸，只听到外国的新闻，像是中东问题、塞浦路斯的战争。

每个星期，我们有一天不上课、不受训练。我们一直都是疲累的。不过我试着持续出家人的修行。当我在做简单的事

情，像跑步、行进或站卫兵时，持诵观音菩萨圣号，我没有时间打坐或拜佛。

我想入军官学校，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修行和读书。不过，因为我没有读过高中，也没受过完整的教育，而且我的身高有一百七十公分，体重却只有四十五公斤。因此只要一量体重，我就不及格了。

后来，我接受了训练，晋升到普通步兵的上一级。我最大的问题是近视眼，但自入伍后，我没配过一副眼镜。射击练习是训练课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我只看得到射击靶外围的白色部分，看不到靶内的圆圈，所以我都射到外面去了。整天的打靶练习，我得了零分。长官们以为我是故意打不中的，几乎要处罚我。他们不知道我的眼睛有毛病，否则会立即被淘汰。此时刚好通信队招考，我便决定参加考试，因为我的视力对电话及无线通讯的工作不会构成障碍。

通信队的任务是防卫海岸线。我们住在多风的沙丘上，有着绿树森林的群山远远地落在我们的后面。海水的盐分及长久的潮湿，腐坏了住宿的房子。我们相信大陆即将攻打我们，我们天天都在截取这种预示征兆——来自大陆的无线电讯号。

真是幸运，不用再从这里行军到那里，而我也有较多的时

间。当我不在值班时，我会在海边的沙滩上或树林中找个隐秘的地方打坐。我也尽可能地阅读书籍。那个时候是找不到佛经及佛教的书籍的。庙里很难得有佛经，只有早、晚课用的课诵本，内含咒语，主要的经文，四弘誓愿、三皈依及回向文。通常每间寺庙都有自己的课诵本，收集他们各自认为重要的内容。

至于佛经则是记载着佛陀的教诲，种类有很多，是佛教典籍的主体，遍行于所有佛教徒间。少数几间寺庙有佛经收藏，但因太珍贵了，所以他们不肯借给我。我找到了其他的书，是文学、哲学及自然科学方面。我用装着油的墨水瓶及一块布做成了一盏灯，借着那灯光，每每读到深夜。当一位军官发现我夜读后，惩罚我做伏地挺身。

虽然，过着军旅生活，但是我在梦里却一直是个和尚，渴望再回到出家的日子。我甚至会告诉别人，我是个和尚。士兵们闲暇时去看电影、喝酒、上窑子。我不会加入他们，当他们去找乐子时，我常常是营区里的指定守门人。

我把伙伴们当成朋友。我们吃、住、工作在一起，大家相处得很好。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有时是满挣扎的。我有一个同袍是广东人，有一回他杀了一条狗，带回来给我们。

我问他："你为什么杀了这条狗？"

他说："吃啊！我们的食物不够吃。"

这条狗肉够吃几天，他们把买其他粮食的钱，拿去买了盐及作料来煮狗肉。我没有东西吃，他们可怜我，让我吃白饭配酱油。

还有一回，我们驻扎在有个鱼池的“营区”，着迷于鱼儿的美丽，每天我都去池塘边看着它们，鱼儿懒洋洋，不费力地在水中游动着，摇摆着鱼鳍，刻画出优美的弧线，神态优雅而安详。当一群士兵伙伴们——我视之为朋友的人，跳到池中抓鱼，做为他们大快朵颐的食物时，我痛苦极了！

由于戒律的关系，吃素对我是重要的。即使在军中，我仍尽力在行为与心念上持守戒律。佛教出家人是严守素食的，因为吃肉不慈悲。食物是滋养身体以做为修行的道器。既然素食是可以滋养身体的，那有必要去吃肉吗？吃肉就会杀生，尤其是佛教徒无论是在家众或出家众，都遵守五戒中的其中一条——不杀生戒。

每次游说伙夫在放肉之前，把我的食物先煮起来的过程，就像个拉锯战。有的人很好，会帮我做，有的不会。我尽量不吃他们煮的荤食，但有时菜里夹着肉，我就只吃其中的蔬菜，不吃肉。当厨子们分配一人一片肉时，每个人都要来跟我做朋友。他们会说：“和尚啊！你那片肉给我，我的蔬菜给你。”

我有时会被他们欺负，士兵们都喜欢互相欺压，唬唬对

方。我们队上的财务官，负责每月发饷的，就是那个样子。我请他帮我保管薪饷，因为我不需要马上用钱，他很高兴地遵从了，还说要给我利息。但几个月后，当我向他要回一些他藏在鞋跟的钱时，他说："还不到你领薪的时候。"

我回说："但我存放了三个月的薪水在你那儿。"

他说："我只负责公款，不管你个人的钱，我没有。"

很清楚的，他是在讹诈我，而我也学到了一个教训。从那时起，只要涉及钱，我一定要拿到收据。

那次事件后，那个财务官因为钱的事与人起了争议，被另外一个同袍刺了三刀。结果那财务官被送进陆军医院，而行凶的人被关进牢里。

我有个原则，绝对不发脾气。这倒不是因为成了出家人，就远离暴力。当我念小学时，我一天到晚在打架，每一次我都输。当兵时，人们跟我过不去、找碴，我尽量地容忍。我知道我不该发脾气。

我不敢从军中逃跑，再回去做和尚，过我渴望的日子。虽然有一次曾想过跟着一位上海的同班同学一起逃跑，但始终没有真的尝试。我知道如果被抓到，一定会被打得很惨。那位同学知道我还保存着上海带来的和尚衣袍，叫我给他。我给了，当夜他就逃走。所以，至少我的和尚衣袍还有点功用，帮助了

别人回复出家人生涯。

我的同学还存着从上海带来的身份证，所以他逃亡的成功率比我高。在来台湾的船上，一位军官鼓励我们交出身份证，他告诉我们，等船在台湾靠岸时，他就会还给我们。我给了他我的身份证，但他却没还给我，他说它是没用的，以后，我们会领到新的。不过，我的同学嗅出诡异，他告诉那军官："我正准备要加入军队，身份证有什么用啊？我没去领。"实际上，身份证在他的衣服里。

当日本占领中国时，发的身份证叫"良民证"，表示这人是没问题的普通百姓。在台湾，国民党也从身份证来查验你的身份。我很天真，当时把身份证给了那军官，以为反正要从军了，身份证就没用处了。不过，很多还保有身份证的人，都从军中逃脱了，回复平民百姓的生活。如果我的反应灵敏的话，我还保有那张身份证，也不会再继续待在军中了。有了那张身份证，我可以像普通百姓一样找工作。没有那张证，我会被认为是流放分子或外来客，一个在紧密社会结构中的可疑人物。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身为军人是危险的。当国民党政府掌权时，台湾也经历了他们的麦卡锡时代。

当我初抵台湾时，我的单位中有一些军人的背景有可疑之

处。他们的口音听起来像是来自上海镇江地区，对以前在大陆上的事情守口如瓶。人们开始猜测他们可能是共产党。因为我也是这十几个从上海来的其中一人，他们调查我。

调查人员问我是否为上海人，我回答："不是，我是从江苏来的。"他们叫我要小心。

其他从上海来的人遭受了残酷的刑罚。调查人员折磨、修理他们，用电线电击他们，直到招供出自己的背景。其中有一人真的是共产党人，他被枪杀了。因为我也是从上海来的，被迫去观看枪决。

第二次被指控为共产党是在韩战结束后。在韩国的中国共产党战俘被美国遣送到台湾，加入国民党的军队。这些战俘被打散到不同的营队。他们身上都有刺青，写着"反共抗俄"，这些刺青是美国人抓到他们时刺的，这样他们就只能加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这在整个部队里掀起了刺青的热潮，以表示自己的忠诚。

我拒绝刺青，他们开始监视我，这样的怀疑让我处在极度的危险中。我依然计划着恢复出家生活，和尚的身体上是不好有刺青的。因为我的拒绝，其他许多人也不刺青。

第三次，我差点被处死了，这次是起因于我对古代诗词的喜好。我从图书馆借书，抄录了我喜欢的诗句。其中一首是这

样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因为抄录了这诗，我被指控是反战分子，他们甚至还怀疑我企图鼓动别人加入反战行列。我告诉长官们我只是觉得那首诗很美，我常常抄录诗。但这样的解说没什么帮助，他们依然以怀疑的眼光来看我，说话时带着讥讽、指控的语调。

这回麻烦可大了。我被全天候地盯住了，不准一个人单独行动。我的案子被呈报到上级长官处，由于他们不认识我，所以很可能会下令处决我。

我很幸运地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上尉朋友，他曾在大陆念大学。我们常讨论历史、文学及佛教。他很维护我，并报告他的上司说："他是个和尚，刚巧喜欢文学、诗词，不会惹麻烦的。"他再解释说："因为他是和尚，难免对战争有些消极，但绝不是个共产党员。"

就这样，我又逃过了一劫。

第八章

桶底脱落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话到口边想一想，讲话之前慢半拍。不是不说，而是要惜言慎语。

军旅生活让我心疲力竭，我又开始想要逃亡。内心苦闷，不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是否能再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之前我以为战乱结束，我便能恢复和尚身份。但在军中几年后，我认清了这是不可能的事了。

内战如火如荼地持续着。战事进行到第四、第五年时，很明显地，我们知道返回大陆已不可能于短期内实现。

国民政府缺乏武器及军事人员。我们不知道是否能经得起这么一仗，自己是否仍能存活。无人安心，大家臆测着还有多少时日会重起战事，又会是怎么样地开战。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我想着，军人生涯，非我所属，非我所愿，却可能是我此生的命运，直到我死亡或被杀。

我开始思考逃亡，但已失去了衣袍，也没有勇气逃脱。有个人三次企图逃走，第一次失

败，被杖击臀部，直到皮开肉绽；第二次，被绑在柱子上，在烈阳下曝晒二天，不给吃、不给喝，就绑在那儿，撒尿拉便；第三次，他被枪决了。

虽然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但身为军官，我还是有时间为佛教杂志写些文章。一九五六年前，我的写作多是诗词、短文及小说，没有关于佛教的主题，没人留意我的文章。那年的春天，上海静安佛学院的同学建议我改变方向，于是我开始写些哲学与宗教的文章。

我的基督教上司给了我一本《圣经》。我花了两个月时间读完并做了笔记。他也给了我一些基督教批评佛教的书籍。我也读了一本佛教法师的著作，对佛教与基督教作比较，以及一本香港牧师所写的回应著作。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回应那香港牧师的文章，就这样，我开始写这方面的文章了。

我读了西方哲学的巨作、现代中国思想家的书，然后开始到佛教刊物投稿，内容是评论生命意义，无常、苦及孤独。我倡言我们要勤奋努力，以超越三界、生死的循环，不再生生世世轮回流转，直到所有的执著、业力都消除殆尽，不留痕迹。

我也探讨宗教与文学间的关系，并着眼于佛教经典对文学著作的影响。我认为佛教徒对文学应有更多的尊重，文艺创作

可以对社会、人类意识有很大影响，因此是非常珍贵的。

我在佛教刊物的投稿受到欢迎，也刊载出来了。当我从军时，必须放弃在狼山的法名——释常进，我给自己取了个名字，我用了我的族姓“张”，另外自己选了一个名“采薇”，以取代“保康”。

离营区不远的山坡上有间寺庙。我可以看到庙里的巨大佛像，因此我开始对着那尊佛像礼拜，没人来打扰我。我们队上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经常参加福音聚会。

我也有时间打坐了。我和几个人共住一间寝室，我睡在上铺，这也是我打坐的地方。同袍们知道我在打坐，不会来打扰我。床上没有床垫，只是一片木板。因为我是军官，有棉被。我尽可能地打坐，但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固定的时段或一定坐多久时间。有时我坐了一二个小时，人们进出房间总会打破宁静，所以只有短时间可以完全不受干扰。

军官有旅行的特权，休假时我常去寺庙，台湾佛教界正经历转变，岛上只有少数几间寺庙。在日本五十年的占领下，台湾受到深刻的影响，连台湾的佛教界也呈现出日本风格。当日本人离开后，寺庙的住持也返回日本，由居士们接手照料。庙里只有法会、宗教仪式，没有进修的佛学院、对外弘化活动，或修行的指导。寺庙负责人只有少数接受了僧伽训练，主要的

还是为往生者做些民间信仰的仪式及法会。

然而，这种情形已经开始改变。当我初抵台湾时，台湾只有二十至三十位的真正出家人。之后又有四五十位僧众从大陆来。有些人后来还俗，因为他们不会说台湾话，无法传扬佛法。当后来政府要求人民学讲国语，才发现那些来自大陆的僧众是非常杰出的。一些曾教导过我的老师，到台湾后也待了下来，他们是南亭老人、道源长老、白圣长老及妙然长老。

南亭老人与我有联系，非常关心我，常常送食物给我，因为他知道军队里没有什么吃的，而我也营养不良。有一次他送给我奶粉，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精制食品。我用热开水冲奶粉，溶解后加入饭里，吃起来非常可口，味道很香。我的伙伴们很嫉妒，说我是贵族才有牛奶喝。

南亭老人时常写信鼓励我，我记得曾经一度写信给他，告诉他我是多么沮丧。我抱怨军中生活没有自由。在回函中，南亭老人写到：“在这世间上，谁有自由？只要有躯体，就没有自由。”他勉励我，用我的身体来观察我对环境的反应，以身体为修行的道器。他写着：“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犹如在火宅中，但当佛陀住世时，就是佛国净土，度化众生。把军中的人当作你的善知识，继续修行；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得到解脱后仍住世教化，是为了帮助众生。”这封信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依

然保存着。

有一次休假，我坐公车去台北拜望南亭老人。他住在善导寺，一间由居士管理的日本庙宇。这所庙宇的管理者请他去住，但不是做住持。他每星期讲经一次，有几十个人参加。他居住的地方老旧斑驳，狭小局促。因为他在大陆是位知名的法师与方丈，有一些信徒供养他，其中不乏有权力的政治人物及将领。虽然他有供养金，但没人照料，什么事都必须自己来。当他写信给我时，他还必须到远处购买信纸及邮票。即便如此，他仍是许多从大陆来的僧众所羡慕的对象。他有地方住，有东西吃，还有资助他的学生。其他的僧众无依无靠，流离失所，无处安身。

当我拜访南亭老人时，他的房间是那么小，只有他容身之处，因此我必须站着。南老为了鼓励我，当我要离开时，他总会给我一张五块或十块的钞票，在那时，对一个穷军官来说，真是一大笔钱。

我也去亲近其他的长老。我去拜望住在台北十普寺的白圣长老。他的寺务繁忙，所以难以与他多谈。他总会问我："你有问题或困难吗？告诉我，我会帮你解决。"我也去拜望妙然长老，他住在乡间的一个小地方。没人帮他煮饭，却是他煮饭给大家吃。他平易近人，令人仰慕，也不吝于给人鼓励。

偶尔我会待在善导寺，当时台北最大的寺庙。那是日本净土宗的台湾总部，以信心为导的佛教宗派。大殿仿造京都的寺院，大殿旁的寮房拥挤不堪。我睡的那间房是安放骨灰罐的地方，是日据时代亲近该寺庙的日本信众在往生后的骨灰安置处。

我仍在窘迫、疑惑及离开军伍的渴望中挣扎。一年一年过去，我们开始听到传言：台湾七百万人口，而大陆近十亿人口。真难以想象我们要如何打赢这场战争。

加入军队的佛学院同学，当时多数都已逃脱，再回复和尚身份了。但因为台湾的社会不安定，所以他们也不是太快乐。人们散布谣言说大陆来的出家人是奸细。不少人被国民党政府抓了起来，关在牢里。没被抓到的人过着逃亡的生活，穿着在家人的衣服，住在民宅，伪装身份。他们不敢住在寺庙里。

我还是没勇气潜逃，待在军中总比牢中好。台湾的情况就像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小说《1984》中描写的极权政府，任何理由、任何时间，你都有可能被抓起来。查封、关闭，一天到晚都是如此，不需要法庭出状，就可以进行搜索及逮捕。因此我仍在军中待着，心情苦闷，怀疑我是否有朝一日还能恢复和尚身。

然后，我遇见了灵源宏妙老人(公元一九〇二～一九八八)，经此，我的人生出现了转机。

在我参访高雄一间新的寺庙——高雄佛教堂时，我遇见了灵源老和尚。老和尚从基隆来，挂单在那儿（日后有人捐了一块地给他，他就在基隆那儿起了一间庙)。僧众在外行脚，不住宿旅店，寺庙通常都会让他们挂单一两个晚上，这是一般的丛林习俗。

灵源老和尚个子比我矮，有个胖胖的肚子和一张圆圆的脸，当他打坐时，像个布袋和尚。他走路缓慢，说话轻柔。虽然他很少有笑容，但人们可以感受到他散发出来的慈悲，所以一点也不怕他。他穿的衣袍，通常都是缝缝补补的，他却一点都不在意人们是否会轻忽他。他没有一个大和尚的气势。他是浙江人，中国东海边的一个省份，在上海的南方，他不太会说国语。因为我是江苏人，所以能与他沟通。

虽然我身着军装，但他并没有把我当成居士对待，他听说因为房间不够，所以那晚我们俩必须同榻而眠。居士不应该与出家人共住一室，他说："今晚我们要一起参禅。"

当他出外行脚时，他不在乎是否有床睡。他只要有个地方可容他盘腿就可以了。那就像是打坐的姿势，不过他没有挺直上身。他的头低垂，就那样子睡觉。

有两部经典谈到睡眠瑜伽。睡姿需要练习，否则，当你睡着了，你的背会前弯，无法安适地入睡。经过练习，你就可以正确地坐好，而且能够真正地入眠。这种坐姿睡觉，能让人不做梦，可以得到真正地休息。当他这么坐时，他真的非常安稳，像一尊佛像。

我们坐在床板上，罩在一个大蚊帐中，一起打坐。然后，我疲倦地睡着了，非常轻松、愉快，没有做梦。当我醒来时，老和尚仍在坐着，我就跟着他继续打坐。

老和尚很少开口，除非别人先开口。“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我终于忍不住开口。

他回答：“可以。”

我先问一个问题，但突然间上百个问题牵引而出，一个比一个令人困惑。脱口而出的问题，如激流般地宣泄着疑惑与绝望：我还会成为一个和尚吗？怎么能够呢？我应该跟谁学习？成了和尚又该做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和尚？作为一个和尚，我要如何利益自己、利益他人？佛法是如此广大，像海一般深奥，我要从何处着手？无量无尽的法门，我该选哪一个？

我一直不停地问，期待这位貌似安然、自在的和尚，能一次就解答我所有的问题。但老和尚的回应，只是在我停下来喘口气时，问我：“还有吗？”

我继续掏心掏肺地，把所有的郁闷、疑惑倾倒而出。最后，老和尚叹了口气，举起手掌，重重打在床板上。

“放下！”他大声向我吼。

那真是令人震撼！顿时间，我的心像爆裂了。汗流雨下，重担消释。就在那一刹那间，云消雾散。重重包围的苦闷毒瘴，消失无影。取而代之的是内心的踏实与自在。我感到全身清凉，非常舒适，再有什么问题都是多余的。曾经有过的疑惑与绝望已无踪无迹了，这世界上已没有任何问题。那些都过去了。

我未说一字，继续与老和尚坐下去。我处在极度的快乐状态中。第二天，整个世界焕然一新，就像是我第一次见到一样。这是我与一位伟大禅师的初次际遇。他并没有把我当成是他的弟子。在我们离开时，我问他：“我该跟随您吗？”

他回答：“那是你的问题。”我没有得到他任何的鼓励或指示。不过，自那夜以后，我的心安定下来了。

我一样受到诱惑，有欲望、怨恨、恐惧、焦虑及虚荣等等情绪，但我能立即释放这些心理的反应。一旦解除了，我觉得非常的自在。譬如在往后的岁月中，政府希望任命我为国民大会代表，一个许多人都垂涎的机会，我却视其为诱惑，没有接受。后来在日本时，正值中日情势紧张，在冒着被遣送回台的

可能性下，有间寺庙的主人想要请我去做住持，并要将女儿许配给我，我拒绝了。在我遇到灵源老和尚之后，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人生是什么，以及要如何去做，我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蜕变。

是业力使然让我遇到灵源老和尚吗？并非真的如此，而是所谓的“善根”。佛教的业是指因果法则。当我们说这个、那个的发生是由于业，即是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我们过去行为的结果。如果以前我对我的邻居态度恶劣，那么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当我的汽车电瓶没电了，上班也迟到了，他不会愿意来帮我充电。如果我向来对我的邻居非常友善，他会介绍我一个好的包工，帮我盖露台。这是对“业”的简单解说，但如果你一旦开始去检视业的运行，你会发现“业”真是惊人的复杂！

善根与业相关，但不尽相同，它说明一个事实，如果曾在往昔修行，即是播下了一粒种子，那今生会对修行有兴趣，或修行能得力。通常我们把遇见明师、修行得力，或速解法义归因于善根，意思是一个人在前生曾经修行，而且发愿来世要精进地修行。

所谓的“因缘巧合”是指过去生与人结了善缘，而今成熟。每个人在过去生都做过好事，结过善缘。有些人不去培育、长养它，那它就不会成熟或浮现；其他的人长养它，它就会孕育

成形。我尽心尽力地使自己再恢复出家身，与我的宿世善根及过去生所发的愿有关。因为我的愿力强，过去生结下善缘、善行，因缘能够成熟。每个人都有这种善缘与善行，但如果他们的愿力弱，就不会那么快地成熟了。

当我遇见灵源老和尚时，我正在休假，我可以跟着朋友们四处玩乐，但是我去了一间寺庙精进修行，去阅览经藏。我相信灵源老和尚与我曾在过去生相遇，也结了好因缘。所以，当我想再度出家时，凭借着我的愿力——这种人类所能做到最深、最重的允诺与承担，他出现了，助我前行。直到今日，我仍是自在的，没有任何东西束缚着我，名、利、权势、女色都无法办到。纵然有无数无量的责任在身，我不觉得被束缚住了。

这些体验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的侍者最近煮地瓜嫩叶给我吃，我告诉他可以把根种到土里。他漫不经心地种下去，三天后全死了，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栽种，所以在沙石土壤中掘了个洞栽植。当他看到地瓜叶没长出来时，显得很困惑。所以我教他如何种植，后来叶子便长出来了。这也正是灵源老和尚为我所做的，他教导了我如何生长，才不会在军中的砾石瘠土中死去。

第九章 自由了

当我结束休假，从寺庙回去后，我像是获得了新生命，准备面对新的机会。我已下定了决心，要离开我服役近九年的军队。

我投稿到《人生》杂志已经有一阵子，这是由一间位于北投的中华佛教文化馆所发行的期刊。发行人是东初老人，他喜欢我的文章。我去拜访他，建立了友善的关系。

有一天，他突然问到："你曾一度为僧，想再度为僧吗？"

"是。"我回答："只是不知如何进行。"

当时他没说什么。

一个星期天，当我去拜访他时，东初老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富裕的郑夫人。

东初老人说："这年轻人是个和尚。"

郑夫人打量着我，说："他是位军官，身着军装。怎么可能是个和尚？"

东初老人告诉她我的故事，在年幼时出家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在生活中，不妨养成"能有，很好；没有，也没关系"的想法，便能转苦为乐，便会比较自在了。

做和尚，后来离开大陆，加入军队。他接着说：“郑夫人，是不是能帮他什么忙？”

她问：“他在那儿驻守？”

“他是您同修郑介民将军的部下。”老和尚说。

郑将军那时的职位是安全局长，类似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他直接面对总统，负责国家安全。

“真的？”郑夫人惊呼：“他是我先生的部下？”

实际上，我是郑将军的非直属部下，但安全局对我从大陆拦截的无线电通讯、电话通话、电报及传真都非常有兴趣，所以，我是受安全局监督。我的工作是将所截取的密码，尽责地呈报上去给安全局的专家们去解码，之后便不会再听到回音了。

东初老人告诉郑夫人我病了。我一生都在病中，不只是患过肺结核与疟疾，导致脾脏终生有问题，十岁时还从树上跌落，尾椎骨折。我从未告诉父母这事，怕他们责备我乱爬树，我的脊椎并没有痊愈。我的颈部也受过伤——在跳鞍马时头部落地。

在军中，我苦于睡眠不足，常常值夜班，白天睡觉时常被寝室中来来往往的走动声打断。我也常舍弃睡眠的时间去读书、写文章。起初，我很庆幸有那些时间做个人的事，但第一

年过后，睡眠不足的问题来了，饮食无欲，人瘦得像皮包骨。

郑夫人跟她先生说了我的情形。她请我去他们的寓所见郑将军，他们家正好坐落在文化馆对街。我没抱着太多希望去见这位杰出又有势力的人物，不以为真能有什么帮助。

郑将军令人印象深刻，就中国人来说，他的身高非常高，几近于一百八十公分。他是广东人，讲广东国语，我几乎听不懂。他有忠诚、不腐败、不贪污的名声。在我们会面时，他很少开口，只问了几个问题。

会面近尾声时，他说："你是个好人。我们怎么能帮你离开军队呢？特别是在这种极度缺乏人力的情况下？"

我说："郑将军，我病了。"

"什么样的病？如果你是真病，你应该去看医生，拿证明。"

我必须坦诚告诉他，医生们拒绝给我开证明。郑将军听完后，沉默不语，也结束了我们的会面。然而郑夫人却没受影响，不改初衷。她在安全局帮我安排了一个体检，我告诉医生，我有慢性病，不容易诊断。我有一百七十公分高，只有四十二公斤。我提及头常常会晕眩，医生同意是有问题，便检查我的血液。他发现我有严重贫血。我告诉他我背脊有问题，他检查我的脊椎，发现尾椎骨处确有问题。他说："当你久坐

时，一定很痛。”他照了肺部的X光片，发现黑影。他也发现到我牙齿及鼻子有问题，送我去医院，结果医院给了我一个证明，可以请两次各三个月的病假。我很高兴，照了X光片，各种检验结果及诊断报告终于检查出我身体的病。

病假期间，我待在营房。病假过了，我的单位要我回去。我去做了检验，我的病情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医生说："那表示你还好，应该回去工作了。"

我去找郑夫人，告诉她这些情况。她打了电话给医生，又给我批准了六个月的病假。当时任何人拿了超过一年的病假，就可以离开军队，所以我申请退伍。

我的上司把我叫进去。他说："你知道我们这单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我知道，做情报工作。"

"那就是说，任何在这单位工作的人，活着时是情报人员，死的时候，也是情报人员。"

"我知道那个规定。"

"因为你是做情报工作，所以你不能退伍。"

我又去找郑夫人，告诉她："我应该合乎退伍的条件，回去过出家人生活，但我的上司不允许。"

她说："这些人真顽固，我再去跟我先生说。我很少要求

他的帮忙，为了你，我会跟他再开口一次，我从来没这样做过。因为我是佛教徒，我觉得你当和尚会比当军官对人贡献更多。我的先生不会这么认为，因为他认为军队比佛教重要太多了。虽然我怕他，但我会再去跟他说情。"

当人们知道我见了郑将军二次，他们心生疑问，像我这样一个最低位阶的军官，几乎是不可能见到像郑将军那种阶级的将领。当我见到郑将军时，我对他的位阶及威严感到敬畏。在我的眼里，他是那么巨大，超乎常人。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位法师，拿了博士学位后，再看到这些高阶级的将领时，不再觉得他们是巨大、崇高的了。他们看起来和一般人一样。他们老了些，穿着平民百姓的衣服。他们与一般人无异，其中有几个人也成为我的皈依弟子。

在郑夫人说过之后，郑将军以他个人的官方信笺，写了封信给我的上司，要我的上司在法律范围内协助我。虽然我认为这封信可能是无用的，我还是拿给了我的上司。他扫视过信后，把信还给我，说道："他要我在法律范围内帮助你，我应该怎么做？"

一个月后，我上司的秘书打电话来，叫我进去。我以为他要把我关起来，他说："这里有几张表，我不知道是否能帮你忙，但将军说填好再说。不保证一定成，我们还是得在法律许

可范围内行事。"

我想，何必麻烦呢？但我还是把表格填好了。令人吃惊地，两个月后，我以慢性疾病的理由从军中退役下来。郑将军在我退役前一天过世，我为他诵了经，第二天我获得了自由，重新拾回人生。

整个诉请退役的过程历经十八个月，当你年轻时，满心期望地等待着东西，时间就像是无止境似的。回顾前尘，我认知到如果不是因为我有一颗非常坚强的愿心，想要回复做出家人，我大概不会成功，想从我那个特殊的军中单位离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一九六〇年的一月一日，我正式离开军队。那年我三十岁。

第十章 棒下出孝子

早在我投稿《人生》杂志之前，便见过东初老人，当时我还在军中服役。他在大陆颇具名望，是焦山定慧寺的方丈。定慧寺是著名的禅寺，位于江苏省会镇江的焦山。该寺建于公元前一九四～一九五年间，先后数次更名，最后在清朝时定名为定慧寺。该寺坐落在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位居数百公尺高的浮玉山上。

我在上海读书时，东初老人曾来参加上海静安佛学院的会议。一些他从前的学生称他为“东大炮”，因为他常常骂人，尤其是当他骂人时，声音很大。他是一位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会抨击那些思想陈旧的人。害怕他的学生会转学到静安就读。

东初老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很深刻。他有一副威严的方脸和壮硕的身材，举止行仪如祖师般，而他才四十岁。走路时，似将军般威风凛凛，但异常稳重。我们一般小辈都不敢与他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四安：安心、安身、安家、安业。
四要：需要、想要、能要、该要。

交谈。

东初老人来台湾的时间比我早，但是我没有刻意要拜见他，因为我想见的自大陆来台的法师很多。我在上海的同学——《人生》杂志的主编性如法师向我邀稿，因此我用“醒世将军”的笔名投稿短篇小说、诗和散文，名声渐为人知。从《人生》获得的稿费，是我在军中薪饷的数倍，此后我便经常投稿，但总没有机缘遇见东初老人。一直到佛诞节时，经由主编介绍才相遇。这次庆典是由“中华佛教联合会”举办，我们把一尊悉达多太子像放在一盆清水中，每位信众问讯后，舀水自佛陀的头上淋下。这仪式提醒我们，菩提心是每时每刻都存在我们的内心，藉着浴佛，让我们的菩提心清净，修习成佛之道。

“你想见东初老人吗？”主编问我：“他在这里，我可以带你去见他。”

我说：“他没有说要见我。”

“有的！他说过有机会时，想见见你。”主编向东初老人介绍我，说：“这位是醒世将军。”我说：“我见过您，但您不认得我。”

东初老人似乎并不特别高兴，只说：“有空就来坐坐吧。”

一星期后，我去他所创建的“中华佛教文化馆”拜见他。只见馆内四壁藏书满满，我真希望有机会能一一阅读。在那时

代能拥有如此多佛教书籍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大藏经》，佛教的三藏宝典——“经”（佛陀的教诲）、“律”（戒律仪规）和“论”（对佛所说之法的论著）。书架上还有二十五史，以及其他宗教、哲学、书画等书籍。

东初老人举止从容优雅，但似乎有些冷漠。他很友善地接待我，并询问我在军中的生活。当我离开时，他给了我一个红包，我满怀感激。他看似冷漠，但却给了我那么多钱。

他说：“你放假时可以来，我们没有什么好吃和好玩的，但是我们这儿有书，欢迎你常常来。”

此后我常去拜会东初老人，并写文章投稿他的杂志，我们没有谈论过我的将来，但我觉得他一直在观察我。

我告诉东初老人当我退役后，希望能够再重返僧籍。

他说：“那很好啊！”

我问：“但是应该去哪儿呢？”

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抉择。”

因此，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没有意愿收我为徒。于是我就去一一拜访诸山长老，除了南亭长老之外，他们都愿意收我为徒。南亭长老和东初老人是同门师兄弟，同在一位师父座下。南老说：“我现在有一位徒孙，年纪比你大。这道场很小，因为他已经是一位讲经说法的法师了，如果我收你为徒，他应该

要怎么对待你？你将会长他一辈。”

我问：“那我应该到哪里再去出家呢？”

“你真傻！东初老人曾经帮忙你，要对他感恩。快去见他，成为他的弟子吧。”

“他并没有说要收我为弟子。”

“你要请求他接受你，跪下来请求他。”

当我抵达东初老人处时，我不知道如何启齿。那感觉就像是当初离家去狼山时，及日后赴上海，站在渡轮的船头前迎风伫立时的感受一样，茫茫然不知前程。

一开始，我就全身紧张地说：“东初老人，我找不到师父收我为徒，我愿意去的地方不要我。”我详述与南亭长老会晤的情形。

东初老人以他具有威仪和无所动容的表情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等着。我知道我必须尽力恳求他慈悲！我唤起所有他曾对我有意，及慷慨给我金钱的回忆。我战战兢兢，奋力前扑，屈膝向他跪拜，恳求他收我为徒，让我回复出家身份。那是个不顾颜面的情绪流露，我感觉到生命的转变就在这一线之间，心中对再度出家的渴求驱使着我，叩头触地，迫切地诉说着渴望及需要。

东初老人斥责我：“起来！起来！”但是没有说要接受我，

所以我仍旧跪着，并且说："感恩您的帮忙。因为我来这道场时间也很多，与您真的很亲近。"

东初老人最后终于问我："那你再度出家后要去哪里？这里很小。"

我说："我无处可去。"

他说："如果你不介意这地方那么小，可以在此试试看。"

但是我注意到他没有肯定告诉我是否可以在他座下出家，确认传统师徒的关系。

我又进一步地说："我实在很希望能尽早恢复出家人身份。"那时我觉得实在无路可走，所以，当我跪地求他时，我实在是跨出了无法回转、命运交关的重要一步。

他点头说："好，我会选一个日子给你剃度。"

我满怀着感恩与振奋的心情，站起身来向他鞠躬致谢。

那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东初老人主持了一场佛七，邀请了数位外地来的法师主掌法器。在法会结束的前一天对我说："明天我会给你剃度。"

我回答："明天？我连僧袍也没有。"

"什么僧袍？当我们成为僧众时，我们就是捡他人的破旧衣服穿。"

他询问其他的法师有没有任何旧僧袍可以给我，这些法师

都知道“醒世将军”就是我，其中有些人是我在大陆时的同学。他们说：“我们会想尽办法给他找衣服。”

他们当天晚上回去，隔天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其中有僧袍和内衣裤，大部分都太大或太短。

我对师父说：“这些衣服都不合身。”

他说：“以往出家人都穿别人的旧衣服。如果可以修改，他们就修改。如果没法修改，拿到什么就穿什么。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出家人是到坟场捡拾那些包裹尸体用的布料，冲洗清洁后就穿上身，这些给你的衣服已经是不错的了。”

我知道后便拿了这些衣服。有些很短，但我依然穿上身。

参加法会的信徒们都走了，只剩下两位法师。

东初老人说：“现在我给你剃度。”

我疑惑地说：“要有人在场见证，我们应该要让一些信众留下来见证剃度仪式。”

东初老人严厉地瞪着我说：“我就知道你没什么好！这么自负！这是你第二度出家为僧，而且你已经三十岁了！当我三十岁时，我已经是方丈了。”

我实在无话可说。就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六日，东初老人为我剃度，赐给我一个“慧空圣严”的法名。剃度仪式只有少数人参加。来宾就只有莲航法师一人。

从此，我的训练也就展开了。在剃度仪式之前，东初老人从来没有责骂过我。当他接受我再度出家时，责骂我就是合宜的，而且往后的责骂还会更多。

我搬进文化馆三个房间中最小的一间。几天后当我安顿好，东初老人就叫我搬进大的房间。他说："你是一位作家又喜欢阅读。你应该要有大的空间来阅读和写作。"

我高兴地把我所有东西都搬进大房间去。第二天他对我说："你的业障很重。我恐怕你没有足够的福德待在大房间里。我想你还是搬回小房间比较好。"

我有点气恼，我才刚搬进来，但因为是他的意思，我就顺从了。几天后他来看我，说："你知道吗？你应该搬回大房间。你是对的，你实在需要地方来放你的书，以及足够的空间来写作。"

我说："师父，不用烦心。我可以住在这小房间，不用搬了。"

他那张方正的脸，以严肃的态度看着我说："这是我的命令，你该搬去大房间。"然后提起脚跟，迈着将军般的威风步伐离开了。

我还是搬了。在我搬过去还不到半天的时间内，东初老人又出现在房门口说："你是对的，你还是住小房间比较好。你

不必把你的行李搬过去，只要人过去睡就好。"

又过了几天。他告诉我把所有东西都搬去小房间。要搬的东西很多，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几天后我们来了一位客人，那天夜已深了，东初老人来敲我的房门说："让我们的客人住小房间较为适宜，你何不今晚就去睡大房间呢？"

稍后他告诉我，把小房间空下来做客房比较好。所以，我应该搬去大房间。那时我生气了，说："为什么你一直要我搬过来、搬过去？"我抗议着："我已经搬了五次，我不再搬了！"

这位身型如山，曾是大陆最著名之一的方丈咆哮着说："这是我的命令，我要你搬，你就得搬！"

我怯怯地走开，又开始再一次艰巨的搬迁过程。我没有选择，这就是师徒间的伦理。弟子对师父必须唯命是从。

东初老人依旧要我搬来搬去，我愚蠢的脑袋最后终于明白了，这就是他对我训练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再抗议了，就是照搬。当我变得只是遵行，不踌躇、不抗议和不厌恶时，东初老人就让我住定不动了。

很快地，我投入了文化馆的日常生活节奏。每天早晚都有禅坐。早课以后、晚饭以前，我们都要在菜园中做活，包括东初老人在内。鉴心师和锭心师二位尼师也住在文化馆内。我们

用菜根、果皮、老叶和户外茅坑内的排泄物混合一起做肥料，以今天的标准来说是不合卫生的，但是园中种植出肥美的蔬菜，供给我们食用。多年后我在农禅寺开垦广大的菜园和果园时，东初老人的菜园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我们的物质生活很简单，豆腐、花生米是我们最好的佳肴。早餐我们有豆腐乳配稀饭。每星期我们会买两块豆腐，切成薄片，东初老人让我们每人吃一立方寸大小的豆腐，他自己也是一样。他吃炒花生米，每餐只吃七粒。我曾问他为什么？他说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

当我的老同学辞去《人生》杂志编辑后，我便接替下来，写评论、散文，处理读者来信，收发手稿、校正、设计和编排版面。我从零开始学起，我连运用各种不同字形和大小的字体都不懂，而印刷公司的工人也帮不了什么忙。他们不做校对，有一些还是文盲。每次排好一页，我就必须校对三次，但依然有错误发生。

更难处理的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不被容许刊登任何批评政府或其政策的言论，凡是触及政治的文章，我们都要特别小心。

当杂志印好后，我还要负责寄给订阅者。虽然我们索取订费，但我们常常免费寄给各佛教团体。我的单银是台币二百

元，大约是美金五元。要支付交通费、旅费、膳食、邮寄及其他费用。

熟人劝告我："不要再替你师父主编这份杂志了，他付给你做主编的单银相当于一个木工或水泥匠一天的工钱。"也常有人劝我去帮亡者诵经，一天就可以赚两百元。然而从过去的经验中我知道，当你没有时间修行而有钱挥霍时，人很容易沉溺在坏习性中。我的努力受到嘲笑，大家说："你是受过教育的，但是没有钱。你编杂志每月才二百元，而且这钱还不是花在你自己身上。"

我告诉东初老人这些嘲讽，他说："如果一个出家人只想着钱，那他就不应该做出家人，出家人是为了奉献而来的。"我明白了。

东初老人鼓励我多看经书、写文章和进入社区民众里。他说："你该去弘扬你所懂的佛法，如果你只留在寺院里，那就太消极了。"

那时来道场的人不多，在台湾几乎没有人讲授佛法。东初老人要我带着佛经，去向那些等公车的民众讲解佛经内容，他要我在街上和那些陌生人分享《人生》杂志，并做公开演讲。基本上，他要我采取基督教传播福音的方式去弘法，因为他们做得非常成功，他们甚至会来寺庙里传播基督教的福音！

东初老人继续不停地以种种的方式考验我，这是日后我才明白的。当我被派去买米和油时，他给我的钱只够买东西，不够坐车。一包米对我来说太重了，我扛不回来，只好求那些卡车司机载我一程。当我的师父知道这件事情后，他对我说："很好，你给那些帮助你的人有机会做功德。"

我想他们能做出什么样的功德？他们只帮过我这一次，之后他们不会再出现。但是我已学会了不要违逆东初老人，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当我被派去远地办事，像是去台中时，东初老人只给我一半的车资。

我对他说："钱不够。"

他责骂说："你真笨！你现在有的钱够你买半程的车票，当你上了公车或火车后，你假装入睡，这样就可以一路抵达目的地。"

东初老人要省钱，并且也想看我如何去处理这种情况。有一次，车资不足，我被赶下车来，真是个丢脸的经验。从那次以后，我恳求车上的其他乘客帮我付不足的车资，其实也没有多少钱。这种方式被东初老人认可，他说："你让那些人修行佛法。"

东初老人没有很多钱，只靠信徒微薄的供养和印行经书的少许利润过活。我终于明白，当他派遣我出去而不给我足够的钱，是他训练我的一种方法，就像是养蜜蜂而不是养鸟。当鸟是宠物，需要人饲养时，它们会忘记如何独立生存；而蜜蜂不需饲养，只要蜂巢在花丛的附近，它们就会去采花粉造蜜。这样蜜蜂不但可以获得自己的食物，而且人们还可以拿蜂蜜去卖钱。

有一天，我的师父指示我去佛前礼拜。拜了几天佛后，他对我说：“这是一间佛教学院，你却什么贡献也没有，去写些文章吧！”

他要我写的文章都是在骂人。我说：“如果我老是在骂人，那每个人都要讨厌我了。”

“你可以用笔名，反正你是一位刚出家的人。你应该发声，主持正义。”

于是我就写骂人的文章。他看了以后说：“你写得太差，骂人骂得太过分了。”

他一篇也没登。他说：“骂了这么多人，你造了很大的口业，应该去礼佛忏悔。”

我又回去礼佛了。一天，他对我吼着：“你在浪费时间，

向一尊木雕像顶礼，一点用都没有。你应该去好好看一些经书。”

他吩咐我去看大部的经书，不要看那些小的。《华严经》有八十卷、《大涅槃经》有四十卷、《大品般若经》有六百卷，我从《大品般若经》开始读。

几天后，东初老人问我：“看了多少卷？”我说：“三十卷。”我是一个看书很慢的人。

他咆哮着说：“你太慢了，太多的业障阻碍，像你这样读书，跟虫在爬一样，有什么用。快去佛前礼拜，长点智慧吧！”

所以，我又去拜佛了。几天后东初老人再次痛骂我：“圣严！看看你，你这样做毫无用处。你应该做一些实在的事情，把你自己变得有用些。你的礼拜就像是狗吃屎一样。”

我问：“那我该怎么办？”

他指向一堆砖头，那些砖都被灰泥黏在一起。他说：“那道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我们信徒捐赠的。堆放在那里闲置着，实在是太浪费了。你去把那些砖块重新整理好。”

我小心翼翼地把砖块分开，放得整整齐齐，预备着东初老人随时可以用。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做，觉得进展得相当好。但当东初老人看到我所做的，竟然骂我：“我叫你去整理

砖块，可是你真没用，这些砖块本来是好好的，但是你却把它们弄开打碎了。你要把它们黏合好。”

我看着那堆破砖想着：真糟糕，这样做不仅没有意义，又太麻烦了，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些砖块再黏好。我抗议着：“我不知道怎样做，不可能把它们黏好的。”

东初老人巨大的身影，双手交叉环抱胸前，以严峻不妥协的面孔看着我，斥责说：“你真没用。听说过大海捞针吗？那才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无法把砖块黏回去，供日后使用？”

从那时起，东初老人没有再叫我拜佛、写文章或看经书，我必须要把砖块黏回去。我觉得实在是浪费时间，终于鼓起勇气，去问东初老人：“是否真的值得花时间，把这些砖黏回去？”

他回答说：“你的时间值什么钱？你在这里白吃白住！有什么问题吗？快去把这些砖块黏好，不要浪费财物。”

这就是师父的指令，我只好继续去处理砖。起初我真是束手无策，后来奇迹般地，变得容易多了。我终于看出这些砖块是怎么拼成的，我可以一天黏回三块。我用了十五天的时间把所有的破砖黏好。我不知道当我把它们黏好后，师父要怎么用，我只是照着做。

当我完成后，师父吩咐我：“现在把这些砖堆起来。”

我问：“这要怎样做？这些砖都破掉过，没法撑得住。”但是他坚持，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去外面休息一会儿。就在我走着走着时，一个念头生起——我看到野芋的大片叶子。

我把几块砖放在一片叶子上，砖头上面再放上一片野芋，然后再放上几块砖。这样子我就可以把砖一层一层叠上去，而不会倒下来。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这工作完成，每一天我都想跑走，这工作实在是太令人厌烦也太荒谬了！

当砖块叠好时，东初老人露出了难得的欢愉。他大笑着说：“你被捉弄了！哈！哈！哈！”他非常自得其乐地说：“这些砖是没用的，为此你一定对我气极了！”

我悻悻地说：“我是有一点生气。”

他说：“但是你还不错，你的确是非常有耐心。”

或许因为我显现了耐心，东初老人让我平静地生活了几个月，接着有一天他指着厨房墙壁上瓷砖脱落的地方，对我说：“圣严，你要把它修补好。去建筑材料行，买一模一样的瓷砖回来，把掉落了的地方补回去。”

很好！这看起来不像是个太困难的工作，我经常被派去做这种小差使，我完全不知道好戏就在后头。

我进城买了我认为是一模一样的瓷砖。当我回去后，我的师父说：“过来看看，它们并不一样。你要拿回去退，并买回

完全相同的瓷砖。”

我仔细察看这些瓷砖，的确，虽然我买回来的新瓷砖跟旧的看起来很相似，但它们不是一模一样的。不过你必须非常仔细去查看，才能注意到，这点差异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正要提出抗议，但一看到东初老人的面孔，我就把嘴闭住了。我只好再回去那家瓷砖行。他们不高兴看见我，我只买了三块瓷砖，现在又要回来退货！他们拒绝帮我找我要的瓷砖。当然，我知道这不会是个好结果，但我又能够怎么办呢？我回去告诉东初老人：“师父，我找不到同样的瓷砖。”

“为什么找不到？”他问。

“仅仅是三块瓷砖，瓷砖行的人拒绝去找。”

“这样你就放弃了？你真是笨头笨脑。去找找看是哪一间窑厂造的。”

我跑遍城里的每家建材行，询问一个荒谬的问题，打听是哪一间窑厂烧出这三块不起眼的瓷砖。没有任何人有丝毫的兴趣。这是可预料到的，我一筹莫展，并开始觉得困窘。终于运气来了，我遇到了砖厂的工人，虽然他不能确定那些瓷砖是不是他们造的，但他告诉了我窑厂的地点。

我到了窑厂，墙上挂满了一排排的瓷砖，但是我找不到完全相同的。我问窑厂的人是否可以替我烧瓷砖。他问我要多少

块。我告诉他："三块。"

他说："我们是经营批发的，我不可能只烧三块给你！"

我恳求地说："请帮帮忙。东初老人一定要我找到三块跟我们厨房墙壁上一模一样的瓷砖。"

他解释说："每一批出窑的瓷砖，在颜色上都稍微不同。你是没法找得到同样颜色的。"那店员告诉我，有另一间窑厂，位置在很远的地方。

我问："我会在那里找到一模一样的瓷砖吗？"

他反问："我怎么知道？"

我觉得没有希望，回去告诉师父，这工作是件不可能的任务。我解释着："每一批瓷砖在颜色上都有稍微的不同。"完全没有抱任何希望，不知此事能否就此打住。

他说："昨天我打听到这些瓷砖是哪里来的。"

"那我该怎么去那里？"

"你真是白痴！一路上问就问到了啊！"

那地方很偏僻又远。我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一路上，恳求别人替我出车票钱并徒步四处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我询问这些瓷砖的事，那负责人说："我们烧过很多瓷砖。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是不是我们烧的？你需要多少块？"

我说："三块。"

他们看着我，以为我是失了心神："你一路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三块瓷砖？我们太忙了，没时间卖你三块瓷砖。你应该到建筑材料行去找。"

我回去了，什么也没买到，他们一定认为我是神经病。回程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的师父才是发疯了，提出如此不合理的要求。

我告诉东初老人："他们不肯卖给我三块瓷砖。"

"你真是死脑筋。你只要问是哪一家建筑材料行购买他们的产品，然后去那家店买就成了。在那窑厂时，你应该问清楚，然后直接去买回来，不就办妥当了嘛！这不是很容易吗？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说这么多了。"

我觉得又累又沮丧，忍着气说："仅仅才几块瓷砖而已。"我感觉到我好像是一个三十岁的小孩。天呀！我曾是军队中的军官，出版社的作家，而现在却在全台湾到处找寻瓷砖。"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买三块颜色相似的？毕竟只是厨房的瓷砖。"

他说："你在说什么！如果我把两片胶布贴在你的脸上，永远留在那里，可以吗？"

我一语不发地瞪着眼。东初老人命令我再出去找瓷砖。我四处游荡，没有去任何地方，脑中悬念着东初老人的无理要求。我下决心要离开这道场。

当我回来以后，径自走入我的房间，沮丧到了极点，麻木无知觉。东初老人探进头来："你一整天到哪里去了？"我拒绝跟他说话。

他走开了，接着拿了三块瓷砖回来，惊呼着说："我们真是幸运！我找到了三块从前厨房整修时留下来的瓷砖，它们夹在墙上的裂缝里。"他看着我笑："哈！哈！哈！你又被骗了。你是一个和尚，怎么可以气恼呢？我逮住你了。真是十分好玩啊！哈！哈！哈！"然后，他就离开了。

我应该火冒三丈的，但奇怪的是，我内心的沮丧消失了。他离开后，我坐在房里，感觉平静，情绪一扫而空，我意会到，我并不想离开东初老人。寻找瓷砖是他对我的一种训练。

东初老人对我了如指掌，他顺应着我内心的变化。第二天，他对我非常好。有访客带给我们来自菲律宾的布料。

他说："圣严，你出家已有一阵子了。我没给你什么，这块布料你就拿去做件长衫吧。"他请其中的一位客人替我量身。我深深体会到他的关爱，我怎么会有离开他的念头？为什么我会变得如此沮丧和厌恶？四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保有这件衣服。

当我开始接受师父的训练时，我认为他有双重人格。后来

我才了解到这是他调教学生的一贯作法。他在焦山佛学院时，对待那些学生就和对待我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这么害怕他的原因。他认为一个出家人应该承受得了压力，他也是这样被他的师父训练出来的。中国人相信“棒下出孝子”和“香板下出祖师”，这种锻炼会把你的自我和傲慢逼压到无可遁形，然后它们就消失了。

在古代，禅师们都是如此训练有潜能的弟子，对那些没有什么潜能的学生，就会比较宽松。如同耶稣所说：对那些迷路的羔羊，需要被引进羊圈，加以保护。同样地，在日本，职员都要经过“魔鬼训练”，才能变成好职员。

虽然东初老人折磨我，但他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像恶魔。他喜欢开玩笑。在他面前，要有一定的坐相，背脊要直，双掌交叠。站着时，操手低垂着头。我始终无法弄清楚他的指令是否根本就是胡闹，我不敢违背他。然而他经常提醒我，在他身边时，不要感到害怕。如今我也是如此教我的弟子。我不希望他们当我不在时，放纵自己，而在我面前时，却又因为害怕才恭敬合掌。

通过东初老人的训练，我对自己了解了很多。我有一个特性，会抗拒我认为是不公平的事情，会对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事情而起烦恼。经过了东初老人的训练，我去除了这个习性，在

面对人生时，少了些自我中心。我尝试去了解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发生，但不会被它所困扰，也不会感到太丢脸。刚开始被赶下公车的时候，实在是感到很羞耻和丢脸，然而经过了这训练，我会把那种状况当成是一个修行、学习的机缘。

在我跟随东初老人两年后，我决定去山中闭关。我认为闭关能帮助我，在未来为佛教尽点心力。我发下誓愿，不以私心修行，修行不是仅仅为了自求解脱。我要遵循大乘佛教的宗旨，“自己未度先度人，正是菩萨初发心。”我告诉师父，我会努力修行，不会辜负佛法。

他说：“重要的是，不要对不起你自己。”

我不懂他的意思。这段话让我深思了很久，后来才明白。虽然我的誓愿是为了他人，东初老人看清楚我还是自私的。他认为我离俗出家及度众生的誓愿，不过是嘴上说说的空话。他促使我对自己负责任，明白一个出家人的使命。如果我不能够履行我的责任和做我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我就是对不起自己。这才是他的真意。

他要我过一个真正出家人的生活，持戒、修定，长养智慧与慈悲，以及坚忍。他不希望我发空的誓愿，而要我清楚明白我的初心本愿——当初为什么要出家为僧?

在中国的禅宗传统里，有这样的说法："脚跟不着地而行走四方，是危险的。"

东初老人的忠告是正确的。所以，当我训练弟子时，我不会教他们成为一位大禅师，大法师，或一位有成就的出家人。我要他们做三件事：第一是要养成出家人的正确心态；第二要有合宜的出家人举止——出家人与在家人的仪态、脸部表情和姿势不同；第三说话要得体——出家人不说粗俗语、流俗语或闲杂语。我们不说绮语，不闲聊没有意义的事情。

合宜的出家人举止——这就是我师父说"不要对不起你自己"的意思。这可能要花十年的时间，才能养成合宜的出家人举止。老一辈的老法师常说，出家的头十年，做梦时，还弄不清楚自己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梦里还会做出和在家人一样的事情来。但十年后，即使在梦中，你不会再忘记你是出家人了。

在纽约东初禅寺初创时期，我有一位女弟子想出家，她住在那里有一年多。有一天她进来见我，告诉我她不能够继续走出家的路。

我问："为什么不能？"

她说："很难为情，我想还是不要说的好。"

"为什么？妳做了什么坏事？"

“在梦中，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纵情，并且发生了关系。这样我怎么可以成为出家人呢？”我说：“只要你不是在白天里和男人发生关系，就没有问题。白天你可以控制自己，在梦中你还不能控制自己，因为你还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我问她还想成为出家人吗？她回答：“我试试看。”

数日后，她告诉我仍然做着同样的梦。

我说：“你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消除这种习性和心态。出家以后，它也许还会持续下去。”

这就是我所教导的出家心态。这并不容易，只有通过修行，心念的转换与养成，才能确立地肯定自己是出家人。否则，即使住在道场，并修学佛法一百年，在梦中，你依然是个在家人！

第十一章

野生地瓜叶

朝元寺是我闭关的地方，坐落在台湾南端一座金字塔状的尖山山脚下，四周长满了野生的藤蔓和盘绕的树，拥有浓密的热带丛林，这种南台湾特有植物生态，再加上炎热、潮湿的气候，使人感觉犹如置身在菲律宾或南海岛国。

东初老人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早离开，我只跟随了他两年左右。在我走之后，就没人做我的杂务和继续编辑《人生》月刊，因此这份杂志停刊了。但我内心强烈渴望能沉浸在佛教文献中，拜忏求悔、读经，没有外务牵绊。我认为了解佛教经论对修行来说很重要。一般人认为坐禅的人，不一定要懂佛法义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修行者必须要有义理的基础，而我希望在闭关时，得以整理这些浩瀚的佛教经论著述，并让一般人能了解与接受。

我是怎么闭关的呢？在一九六一年初，我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四感：感恩、感谢、感化、感动。
四它：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

就知道了道源长老要在年底传授三坛大戒。我请求东初老人允许我去受戒，因为东初老人虽然为我剃度，但我还没有正式受过出家人的具足戒。同时，我告诉东初老人，我计划受戒后去闭关，但他不赞成。我每天礼拜观音菩萨，忏悔罪障，祈求我可以去受戒和闭关。

东初老人不是唯一不支持我闭关的人。在我当兵时，很照顾我的南亭老人，也觉得我不该离东老而去。而且他也不认为我可以获得闭关所需的资助。那时，智光长老愿意资助我一年新台币一千元。然而我打算用我在军队时所存的军饷，总数超过新台币一万元，应该足够我三四年的用度，所以我没有接受智光长老的资助。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直无法下决定是否要离开文化馆。我觉得对东初老人有责任，我也认为出家是要摆脱世俗的依恋、情感羁绊。我感恩东初老人帮助我再度出家，他的帮助就像是一座桥接引我过了河。如果为了情感的依恋而攀附在桥上，那应该去追求目标的时间就会被荒废掉了。

虽然我已经有了决定，内心仍受着煎熬。我是东初老人唯一的弟子，心负愧疚，但我还是得走。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向东初老人告假，意外地，他非常高兴而且要给我资助。我觉得惭愧而没有接受。东初老人

默默地送我到大门口，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回头看了几次，一只狗夹着尾巴垂丧地站在那儿，东初老人则静静地站在门边，看着我离去。

原先打算在闭关时支用的军中粮饷，被一位在上海求学时的同学借走了，人也失踪了。结果，我东拼西凑筹了一些钱，去了南台湾的僻远地区，读经、写作与修行，把遗失了多年的修学时间再弥补起来。

在朝元寺和人口稠密的平原之间，一条蜿蜒的溪水，从陡峭的尖山（又名大雄山）直泻而下，延展流入台湾海峡。这条溪水是天然的屏障，在雨季时，将寺院隔绝于外在的世界。雨季来临时，山上汇流下来的雨水涨满了溪谷，溪水深及腰部，湍流不息。年纪大的比丘和比丘尼都不敢渡溪，深怕会被溪水冲走。只有年青的出家人甘冒渡溪的危险，采买日用品和带回外界的消息。

这溪水守护着寺院不受外界的干扰，形成修行的好地方。那儿没有游客，没有信众，没有人来烧香，是一处偏远、隐蔽、宁静的地方。

寺院在山坡上盖了三排房子。当我初抵达时，没有闭关的独自生活空间，住在寺院客房的阁楼里。客房后的山坡上种

满了荔枝和竹子。寺院僧众采收、出售荔枝，换取食物和日用品。他们还种植一种麻竹笋，长到三四寸粗时，就可采收，然后腌干贩售。寺院的菜园里，还种植了白萝卜、胡萝卜、白菜、绿叶蔬菜、菠菜、高丽菜、茼蒿、地瓜叶和槟榔，生活非常简朴。僧众们以水果、竹笋和自种的蔬菜为炊。

当寺院四周的树都开花时，空气中充满了芳香。我们还有许多“玉兰花”，一种香气浓郁的花，可拿到市场去卖。我们也会把这些花沾着面糊油炸来吃。我吃了太多的“玉兰花”，连身体都会发出甜美的花香来!

那里有一种热带植物，同属仙人掌类，茎上开的花可以拿来煮汤，味道像是有黏液的秋葵。还有一种长在十尺高的野树上的美味豆子，每当我入山时都会采摘回来。

在我开始闭关的前半年里，我学着去适应山居生活，每天日出而起。在寺院里我们没有时钟或手表，生活随着太阳作息。在溪水对岸山脚下的小村里，一群公鸡的啼叫声唤醒了我。它们会啼叫三回：第一回在日出时，第二回是在上午九点左右，当太阳在东方照耀时，第三回是在下午四点，当太阳西垂的时候。

起床时，僧众会击鼓；午斋前敲云板和鱼板；睡觉前会敲钟和击鼓。所以，我不需要有手表或时钟。我只需要去听这些

声音就可以辨别时间，知道应该做什么事。

在我来到朝元寺半年后，在寺院旁的闭关小屋建好了！每天早上，我闻鸡啼起身，盥洗、喝杯水，拜佛十分钟后，就去打坐一小时。早课诵经约一小时，然后做两个半小时忏悔礼拜。午斋后小歇，继续做两个半小时的拜忏。接着，做晚课、用药石。药石后，净身、打坐。当钟声和鼓声响起时，我知道该安板养息了。

这间寺院建于一九一一年，房子的泥砖不是窑场烧制的砖块，而是僧众收集山上的黏土和草，放在木制模子中打造出来的。墙壁是两道泥砖砌成。外墙的砖是横向叠起，内墙是竖向堆砌。这样设置的墙壁绝缘效果很好，屋内冬暖夏凉。房屋主柱是用树干，小柱则用竹竿，都是山上出产的。就这样他们盖起了二层楼的房子，楼层很低。

屋顶的主梁是树干，桁梁是用等长的竹竿排列而成，中间留有空隙。竹竿上放置两层屋瓦，一层屋瓦朝下，另一层朝上。如此就能挡住雨水。

虽然这房屋的设计在许多方面都很实际和舒适，但它却构成了无数的裂口、凹角和缝隙，是许多众生群居之处。木窗上没有纱窗，当窗户打开时，而大部分时间窗都是开着的——

令人惊奇的各式各样的昆虫都会跑进来。大尖山盛产昆虫和植物。蝙蝠在天空飞来飞去，小壁虎在墙壁和天花板之间窜来窜去，忙着捕捉蚊子和其他的飞虫。

有一回，一条比我的手臂还粗大的蛇，出现在我房间的大梁上。它的头向下垂，就这样停住不动有半天之久。起初它伸出舌头来，后来，连这动作也没有了。

它好像是在受苦。我们从村里请来了一位捕蛇者，当他看见这庞大体积的蛇时非常高兴，心想着这可是一顿上好的晚餐。

我恳求着说:“请不要杀这条蛇，它在这房里一直受苦。”

寺院内的人凑集了一些钱给捕蛇者，以换取蛇的性命。

这儿还有老鼠，房内没有东西给老鼠吃，但它们依旧来拜访，当它们沿着屋梁上奔窜的时候，眼睛还盯着我看。拜忏时，我会替它们祈祷，因为它们也是众生。我祈求它们来世能转生为人，也能修行。过了六个月后，我就搬入寺院旁的小关房。拜忏是我修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业障深重或心浮动不定，拜忏是有用的。我自认业障深重，不然不会在军中待了十年。因此我礼拜观音、祈求、忏悔。我在军中并没有做坏事，只是我所接触的人、我所听到和做的事情与出家人的生活不相应。譬如军中的饮食，几乎都是

荤食，为了生存，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把肉从菜盘里挑出来，只吃肉边菜。

在军队中，我也接触到在家人的生活，我听到也见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听了和看了那么多以后，虽然我没有像他们一样，但他们的行为似乎对我来说也不算异常了。我的同袍们常常闲聊女人、喝酒和赌博，他们经常换女朋友，一点点的小事也会动干戈。在军中服役数年后，我在梦中梦到的自己是个军人，而不是个出家人，这就是习气使然与环境的熏习。

当我礼拜时，我拜的是大悲忏，是宋朝天台大师知礼法师所创建，每诵一句佛名或菩萨名就顶礼一拜。而观音菩萨是最主要的，起先我顶礼约十二次，每一次都是随着一句佛名或菩萨名。然后，我跪下，诵一段经文、礼拜，称诵观音菩萨的功德。我双手合十绕着房间外围慢步地持诵大悲咒二十一次之后，跪下称扬咒语的力量和功能。我称诵十方佛、十方法、十方僧，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陀罗尼王各三遍，然后诵三皈依——佛、法、僧。这段持诵约要一个半小时。当持诵时，我一句一句慢慢地观想。譬如当我称诵观音菩萨的功德时，我会观想这些功德。当称诵咒语的功能时，我也会观想这种功能。

因为我希望在佛法上有厚实的基础，我就开始研读《尼柯

耶》，那是初期佛教的经典。及稍后期的汉译《阿含经》。另外还有律藏，一部释迦牟尼佛向弟子宣说的行为道德规范。我首先阅读律藏。律藏共四百五十册，每册有一万字，总共有四百五十万字。之后我阅读《阿含经》，三百册共三百万字。这些都是古文，没有分段和句读，因此十分难读。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读完这七百五十万字，不过这也是因为在这段期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打坐上。

阅读完经典，我就阅读中国禅宗的广博文献。禅宗与佛教八大宗派的文献共有七百五十万字。阅读完禅宗文献后，我阅读佛教历史和传记，共六百册六百万字。

阅读经典是为了查证我内心的体验，并没有寻求其他特别的个人利益，我想把佛法的教义整理出来，使佛法在日后更为人所知和理解。我相信佛教的典籍已经很久没有人去整理、归纳了。佛教的历史久远，宗派很多，一般人是不容易了解这些复杂的典籍。我撰写学术书籍，也写一般大众书籍，让大家明白，即使佛教有很多派系，它们都是同一味的佛法，只是以不同的层面与观点去解说。所有派系都有共同的目标和基础，我希望把佛法整理成易了解吸收的系统，以便更多人能明白佛法的道理，并能运用在生活中。

打坐也是我这六年来闭关的重要修行，但打坐时发生什么状况是不必谈论的。即使在教禅坐时，我也不谈论，我只教大家怎么打坐而已。当用文字描述出来时，它就已经与原来的体验不一样了。有些人会听到声音或看见影像，这些都是幻觉，这在佛经里已有无数次的记载，在禅坐中有这些经验是正常的！

禅修正确的原则或目标是减少执著与烦恼，以正向的态度面对世界，而不是被矛盾、冲突所牵引。当遇到矛盾、冲突时，我们要正面地运用它。举例来说，在我闭关时，我的小房间里有很多的动物、昆虫，但是我不受它们干扰，不认为它们是妨碍。我的内心世界是浩瀚广大的，不受限于现实环境。

当我看见动物在我房里觅食，我观察到弱肉强食，我知道这自然界的运作法则。我看见青蛙迅捷地伸出舌头吃苍蝇和昆虫。我意识到动物世界就是这样的情况；众生是无明的，类似弱肉强食情况，大概在人类之中也存在着。这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见到的世间现象。

当老鹰吃蛇时，人类会射杀鹰吗？如果是这样，那是无明的。慈悲的主旨是不伤害众生，我们无法阻止众生间彼此互相的伤害，因为无明是我们的天性。

在这六年的闭关期间，生活非常平静。我有一些很特殊的体验，我听见蚂蚁的声音，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从蒲团上飘浮起来。在这期间，我的心很平静。情绪也很稳定，难得有些许的情绪波动。

对我而言，禅修与宗教信仰是有别的，而宗教信仰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在宗教上体验是源自于我的信仰，当我遇上困难时，我会持诵观音菩萨圣号。我在军中时，经常持诵观世音圣号。当我参加军官的资格考试时，我只有相当于小学四年级的程度，所有其他参加考试者都读过大学。但是我信仰观音，恳求菩萨加持。结果考题出来，都是我学习过的。本来我连参加考试的资格也没有，但我仍然被允许参加。所以我相信是观音菩萨在帮助我。

从军队中退役下来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是从事于无线电通信的情报工作，得侦察、收集机密和敏感的讯息。但是我持诵观音圣号，终究还是恢复了自由身。当我想去闭关时，很多长老都告诉我，以我这样一个刚从军中退役的人，要找一处地方来闭关是不可能的。但我信仰观音，最后有二三处地方，可以让我从中选择。我有许多类似的宗教体验。

至今我深信着，不论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持诵观音圣号，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是为什么我从不担忧的原因。有

坚强宗教信仰的人，通常都会有这种安全感、意志力、勇气和信念去面对任何情况。

禅宗的禅修有别于其他的宗教体验，能帮助我安定心性和提升人格。在深层的禅坐状态中，我感受到和宇宙共为一体，这就是禅宗所说的“统一心”。自我中心消失了，但是宇宙大我的念头还存在，这时心量是非常广大的。只要是还有一个“我”的感觉在，那么感受与宇宙合而为一，即是禅坐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你感受到与上帝合而为一。通常人们最多只能达到与四周环境统一，我就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有一次，我在曼谷和一群人一起旅游。当大家都在喝咖啡时，我却在禅坐状态中，注视着河里的鱼。大家感到奇怪，我会对河里的鱼产生那么大的兴趣。然而我是在禅坐中，与四周环境合而为一了。当我看着鱼时，感觉到我就是在水中，优游地在它们之间游来游去。

禅坐中幻境可能会出现，但是最好是不要注意。我闭关时，在一个清朗的晚上，我正静静地坐禅，忽然听到狂风暴雨声，我出去查看天空，却只见晴空、满月。还有一次，听到屋后的树倒塌落地。我的心被声音打扰了，跑出去一探究竟。当然树仍然是完整无缺，但当我回去再继续打坐时，我的心已被扰乱了，不能安定下来。

又有一次，我在打坐时，感觉身体从蒲团飘浮起来。这不是幻觉，是真实发生的。我觉得很惊奇，也很迷惑，怎么会浮起来呢？但当心动了之后，我就慢慢下降回蒲团上。这些都是在我闭关禅坐时所发生的事情。

这些禅坐上的体验无论多么的令人向往，但都不是开悟的经验，开悟见性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禅坐不能让人见到自性；宗教的体验也不是开悟。见性是见到空性，而不是达到了统一的境界。“见性”是没有任何执著。许多人以为不可思议的神秘经验与开悟相同，这些经验可以从禅坐或宗教的体验而来，但是它们都不是开悟。

闭关期间，往往早上醒来后，只一眨眼就到了夜晚。有好几个人来探视我，其中包括东初老人。那时我也完成了几本有关佛教历史、比较宗教学、佛法和禅的书。即使在闭关，我也不停地为世间服务。正好这段期间没有人打扰我，所以我可以去阅读、写作和修行。

在闭关时所写的《戒律学纲要》和《印度佛教史》二书，在大陆文革后，就被当做教材使用。台湾的大学采用了《比较宗教学》一书作为参考书，《正信的佛教》在民间则是一本流通很广的书，在全世界已销售了三百万本以上。当我闭关时，

大陆和台湾的佛教正在衰微中，只有极少数的信徒从事于日常的修行。知识分子认为佛教是没受过教育的人的迷信。那时基督教很流行，台湾政府的高层官员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虽然仍有一些官员私下默默地修行佛法。

我常为文指出佛教在今天社会中的问题，从我的经验里，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寺院维持生计的三种方式都与传授佛法无关。这三种方式是：举行经忏和替亡者诵经，接受游客的捐款，及在山上务农耕作。僧众实际上几乎是农民，这是长久以来他们最成功的维生方式。没有人去教授或学习佛法，大部分僧众都没受什么教育。而这些现象我都曾评论过。

在我闭关的后期，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杨白衣居士，在看过我的书和文章后，从台北骑着摩托车来看我。这么远的路，单程约有六百公里，一路上尽是尘土飞扬。而杨白衣真是了不起，每次都带来超过一打以上的书，这是从别人的废物堆中收集来的，很多内容都是关于日本佛教的。

我在闭关时自修日文，所以能阅读日文书籍。看完这些书后，我停止撰写批判的文章。南亭老法师鼓励我改变这种做法。他写信告诉我：“批评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己站起来才有用。”东初老人也来信说：“如果你现在批评别人，你往后也会

受到果报。"

而且，自从我阅读了杨白衣带来的日本书之后，我充满了希望。我清楚地知道在日本仍有好的佛教学术研究，得知日本有超过五百个修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在研究佛法，这在中国来说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在明治时代，日本政府就像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样，展开消灭佛教的运动。明治天皇强迫僧众吃肉、结婚，并且要住在神道的寺院里，而神道的信众则搬进佛教寺院。结果佛教与神道教就混合无法区别了。在明治末期，佛教复兴了。许多从前的僧众都回到佛教的寺院，但是他们还是保留着他们的妻子和肉食的习惯。这就是日本佛教寺院可以吃肉和娶妻的演变经过。

这些吃肉和娶妻的僧众对佛教研究有很多的贡献，他们送人到德国和印度留学，研究梵文，孕育出许多有名的佛教学者。我认为佛教在日本，能在几近于完全消灭后，还能够存活、复兴，那么佛教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复兴起来。

我在闭关时，实际改变最大的是我对人的态度。我开始是评论批判，不只是普遍性地对人类，更是针对佛教在中国腐败的情形做批判。在闭关结束前，我停止了批判。我了解到要求

别人改变是没有用的。改变自己才是唯一靠得住的。

在我闭关的最后两年，我与一位曾出家过的居士张曼涛通信，他正在日本留学。他写："你出关后，来日本一趟，观摩一下。"他叙述日本佛教界的动态和浓厚的学术风气。"来一趟，看看喜不喜欢，你不一定要待下来。"

曼涛是个特别的人。他没有工作也没有钱，但是他却有一位妻子。他居然能够支付起学费和生活费，因为他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喜欢交朋友。认识的人都愿意提供他膳食和收容他。不过他并没有完成博士学位。

当我终于要去留学日本时，曼涛已经回到台湾。然而就是因为他的鼓励和讯息，让我觉得我一定要去日本。

曼涛不是唯一力劝我去日本留学的人。在我闭关的中期，东初老人来函说："尽早提前出关，不要只住在山上。今日的年轻人应该出国到日本留学。我会支付你所有的费用。"我不敢相信东初老人愿意或能够资助我去日本留学，而坚持完成全程的闭关。

我那时认为，东初老人是想要我早点出关回去他的道场，继续在那儿工作，因为那时我的师弟已经离开，只留下师父一

人。这是当时我猜想东初老人的动机，但是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当时他在研究日本文献，之后也去了日本收集资料，写了一本《中日佛教交通史》。他很重视日本，年青时曾在日本住过，也会说一点日语，但是只住了几个月，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就离开了。他要我去日本留学是有道理的。

后来，当我想去日本，他说："当初我叫你去日本，本来是打算要资助你在日本的学费和生活费，你不想去。现在你想去，我也帮不上你了。"这是东初老人训练弟子的方法，鼓励我们自立自足。他不是不支持我去日本，而是训练我应该要自寻其路，自谋生存之道。

第十二章 批评与害怕

在我闭关之前，一位年老的居士来拜访我，问我："你想要做怎样的和尚？"因为在闭关时应该勤奋用功，所以别人想知道闭关以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就如同他们想知道一个陶器在炉火中烧过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离群索居对多数亚洲人来说是残酷的，单独监禁在东方的刑法系统中是最严厉的处罚，比死刑更甚。经过长期闭关的僧侣，很自然地会被认为是已得道的人，他们会受到尊敬并被视为不平凡的人。

然而，是否真正能得道，在于他们在闭关中做了什么。有些人出家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此生要做什么，出家后仍然不确定，所以就去闭关，不过他们得先找功德主来赞助。我见过一些关房，门上有着几百把的锁，每把锁代表一位功德主。这些僧侣整天为功德主的家人诵经。三年闭关只为他人诵经，可能不会为自己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四福：知福、惜福、培福、种福。能要、该要的才要；不能要、不该要的绝对不要。

带来什么进步。虽然这样的做法是很可悲的，但能够完成三年的独居生活，还是很了不起。

闭关没有让我变成像一件烧过的陶器般地坚硬定形。我仍然还未决定要把自己定位成法师、禅师或律师，也还没有选定要仿效四位高僧中的哪一位。要像太虚大师——倡导提升出家人品质，以及改变寺庙产业所有权的宗教改革者？或成为另一位印光大师——鼓励在家人修行的净土宗奉行者？或是要学习弘一大师——以前曾是艺术家，后来严格遵守戒律，并且把训示写成优美的书法？我也许也可以像虚云老和尚一样苦干，奉献自己来重建许多寺庙。

在我入关前，这些高僧就往生了，我觉得自己不可能仿效他们，但我却想尽全力效法释迦牟尼佛。在闭关期间，我体认到了与他朝夕相处、共同生活的情形。我知道我要继续跟他学习，但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我将来会成为什么人？会做什么？这些都要看未来有什么样的因缘会成熟。很多人都试着替自己设立目标，例如赚多少钱、写多少书等，这种目标并不可靠。在未来，个人的健康及所处的环境，将影响你真正能达成什么样的事情。

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和尚，他是位优秀的作家，人非常聪明。他出的书得过奖，也写过政治评论，大家都认为他以后一

定会成名。可是他的僧袋中放着许多女人的照片。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女人的照片？”我问他。“这些女人一直送我照片，我不想无礼，所以就留着了。”他说。

这位曾经自诩成就会超越太虚大师的和尚，最后却舍戒还俗了，因为他吸引太多女人了。我想，这个教训是：我们不该吹嘘自己将来会变成样什么人，而是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人。

当我出关的时候，台湾是个文化与知性的沙漠。全岛仅两份报纸，而且都受到政府的控制，只有少数几种文学杂志。书店很少，出版物也很少，当作家是无法过活的。学校里教艺术，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有时间欣赏艺术，或有钱花在上面。几乎没有专业艺术家、音乐家或舞蹈家，所以只好收听电台转播的体育节目了。运动团体都属于军方，非民间的，因为一般老百姓连吃都吃不饱，怎么可能去参加比赛呢？艺文生活只有在军中才有，无聊的军人会演演戏。当几位香港影星访台之时，全岛便为之风靡。

对于和尚，人们存有相当大的歧视。尽管我已经在一些著名的报章杂志上上刊载过文章，颇有知名度，但还是不准到大学就读。他们认为佛教的出家人不可能有足够的学养与知识去

接受高等教育。台湾的知识分子、教育家和政府高官，都认为佛教只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社会底层分子所信奉的宗教。那是因为佛教徒常常也参加民间信仰的活动，他们礼敬诸神和民俗英雄。寺庙是为了礼拜有神通的神明而建的，因此佛教和道教的雕像往往并列其中。中国人通常不太深入宗教，尤其是高阶层分子。接受西方教育的富人有时会成为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即使他们是少数人，却非常有势力，与政府高层和其他知识分子维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佛教徒并没有那种关系。

事实上，佛教徒中的知识分子很多，许多曾在日本受教育的台湾本省人，也是佛教徒，但难以打进高层社会，因为他们多半讲日文，而台湾的高官是来自大陆的国民党人士，他们都是讲国语。

我成为了一位行脚僧，到处开班授课。我在高雄与台北的佛教学院授课。我的书，包括《印度佛教史》、《比较宗教学》、《戒律学纲要》等，实际上都是为了这些学院而写的。我把授课的资料收集起来编纂成书。那时候并没有太多人编写教科书，因此我的书十分受欢迎。根据上课的教材，我陆续写了很多本书。在这漫长的一生中，我总共出版了超过一百本中、英文书籍。

在学院授课之余，我也去别的地方讲课。我常和学生们做些非正式的交谈。我教他们打坐，也找他们一起喝茶。老一辈的教授不欣赏这种兄弟般的亲密交往，他们认为和学生闲聊是有违伦理的。当我还是佛学院学生的时候，老师们总和我们保持很远的距离。我们很害怕和老师说话，如果没有适当的理由，是不会接近他们的。

在其他方面，我也是个被议论的对象。军中时期出版的那些文章已经让我在台湾小小的佛教圈内出了名，我也因为批评别人而打出名号。别人害怕我是因为我无法预料，没有人知道我还会斗胆再写些什么。他们倒不是怕我会变得比他们更有影响力，而是因为我有了以笔伐人的名声。我不是恶意批评、恶心相向，而是希望为佛教注入新的观念。

我鼓吹现代化的佛教，把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中。批评我的人不喜欢我用现代的语言来诠释佛法。例如，我提倡僧众应该用佛法来祝福新婚夫妇，虽然僧众不应该为人撮合婚姻。我觉得新人应该被允许在寺庙中结婚，才能学到如何把佛法运用在家庭生活中。很多人批评我，他们说："寺庙是清净的地方，应该不准女众进入，你怎么能提倡在寺庙里结婚？"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这么认为。由于我以前常常批评别人，所以别人批评我也是对的。听到别人议论我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报应。常

常有人在课堂中或以文字来批评我——但从没有人当面批评过我。

另一个使我总是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我并没有选择追随特定的佛教宗派。当时台湾的佛教团体都很小，大都只有上百人，各个团体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也没什么组织。他们比较像社会集团，通常是以外省人或台湾人来做分野。我会加入他们或参与他们的活动，但我不与他们交际，也没有刻意选择哪一个社团。我甚至没有参加我师父的团体，因为我不喜欢交际。我是个孤独者，每当有人邀我参加社交活动时，我总是说："我没有时间。"

时间并不是我不想参加活动的唯一因素。闭关让我离群索居，我的修行和我与佛陀的关系，远比社交更重要。我也发现，我对周遭事物的敏感度增加了，直觉也增强了。当别人在谈论我时，我可以察觉得到。当某人来看我时，即使他并没有和我事先约好，我也会知道。我感受到这个人正在来的路上，或者在想到他两三次之后，他就出现了。当我问他为什么来，他会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见见你。"或者"我梦见你，所以想见见你。"当我的师父东初老人要我离开关房时，我也感觉到了，果然两天之后，我就收到他的来信，告诉我出关的时候到了。后来他往生的时候，我也同样感觉到了，即使当时我

是住在几千里之外的美国。

我并非唯一拥有这种直觉力的人。小孩子有时候会感觉到母亲在念着他，所以会打电话回家。修行人更容易发展这种直觉。我不是在谈神通力，有神通力的人可以随时听到或看到自己想听到或看到的事情。禅宗是趋避神通的，即使大师们在修行后拥有神通力，也不会谈论它，也不鼓励别人修炼这种能力。神通力看起来好像很有用，但即使你知道了别人不知道的事，你能帮助他们改善人生吗?

宇宙间的平衡是诸多因素运作维系的，即使能运用神通力避免掉一些不好的事，也只不过是延迟它的发生而已。同样的因缘终究会以另一种面貌呈现出来。

佛教规定非常严格，不许僧众显现或使用神通，我自己也不想拥有那种能力。当我感觉到它时，并不会特别去注意它。例如，有时候我感觉到当地的土地神或鬼魂出现在大树下、墓园中，或阴暗的地方，我也不担心他们。如果我念着他们，会使自己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人们可能会希望我当个“驱鬼”的，在他们感到不平安时，帮他们查看家里有没有鬼魂，但我可没兴趣担任这种角色。

第十三章 在日出之国

一九六九年，我三十九岁时，留学日本，在立正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我参加了佛教的座谈会和研讨会，有些是国际性的，世界各地知名的学者都会来此演讲。

学校外面也充满着蓬勃的学术气氛，一般的日本人对不同的宗教都很感兴趣，而且也很了解，报章杂志也刊登着宗教活动的文章。日本国家电台 NHK 为宗教团体设定时段，播放宗教的研讨会。台湾的人民虽然可能是位教徒，但在宗教事宜上，却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迎接西方文化的国家。只要欧洲有新书出版，一定会翻译成日文。只要有新的科技出现，日本人一定能很快就学会。我感觉到在那儿呼吸到的是来自全世界的空气。

日本人对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旅客和学生很友善，有一次我在东京迷了路，向一位路边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感恩能使我们成长，报恩能助我们成就。
感谢给我们机会的人，顺境、逆境，皆是恩人。

的建筑工人问路。他不确定我是不是了解他所说的，便亲自带我去到站，帮我买好车票后才回去工作。有一次，甚至有人替我出钱买了车票。

在日本，有太多的不一样了。我所去过的每一个家庭都是整齐、而且干净的，超级市场里所有的货品也都是整齐地放在架上，台湾的市场则是脏乱的。日本料理不像台湾料理那么的油腻，所以比较适合我。

日本的文化和知性生活十分有趣。地铁和巴士上的乘客总是在看书，即使是一般的普通人——工厂工人、小企业老板，看起来也很有知识。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很出色，博物馆陈列着连大陆或台湾都没有的中国艺术品，想要研究中国艺术的中国人一定要到日本去。

日本的民主制度是当时的台湾所无法想象的。人民会用带有政治色彩的卡通来批评政客和政府，有时非常严厉，但他们却从不批评天皇。还有，一年两次，分别在春天和秋天，学生或工人会在街上举行示威游行，造成交通堵塞。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他们会在额前绑上布条并和戴上面罩来遮挡住脸，只留下眼睛，以免参加游行的事情会影响他们的学业或工作。工人们会为了弱势团体的权利或为了抵制一些政策而示威。示威行动有时非常激烈，警察的镇压也导致了暴力，但是日本社会

并不会因为示威游行而陷入混乱。游行似乎很有用，代表了一种民主的行动方式。

日本的传统宗教，有许多概念与仪轨源自于中国，但仍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其中两个明显的例子是“净土真宗”和“日莲正宗”，它们都是日本化的佛教宗派。台湾的佛教则是明、清二代发展出来的产物，而中国大陆的佛教则是根源于明朝之前。在日本，我看到了从中国古代一直贯通到现代的佛教修行方法。譬如在奈良和京都，佛教寺院遵循着唐代的传统；在靠近东京的仓市，则是遵循元朝的传统。

日本也有一些新兴的宗派，如“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灵友会”等，还有许多在家居士营办的小组织。他们提倡把佛法融入到现代社会里，并带领青年团体、妇女团体，以及不同年龄的团体，举办适合会员参加的特别的活动。传统佛教并没有这样的做法，新兴宗派的传教方式像基督教一样，挨家挨户去敲着各家的门来接引人。

我很喜欢参与日本许多不同宗派的修行活动，对每件事都感到好奇。我也参加过许多次不同禅寺举行的密集禅修活动。我参加过日莲正宗的禅修营，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也参加过藏传佛教的禅修营，并参加其他新兴佛教团体的聚会。每

到一处，他们都认为我应该加入他们的团体，因为我很容易便学会了他们的修行方法。但最后，我仍然选择了禅宗，我不需要其他修行方法。我很感恩伴铁牛禅师，他是一间寺院的住持，教法以严厉著称。我参加过几次他在日本东北地方举行的冬季禅修。那间寺院在冬季是酷寒的，而他也似乎有意要让我特别难过，他命令助理不时地打我。参加的禅众中，我是受过最高教育的人。“你们学者都有浓厚的我执与烦恼。”他说：“你的业障很深重。”

日本那里有着各种不同的佛教修行法门，令我很惊讶。有个地方，禅坐非常严格，但在结束后，除了老师外，每个人都会掏钱买酒，好在用功修行之后放松一下！我问其中一位成员，他是位和尚：“为什么在禅坐后要喝酒呢？”他回答：“因为我没在禅坐时开悟。何况，这不是酒精，我们称它为般若汤，也许喝过后会开悟呢！”

“酒精会让我们愚痴。”我说：“它不会让你开悟的。”

他笑我：“你怎么知道？你连酒都不喝，怎么算是男人？”

有一次在一个非常严寒的冬天，日本立正大学的一位同学带我到日莲宗的主要的寺院去参加禅修。接待的人要我先去看看我们之后将要做的事——早餐后，他们用毛巾把全身搓擦到发红，然后，把井中的冰水泼向自己，大家喘着气，大叫：

"喔！喔！喔！" 水蒸气从身体里冒出来。我知道我不能用这种方法修行，心想："这不是佛陀教的方法。" 以我的健康情况来看，我如果脱下衣服，把冷水淋在身上，我一定会感冒的。不过我还是在那里住了几天，住在居士区的个别客房内，并参加了他们的早晚课。当我参加这些日本禅寺的修行活动时，他们并没有把我当作是个出家人。

我曾在一个新兴佛教团体中有过一次非常强烈的经验。我当时参加他们一年一次，为期二十一天的修行活动。这个团体非常精进用功，修行方法很强调观想。当我一心深入时，自我感消失了，而且开始以一种自己不了解的语言在说话，有其他学员说我说的是梵语。

"梵语是这样吗？" 我问，因为我不认为我说的语言听起来像梵语。

"梵语有几种不同发音方式，" 他们说："你是在唱诵梵语的咒语。"

我立刻制止自己把它当作一个奇怪的经验，因为一旦认为它很奇怪，就是排斥它，我就让咒语自然地流泻出来。我发现自己在每一个修行时段，都会诵出不同的咒语。当我们练习着

打手印时，有时也会诵出不同的咒语。这些咒语会改变，因为他们并不是经由我的意识或意愿念诵出来的。通常我会先打手印，然后才诵出咒语。

这个团体中许多加入已久的人都还没有这种经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我应该加入他们的团体，并为他们宣传的原因。其中一位和尚带我到离我所住的东京非常远的九州去，我在那儿住了几天。他的父亲、母亲和女友都对我非常友善，他们都是日本僧侣。他告诉我许多这个团体中的生命故事，要我加入并将它弘扬到台湾。我离开日本的时候，他送给我一套和尚袈裟。对于加入那个团体，我没有兴趣，但仍很珍惜那套袈裟。

消息传回到台湾，说我随着几个不同的团体修行。老朋友们担心我会误入险途，但我心中十分清楚，不会的。

在日本待了六年后，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是研究十六世纪的蕅益智旭大师，他对我的影响很深远。与他同时代的禅师大多擅长机巧的言辞，能说许多公案或是自相矛盾的话。(如"单手拍掌的是什么声音?"便是著名的公案。)蕅益智旭大师严厉抨击他们缺乏佛法修行与理解。他倡导学术研究及经论的研讨。他认为，如果禅师不了解佛教的学理，就不懂佛法，也

不懂得如何教人佛法。同样地，如果禅师不了解大乘戒律，也不持守戒律，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禅师，因为他们不是如实地过着修行人的生活。

他认为佛教学者也应该修习禅法并且持守戒律，因为若不修行，就无法炼心并消融烦恼。虽然蕅益智旭大师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我仍然不认为自己是位禅师、律师，或是论师。我只是一个和尚，我只是随顺着生命的因缘，成为我需要成为的人。

第十四章

前进西方

在美浓闭关的时候，有一位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侨民詹励吾写信给我，赞赏我所做的事。希望能来探望我，顺便喝杯山茶。

我不确定他的意思，回信说：“欢迎到山里来，但这里的茶味道淡了些，如果你不介意，就来吧！”

他回信说：“我已喝过你的茶了。”他是借用了一则禅宗赵州禅师喝茶的公案，当人们向他求法时，他总是说：“喝茶去。”

人们以为这样的开示饶富深意，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神秘或奥妙。禅在生活日用中时时映现、回应所需。人们上山参访，因长途跋涉而口渴，所以要他们喝茶解渴。这句话没有特别的涵义，只是满足所需。

之后，当我在日本修改论文准备出版时，詹励吾又写信给我。问我拿到学位后，有什么计划？他邀请我到加拿大去，他在尼加拉瓜瀑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遇到好事，要随喜、赞叹、鼓励，并且虚心学习。
少批评、多赞美，是避免造口业的好方法。

布地区有八十英亩的地，希望我去建庙。并告诉我他将会为我在多伦多大学的维多利亚学院成立一个教授讲座。这真是个绝好机会，我非常兴奋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美国佛教会的共同创办人沉家桢居士，帮助我取得入美签证。沉居士是来自上海的银行家，在香港有间贸易公司。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移居美国，开创了航运事业，非常成功。他在香港期间，便对佛教产生兴趣，后来他成为佛学研究与发展的重要护持者。他赞助我留学日本，那期间我们常常通信。他从未告诉我，他就是赞助我的人，他只是表示热切的关注与兴趣。

当我告诉他到多伦多教书的计划时，他建议我先申请美国签证，之后再去加拿大会比较容易。他寄了申请表格给我。那时，宗教人士取得签证很容易，我的申请很快就批准，在论文出版后，我就赴美了。

我在一九七五年的冬天抵达纽约，直到次年五月才去多伦多。詹励吾居士对我的延迟到来颇不高兴，这是第一个失望，自此也揭开了一连串的失望。他发现我的英文很差，他以为高学历的人都应该懂英文。如果我在维多利亚学院教书，他必须替我找人在课堂上做英文口译。

我也经历了一些失望，我获知他在信中提及的八十英亩地，其中只有五英亩用来建庙。庙建好后，其余的土地将盖公

寓大厦，寺庙不过类似观光景点。

我问他：“盖庙的钱从哪儿来？”

他说：“你要自己去找。”

我说：“我没有钱也没有信众。”我不知道要再说什么，他一定是以为我像虚云大师一样，随处都有人支持、供养。很惭愧，我让他失望了。之后，我告诉一位在家居士说，我和詹居士之间的认知似乎不太一样。

他说：“你是一个出家人，为何不能放下？”

他是对的，这位在家居士教了我佛法。

我犯了一个错误，但无须懊悔，我学会了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

我在维多利亚学院的第一堂课，是谈比较中日佛教的异同。这个主题显然没有引起加拿大学者与学生的兴趣。只有一位亚洲宗教系的学生感到兴趣，力促大家来听课。

沉家桢居士找到一位译者，是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他的英文非常流畅，但对佛法所知有限，对于我提到有关中国和日本的人名和地名不太熟悉，把听众弄糊涂了。因为大部分的听众是对亚洲文化有兴趣的教职人员和学生，所以翻译错了他们都知道。

"你应该要先给我讲课摘要。" 他在上课完毕时，很生气地对我说。

"你不是联合国的即席翻译吗？" 我问他。

"我在联合国只担任特定专业领域的即席翻译。别的主题，我必须预先做准备。"

挫败一个接着一个而来，我了解到在这所大学任教是不可能的事了。在维多利亚学院又做了一次演讲后，我就离开了。整个计划取消：包括一系列的学术演讲、在詹居士的土地上建庙，以及他争取这项计划所做的努力。我必须面对现实，失败就是失败。我鼓起勇气来到加拿大，但成事的因缘没有具足。我太天真了，没有事前想清楚，光有勇气是不够的。我还是感恩詹居士给我这个机会，所以失败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没有去加拿大，沉家桢居士也不会邀请我到美国。

我决定接受沉居士邀请，前往纽约市布朗区的大觉寺。我的入美签证仍然有效。否则，我大概只有回日本教书了。我不想回台湾，我在那儿有云水僧之名，而且是个有争议性的云水僧。自从我赴日本求学后，台湾佛教界就不欢迎我再回去了，他们对台湾佛教界的现况非常满意。

在计划着去纽约时，我明白了自己想要做的事，就是终生教授。根据所阅读的刊物以及赴美友人的传述，我知道西方的

佛教注重生活上的实用，因此，我做了这个决定。上世纪五十年代，铃木大拙（D.T. Suzuki）有关禅方面的著作及教学，在西方已有深远的影响。美国人需要禅修老师，他们对佛教义理没有特别的兴趣。我成为了禅师，因为禅法就是讲日常生活的修行。在美国，我的著述及开示，都是有关于禅的。而我所出版的中文书中，禅则只是其中一部分。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人们尊称我为法师，是教授佛法的老师。

致力于在美教授禅法的这个决定，来得很容易。我启蒙出家的寺院是禅宗道场。虽然我研究了不同宗派的思想与理论，但我的立场是禅宗，用意是希望了解这些经文论著，辅助禅的修行。

通透各宗派佛教义理的学者，如果不懂禅，充其量不过是个研究佛法的人，影响力有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不会明亮、透彻，不能放下自我中心，执著于己见，不能包容不同见解的人。

懂得禅的人可以包容每一个人，当他们看到别人时，不会觉得别人与自己有什么不同。他们可以接纳每一个人，也可以适应所有的环境。他们对禅的体认不拘于某种理论，也不会到处说："这是禅，这不是禅。"在禅的传统里，没有一件事与禅无关，也没有把禅与其他事物区隔开来。有些佛教徒会说：

"这不是佛道。"在禅法中，没有这样的事。禅超越一切的界限与阻碍。我不认为其他宗教人士和我有什么不一样。我吃饭时，他们也吃饭；我睡觉时，他们也睡觉，没有差别。

第十五章 吃苦

一个伟大的禅师，若没有经历物质的贫乏和精进努力，是不会有成就的。我最初出家的狼山寺院，有很多的护持者，所以非常富裕。但是寺里的小和尚必须接受三年的训练。妇女做的家务事，我们都必须学着做：清扫内外、种菜、缝衣服鞋子，还要煮饭。只有一件事不必学，就是生孩子。这种训练的目的是让我们去除骄傲，不要轻忽劳力工作者。和尚们要有心理准备，会到没有信众的地方，就像西方传教士一样，因此必须知道如何打理作务。劳力活动帮助学生安心，排除妄念、去除分别心或我执。如果只考虑自己或自身的得与失，寺院生活会变得艰难。如果不能定下心来，就会受苦。如果有平常心，寺院生活便是单纯的。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平常心就是最自在、最愉快的心。踏实地走一步路，胜过说一百句空洞的漂亮语。

在禅宗语录中，有许多著名的吃苦或做粗重劳力工作的故事。唐代有一位年轻弟子跟随着鸟窠禅师（道林禅师的别名）修行，师

父住在树上，徒弟则住在地上，为师父送水和跑腿。徒弟希望向师父习禅，以求开悟。六年了，师父没有教授他任何佛法，只是叫他跑腿。徒弟感到很沮丧，有一天，他告诉师父说他要走了。

"为什么要走？" 师父问。

"我来这里是学佛法的，" 徒弟回答："但我只是一直在跑腿，没有学到任何佛法，也不能开悟。所以我要走了，我要去寻找其他的善知识，教导我所需要知道的东西。"

"喔，佛法，" 师父说："我这里有一点。" 师父慢慢从僧袍里抽出一根松脱的线，吹向风中。就在此时，这名弟子开悟了。

当大觉寺的董事会在准备欢迎我的时候，他们心里也想着这则故事。他们知道我刚完成博士学位，怕我傲慢不逊，所以要我"吃点苦头"。

我不认为有此必要，我自小就学会了吃苦，可能他们并不知道。当我到大觉寺时，他们对待我像一般普通的出家人，没有把我当成法师。他们要我擦洗和整理寺中的房间。我把原来都是废物的地下室清理干净，变成一间教室和图书馆。我赤手空拳地把后院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没有助手，一切得自己来。其他的和尚都比我老，而且

戒长，没有帮忙。当一卡车的书从日本运来时，我想办法从码头搬回寺里，安放在地下室的图书馆中。在多年闭关后，我已习惯独立工作。

四周环境简陋，那时候的布朗区，到处都是像要倒塌的房子和空荡荡的建筑物。社区居民多是贫穷的拉丁裔和犹太人，很少有华人。这里主要是工业区及商业区。沉家桢居士买的这个寺院，原本是间邮局的仓库。我来时，这儿没有卧室，我住在地下室，一间黑暗、没有窗户、潮湿的房间里，好像住在山洞似的。我在墙上挖了个洞，让一点光线和空气进来。

其他的法师好多了，他们住在附近租来的公寓里，我是唯一住在寺中的人。没有讲经，没有权力做决定、管人或管钱。我住在寺中以接待访客，所以基本上只是个门房而已。

在大觉寺，每天的作息是很固定的。作为一个中国僧侣，不管你在哪里，每天的作息都是一样。我早上四五点起床做早课，吃早斋和打扫清洁。如果有英文课，我会去上课，如果没课，就整理地下室。如果有访客，我负责接待他们，累了便休息一会儿。因为这个团体不大，我的时间是有弹性的。午斋过后，稍事休息，然后清理房舍和道场。我常常单独一个人，因为白天来礼佛的人很少。如果有时间，我会打坐。我通常提前在下午五点前做晚课，然后用药石。晚上的时间则用来写作、

拜佛和打坐。星期六早上，我教一小群西方人和华人禅坐。星期六下午，为周日讲经布置场地，通常我们是请资深的法师来讲经。我必须打扫道场的里里外外。

由于我是住在道场的唯一出家人，除了行政工作由日常法师负责——因为他的英文程度比我好，其余一切都是我来担当。但这些整理寺院的杂务，并不会造成我的困扰，因为我把它当作是一种修行。

感谢沉家桢居士，我“吃苦”的时间不长。后来他提名我为寺院董事和美国佛教理事会的副理事长，并指定我为大觉寺住持。这真是特殊待遇，因为我在大觉寺的时间还不到半年，我不认为其他出家众会受到如此礼遇。

在大觉寺，我不会讲英文，起初并未造成太大的问题，因为我刚到时，大多数常来的信众都是华人。偶尔有些好奇的西方众会来，但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来到另一个国家，尤其我们全都在讲中文。假如华人看到一个西方众，他们通常都说：“老外来了。”我常常提醒他们，我们才是外国人，而他们是本地人！

我知道我想和西方众接触，此时令我回忆起与一位在日本教我禅法的老师——伴铁牛禅师的对话，当我向他表示担心到

美国会有语言障碍时，他给了我一个开示："禅法不是用文字教的。"

这句话帮助了我，即使我的破英文在多伦多弘法时遭到困难。在纽约，我指导禅坐，没有期望对学者和学生讲经授课。禅法的重点是直指核心，任何文字或口述都只是隔靴搔痒，目的是指导学生，帮助他们证悟禅法。必须要学生自己能离文字言说，才能明心见性。

禅宗史上有位著名的百丈怀海禅师，有一次弟子问他："你能教我如何修行吗？"

他回答："饿了，就吃饭；累了，就睡觉，不需要文字和语言。"

我们不要以为禅修者有很多秘密，或是他们做的事情都是神秘的。他们真实地生活，单纯不复杂，没有想太多，任何人都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菩提达摩来中国时，也不会说中文。历史上有一个和尚问赵州禅师说："我非常困惑，请您给我指点？"

赵州法师只是说："你喝粥了吗？"

弟子回答："喝了。"

赵州禅师说："那就去洗碗。"那弟子当下开悟了。

所以当我开始与西方众互动时，我用了类似的方法。碰到

学生求助于我，我会问他："你吃晚饭了吗？"

如果他回答："吃了！"我就告诉他："去洗你的盘子吧！"

我常常用这种方法和学生聊天，尤其是没有翻译时，因为我无法用英文讲述太多佛法，所以就把事情简单化。当学生问："是什么原因？"我会说："没有原因。"他们似乎也懂了。有一次，有人在电梯里问我："法师，什么是真实相？"我说："没这种事。"他回答说："太好了！"

我能表达的英文范围内，已可以回答很多问题。但沉家桢居士仍非常关切，他认为在美国如果不学英文，会非常不方便。他为我请了英文老师，并支付薪水，但我已经老了，近五十岁，学习语言真是不容易。记忆力不似年轻时，所以在超过三百小时的课程后，我喊停了。这不只是因为我变得非常忙碌，而且学费也实在太贵了，沉居士尊重我的决定，另外帮我找了一个课程较少的英文班。

有一天，有两个年轻人——法兰克林和彼得到寺里来，问我是否会功夫。

我说："会。"

他们问："你会什么样的功夫？"

"我会太极和少林拳。"然后，我告诉他们，我不教电影里

那种用身体打斗的功夫，我说："我教人如何运用心：首先要学习训练念头和稳定自心，那样才不会为人所伤。"

他们说："真棒！"

他们带了一些朋友来参加第一班的课程，一开始我不知道怎样教他们，尤其是我没有办法真正使用英语教学。我担心他们会失去兴趣，但我还是继续教下去了。我请一位学生王明怡帮我做翻译，他是纽约大学数学研究所的学生，饱受严重的头痛，跟我学禅坐后，他的头痛问题消失了。

我们禅坐课的时间是从周六上午到下午，每周一次，每次四个小时。刚开始时，我不知要做些什么，便去请教日常法师，沉居士曾送他去纽约上州的罗彻斯特禅中心向菲力浦・凯普楼（Philip Kapleau）学禅修。

我告诉日常法师："我曾在中国和日本很多寺院禅修，但不知道要在西方教什么，所以想知道凯普楼的禅中心怎么教？"

他说："非常简单，他们教数息，当学员能够熟用数息法，心沉静下来后，就可以参禅。"

我请日常法师帮我教学，起先他很勉强。我们谈了一会儿凯普楼的事，他在美国已成为知名的禅师，师父是安谷白云（Yasutani Roshi）。

"安谷白云的师父是谁？" 我问。

"是原田祖岳（Harada Sogaku）。" 他说。

我告诉他原田祖岳也是我在日本的师父——伴铁牛的师父。这说明了我是凯普楼的师兄弟，因为我们都是原田祖岳的后裔，这让我领悟到要如何教导西方学生。日常法师得知后非常高兴，并且同意帮助我。

依照他的建议，我们先教学员数息法，其他的尽量简单。我只给予学生几句简单的指示，没有其他的了。我没有课程内容，也没有特定的教学计划。

三个月结束后，只有几位同学还留下。他们在班上认真努力，而且对于方法和理念有很好的吸收。他们觉得找到了他们的老师。

法兰克告诉我，他将在中央公园参加一场功夫大赛。他问我："师父，当我比赛时，你可不可以坐在旁边？我会向所有的人介绍你是我的师父。别人会认为有师父在旁边，我不用打就能赢了。"

我觉得很有趣："要是你输了，他们会向我挑战吗？"

"没有人敢向你挑战的。" 他说。

我笑了笑，说："武术的最高境界是不需要用武器或摆姿势。当别人攻击时，你必须把自我意识放下，对手就不知道如

何攻击你。为什么？因为他们无从下手。这是无我、无心的道理。当自我中心仍然存在的时候，无论是进攻或防御，对方都能够侦察出你防守的弱点，并加以利用。如果自我不存在了，无物可防，无处可攻，对方就找不到可以攻击你的弱点了。"

法兰克和他的朋友注意听着，他们立志用功练习，以达到这种境界。

我告诉他们，"要达到这种境界，禅修功夫必须臻于完美。"

一些早期的、武术造诣颇高的学生，后来接受了警察训练，他们的认真学习让我很高兴，觉得自己有些用处。他们用单纯而真诚的心学习，我也以真诚心教导他们，所以他们全部都吸收了，结果全班都进步很多。

我成为美国东岸第一位教西方众的禅师。另一位教导西方众的，是西岸的宣化上人，他在加州创立了万佛寺，是美国最早的佛寺之一。他教授苦行法：坐卧和断食，为期一到三个月，很受西方人欢迎，所以有许多西方弟子。因为他的教法源自多方，所以最初在美国，并不被认同是禅宗，而他被归类于净土宗，因为他也教念佛。

在纽约，大家感兴趣的是日本禅和藏传佛教。禅宗里面以西岸的铃木俊隆（Shunryu Suzuki）和东岸的野荣道（Eido Shimano）最有名、最活跃；创立洛杉矶禅中心的前角博雄

（Taizan Maezumi）也很杰出。另外还有来自日本净土宗的一个小团体和韩国崇山大师（Seung Sahn）的信众。我与这些团体常有互动，因为沉家桢居士支持所有的佛教教派，并且邀请各宗派的大师来大觉寺演讲。

那时候的中国寺院集中于中国城，没有接引西方众，也不讲英文。他们的信众来自中国大陆、香港、越南、缅甸和台湾。有十多间寺院散布在中国城地区，这些僧众不愿意离开中国社区。然而其他的禅师——像前角、铃木和其他人都可以说流利的英文。在这些大师之前，铃木大拙已在美国为禅宗打下深厚的基础。

禅宗不涉入世间事，由来已久。自宋朝（公元九六〇～一二七六年）后，日本不再派遣僧人来中国读书。元、明朝时期（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汉传佛教开始衰退。清朝时（公元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年）皇帝信奉藏传佛教，使汉传佛教日渐式微。日本佛教学者宣称中国无禅师，这是不正确的。那只是因为中国禅师无法吸引外国学生来中国习禅，外界的人不知道中国有禅师。同时，年轻人几乎没有受到佛法的熏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完全没有正规的青年学僧教育。反之，日本却保有很优良的禅学教育系统，并未因大战而中断。藏传佛教也有完善的养成体系，而汉传佛教在这方面却

相当缺乏。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要在台湾创立佛教研究所的原因。

有人问我，禅宗在西方没有这么受欢迎，是不是因为它已与中国文化融合？我不这么认为。日本文化溶入日本禅，同样的，西藏文化也溶入藏传佛法。我认为中国禅之所以未能在西方广泛传扬，是因为到西方传法的禅师太少了。

因为受邀来美国教学，我有机会来到此地。一九七七年，我开始发行《禅杂志》，后来演变成季刊，邮寄到五十多个国家。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执行传布佛法的使命，我只是想与每个人分享禅法。我深信，如果有更多英语系国家的人接受禅的方法和观念，一定能够对世上其他的人产生有益的影响。不是要每个人都成为佛教徒，但只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禅法，不论身心是否健康或环境优劣，他们都可以快乐地生活。

第十六章 流浪

事实上，东初老人与我的因缘还没有结束。就在我开始担任大觉寺的住持时，他来到了纽约，那是一九七六年的事。他见到我在指导二十位西方弟子习禅时，感到很高兴，并且决定圆寂后，由我来继承他在台湾的寺院——文化馆。

“管理寺院就像酿酒，”东初老人说：“我给你的是发酵的酵母粉。所以，不要认为小小的文化馆对你来说太小了。如果你做得好，成功地开始酿制好酒，以后就有能力长期制酒了。”

中国人制酒是拿一团先前已发酵的米、麦子或玉米做酵母，来发酵新的作物。东初老人告诉我，文化馆就像那团酵母。

“别操心，”我告诉他：“我会好好照顾这个地方的。”

不久之后，东初老人圆寂了，那时我才担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知道自己的缺点愈多，成长的速度越快，对自己的信心也就愈坚定。

任大觉寺住持六个月。虽然我在纽约市布朗区已有了些进展，但我必须接受东初老人的托付。师父给了我一个使命，我别无选择，只有整装前往。

这个使命的意义在禅宗有着悠久的历史。马祖大师派遣超过一百位弟子去不同的地方弘扬佛法。他们赤手垦山建寺，即使是非常简单的建筑也得花上几十年。当信众日益增加时，寺院就会扩建。创建寺院的目的不是炫耀自己拥有大庙，而是履行责任，将佛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些努力使得历代禅宗祖师拥有自己修行的道场。

佛教的传法始于释迦牟尼佛时代，将教授佛法的责任传给后代，这种传承不像传授顶冠般简单。有些有开悟体验的人并未被选为传人，他们可能福德不够或不够善巧。禅宗强调宗谱传承的重要性，景德年代(大约公元一〇〇四年)的《传灯录》，详述了祖师们护法的责任，以及传法给后人的种种故事。这个过程称为“传法"，传承自释迦牟尼佛时代就存在了。

所以当我的师父传承给我的时候，我接受了。如果拒绝，我将不再是东初老人的弟子，他托付给我的宗谱也将中断了。儿子可以拒绝父亲的遗产，但在神圣的禅宗传统下，弟子不能拒绝师父交付的使命。

我必须说明，东初老人并没有真正“给予”我文化馆，寺

院的所有权属于董事会，不属于我。通过监管文化馆的未来，他给了我一份弘扬佛法的使命。

尽管我不需要垦山建寺，但发展文化馆有时候似乎也一样艰难。放弃了大觉寺住持一职，我回到了台湾，从原来居于优势而变成处于弱势。大觉寺因为有沉家桢居士雄厚财力和人际关系的支持，我从来不必操心金钱。当美国的信众知道我将返回台北接续文化馆的法务时，有人问：“为什么你要离开这个现成就可以弘法的大觉寺，而回到台湾去辛苦呢？”我如何能够向他们解释中国人“义务至高无上”的观念？我真的别无选择。

回到台湾，困难立刻迎面而来。我发现东初老人留下三种不同的遗嘱。禅宗祖师通常不留遗嘱，但是东初老人必须明确表白他的遗愿，因为在他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不在他的身边。如果我在这儿，他只需告诉我接替他的位置，继续为文化馆服务就可以了。

前两份遗嘱中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因为我曾经两次告诉他我不打算回台湾，一次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第二次是刚到美国的时候。但自从他到大觉寺之后，我们有了共识，由我来接管文化馆，因此在最后的遗嘱中，他加入了我的名字。

三种不同版本的遗嘱造成农禅寺董事与信众的困扰。放弃了美国安稳的职位，一味地返回台湾，只见到自己陷入争论、混乱和困惑之中，就像是东初老人派给我另一份矛盾的差事。“呵、呵、呵”有时候我似乎又听到了他迎风而来的惊人笑声。真是感谢，几个月后，问题终于获得解决，而我的职权也不再有争议。

文化馆还有一个下院——农禅寺，位于台北市的近郊，当文化馆进行改建时，大部分的活动逐渐转移到这里。农禅寺附近环绕着农地和小小的民舍，形成海岛背脊的山丘就在后方。寺院本身很小，只有少数信众，连生活杂支都成问题。我必须找义工来农禅寺帮忙，并设法募款。若没有更多的人来奉献时间、精力和金钱，这寺院将只能维持有限的营运，而东初老人以此做为安稳基点，进而扩展弘法的愿景，将永远无法实现。

我开始以在美国发展的那种教学方法，开设禅坐班并指导禅修。起初，我主要指导的是大专学生，禅修活动只能容纳二十个人左右，但他们口耳相传，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来到这里。有些当时的学生后来出家了，现在我们的团体中担任要职；有些人仍保持在家身份，变成农禅寺和我在美国、欧洲及台湾各地道场与学院的护法。

为了广揽信众，我必须像马祖大师的传人一样，扩充寺

院、增建房舍，因为有些并不符合法规，曾引起台北市政府的关切，但由于我们做了很多对台北的社会福利有贡献的大型慈善事业，情况才得以改观。

除了推广禅修，东初老人也要我提升佛教的教育。当我初抵台湾时，这里并没有为年轻人而设的佛教学院。正因如此，我才前往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学位在台湾是没有用的，因为台湾佛教徒不知道佛学博士有什么用途。日本的做法不同，他们派遣菁英去印度、德国、英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各个佛教团体会为这些学者增设职位，让他们发展大学等级的佛教教育课程。

我立志建立青年佛教学院来改善台湾的现况。一九七八年，我接受了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和佛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我也在东吴大学任教。我教的科目有华严、天台、净土、中观、唯识及禅学。这些教职让我在教育界立足，日后得以建立佛学研究所。一九八五年，文化大学因故不再续办，于是我将其迁至北投文化馆，创办了中华佛学研究所。现在台湾有十几所这类型的研究所。

在返回台湾继承师父遗愿的时期，我仍然与沉家桢居士保持密切联系。当他护持的译经院院长辞职时，我接替了这份工作，译经院搬到农禅寺来，沉居士仍继续护持。

可是在纽约，大觉寺需要帮忙。自从我离开后，僧众逐渐流失，没有人掌理寺务。沉居士期望我回到布朗区，重接住持，复兴该寺。我觉得对他有此义务，但却无法告诉他何时才能卸下农禅寺的责任，因为责任实在太重大，无法离开。

沉居士认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年长尼师。这位尼师没有自己的寺院，所以沉居士请她带着陪伴的女尼们住进大觉寺，此时我才得以辞去住持一职。

当我总算把东初老人遗留的诸多事务处理上正轨时，沉居士请我到纽约去弘法。但是，此行回去并没有回复以前担任的职位。大觉寺被尼师们住满了，没有房间可以给我。我住在沉居士位于纽约长岛的别墅——菩提精舍，往返于长岛与纽约市之间。我想搬出去，因为这样离学生太远了。沉居士告诉我："如果你搬出去，我就无法再这样好好照顾你了。"

"没关系，"我回答："我可以流浪。"

离开后，我没有钱付房租，只好睡在教堂前或公园里。我从三个曾经露宿街头的学生那儿学会如何过日子。他们教我从便利商店或超市后面，找丢弃的水果和面包。也教我打些零工赚点小钱，如替店家清扫或看顾咸饼摊。我发现我可以把随身行囊寄放在中央车站的寄物柜里，也可以在自助洗衣店里清洗

衣物。学生们指点我到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快餐店去过夜、休息及喝杯咖啡。

我流浪市区，一个身穿旧袈裟的和尚，借宿门廊，彻夜在咖啡馆中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为伍，或埋首在别人丢弃的水果蔬菜堆中觅食。那时我已经五十出头了，不再年轻，但是肩负弘法到西方的使命让我内心充满法喜。这些又算什么呢？东初老人给予我的训练，让我无论是住在大房间、小房间或教堂的门口外，都不再有差别了。

有些人或许会可怜我，我自己倒不觉得，也不认为自己运气差。有些人怕我，担心我会向他们要钱或求援。我决定最好是不向任何人求助，虽然我也接受了一些帮助，住过信众的公寓。浩霖长老也欢迎我住在他位于中国城的寺院里，但我不想打扰太久，因为不知道何时可以回报，因此我宁愿流浪。

这可能会吓到某些人，或者令人感到奇怪——我的僧侣道友怎么会让我离开而露宿街头。浩霖长老的寺院很小，收入不多。当我住在他那儿时，对他来说是个负担。如果他经济宽裕点，有大一点的住处，他的热情招待会使我感到好过些。

我觉得在街头流浪是件好事，因为它使我学会不依赖任何人，逼使我寻找道场，弘扬禅法。菩萨在弘法时必须忍受磨难，早有历史渊源。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要成为大修行者、

菩萨，必须不考虑自己的快乐和安稳，只求众生得离苦。在印度，佛教僧侣必须远去没有佛教的地方接受磨难。当他们来到中国时，儒教和道教是很有影响力的，当时儒教要驱除佛教，尤其是出家人。释迦牟尼佛相信，如果能够经得起磨难，就可以启发他人，并且影响他人。一般人只希望生活平顺、没有麻烦，但是佛教修行者抱持不同的态度，当他们度化他人时，已经准备受苦受难了。

如何忍受苦难？马祖大师教导我们必须拥有一颗平常心。这就是说，要经常保持平静、安稳的心，不受情绪左右。成功时，不要认为是“你”造成的，不要过于兴奋或自傲。成功是有原因的，是由许多人、事、环境成就的。如果你工作勤奋，但处处障碍，不能成事，或许就要放下。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沮丧，因为那代表因缘不具足。情况或许会变，或许不会。“你”不是个失败者，失望只会带来痛苦。

保持平常心，并非不动或被动。你仍然需要尽责任。虚云老和尚说：“空花佛事，时时要做；水月道场，处处要建。”这说明了这些工作虽然是虚幻的，但我们仍然要去做。虽然众生是虚幻的，但我们仍然要去接引他们。修行道场犹如水中月影，虽不真实，但是建立道场仍然能够度众。这是责任，必须尽力去完成，不要执著于成败。

禅宗祖师将平常心应用于生活诸事中。如果不是如此，就不是真正的禅师。在流浪的岁月里，我努力保持着平常心，我不把自己当成流浪汉。我想到天台山上的寒山大师，他以天为盖，以地为铺，以云为褥，以石为枕，以溪为浴；如果寺院中有米有菜，他就以此为食，如果没东西可吃，他就以根叶果腹。他自在安然，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句。

独卧重岩下，蒸云昼不消。
室中虽嗡霿，心里绝喧嚣。
梦去游金阙，魂归度石桥。
抛除闹我者，历历树间瓢。

当你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是自由自在的，一旦你拥有东西，就会被它羁绊住了。我非常快乐，不觉得自己没有未来。事实上，我反而觉得未来将会是丰富、远大的，因为我有学生，仍然有使命要完成，只是晚上不知道睡在哪里而已。比起那些无所事事、没有未来、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已经太好了。我知道自己不会流浪一辈子。

现在我的人生大不相同，我认识很多世界级领袖，也曾在联合国的大会发表主题演说；我的弟子中有高阶的官员、在中

国大陆和泰国也都受到贵宾级的礼遇，信众们对我很尊敬。人们认为如果不如此礼遇我是不对的，其实是否如此对我，并没有差别，即使今天我有知名度，但是当我不能再做现在所做的事时，我可能就会被遗忘。历史上有多少人能够留名？名，如同财富和权力，都是虚幻的。因此，人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保持平常心。

俗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果没有平常心，就真的是如此了。如果拥有平常心，无论在何种情境，都是自由自在的人。

第十七章

第一张佛桌

在流浪的日子里，沉家桢居士仍是尽可能地照顾我，他在位于纽约长岛北岸的杰佛逊港口有一间度假屋，叫做菩提精舍。他不住在那里，只用来做个人禅修或开会的地方。他慨然提供出来让我在那儿教学生，但管理维修此处的工作人员却对我很冷淡。他们认为我背叛美国佛教会和大觉寺，跑回台湾去当农禅寺的住持。我无法解释这不是我能左右的，师父圆寂了，我没有选择。

在菩提精舍的最后一次禅修期间，有位学员来得很晚，自己开门进来。第二天当管理员发现门开着，他拿着枪指着我，吼着说：“你们都是贼！下次再犯，当心我射杀你。”

后来我告诉沉居士：“虽然我们不对，但也不必拿枪相向。”

他回答我：“他在造恶业。”后来他把菩提精舍卖掉了。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多听多看少说话，快手快脚慢用钱。

唯有体验了艰苦的境遇，才会有精进奋发的心。

类似的情况也在他处发生。有一次我向大觉寺借些蒲团，那是我住在那里时亲手做的。执事派人来告诉我："我们不方便把蒲团借给你。"

"你们在用吗？" 我问。

他说："这是我们的事。"这次我没有告诉沉居士。

那怎么办呢？我认识的一位流浪汉，他有个朋友是位裁缝师。她非常穷，住在很小的公寓中。她有台缝纫机，如果我们能提供布料和填充物，她愿意免费替我们车蒲团。

在此之前，我经常认为："出家无家，处处为家。我不需要拥有自己的家。"但是现在我明白，为了弘扬佛法，培养好的修行人，还是需要有自己的地方。所以，拒绝出借蒲团的人还真的做了件好事呢！

我在街头流浪漂泊了六个月，那时是冬天，但我非常喜爱这份自由。天气寒冷，风很大。夜深了，四周静悄悄的，我紧裹着僧袍，游走于市区的街道中。这里常下雪，因此我称自己为"风雪中的行脚僧"。

我发现东西方有很多的文化差异，即使我尝试着去适应西方习俗，但实际上并不容易。我记得第一次在西方众的寓所

中用早餐时，桌上有面包、牛奶、植物奶油，没有别的了。我问：“怎么没东西吃？”

“这就是早餐，”我的一位徒弟说：“你怎么说没东西吃呢？”我们就这样开怀大笑起来。

衣服破了，我会自己缝补，徒弟们便送他们的破衣服来给我。

“你自己可以补。”我说。

“美国人不补衣服，”他回答：“我们都是买新的。”

我说：“你现在是出家人了，必须学习着缝补衣服，尤其是僧袍，不容易得到的。”

我试图教他们，可是他们总是把衣服留下给我。“你看起来很喜欢做这件事。”他们说。

后来他们终于肯学了。教导西方学生可真需要耐心。

在美国，我很幸运地接受过富人及穷人的帮助，可是在出家人那儿，却总得不到帮忙。流浪期间，我常常要求借住佛教中心，住持们会告诉我：“你是位大菩萨，我的寺院对你来说太小了。”如果我借卧了他的僧床，他要睡哪儿？如果不借，我就要睡在地板、沙发或椅子上吗？如果住持无法提供舒适的住宿给我，他将会遭人诟病。

住持们都是来自国外，必须奋斗才能生存。他们担心着如何在美国的佛教圈内保有他们的地位。如果我在他们的寺院待太久，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地位。有时候，外来的和尚借住一段时日后，会聚集自己的信众发起叛变，赶走原来的住持。

信众一旦发现原来的老师没有新来的好，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并非原来的不好，但当信众接触了新来的和尚之后，他们就不再支持原来的住持了。在中国大陆，禅宗的黄金时代——唐朝（公元六一八～九〇七）时，因为寺院很大，人人都欢迎。大师们有信心建寺，所以并不担心新来的和尚取而代之。现在，多半是小寺院，尤其在美国，寺院由个人经营管理，不属于任何大的团体。因此住持没有什么安全感。

我同情他们，也不打算与他们常住。他们是一般的出家人，有着与在家人相同的忧虑。有这种心态是正常的，不是每个出家人都已经放下了自我。

此时我才明白，自己必须拥有自己的禅中心。我的僧众或弟子们在我无家可归的时候，一直对我很忠诚，但我知道不能流浪一辈子，我们需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

我们找到一个在皇后区林边镇的公寓，月租金三百五十美元。我身上有七百美元，刚够付押金和第一个月的租金。我告诉沉家桢居士没钱继续付房租，他如同以往一样，善心地解决

了这个问题。

刚搬进去时，房屋内空无一物，连尊佛像也没有。浩霖长老把一尊备用的佛像送给我。我从街口捡回三块木板，制成一张桌子做为佛桌。

这真是快乐的一天，在我的第一所寺院中，为第一尊佛像制作了第一张佛桌。有位中国杂货店老板好心送我们花和水果，我们把它们放在佛桌上。然后开始从街上捡拾旧家具。有些当时捡来的椅子，东初禅寺到现在还在使用。我们找到叉子、汤匙和其他的餐具，不过没有筷子。

我到一位华人信众家中去，告诉他我们有一间公寓，需要家具，他送给了我一张桌子。

由于没钱买食物，大楼的房东，一位泰国人，从他的菜园摘蔬菜给我们。晚上我们会到市场去捡丢弃的蔬菜：例如芋头、马铃薯、高丽菜，它们样子不好看，却是可以吃的。同样地，我们也从面包店的垃圾中捡拾被丢弃的面包。

我心想，美国真是个好地方——随处可以免费捡到有用的东西！我的僧众大多数是穷学生。他们非常了不起。我们一起出外扫街。在这段不安定的日子里，当我忙着找地方安置弟子们时，那群弟子仍持续跟着我修行。有位学生在曼哈顿下城格

林威治村有一间仓库式的公寓，在那里，我带着大约二十五位学生修行。周六上午我们在那里上课。我们打坐，然后由我开示，在主人卧房中进行个人的小参。这个团体是后来帮助我成立第一个禅中心、出版《禅新闻》(Chan Newsletter)、《禅杂志》(Chan Magazine)，和成立法鼓出版社的核心支柱。

后来，弟子人数增多了，我们得到一些大额的护持捐款，足以付得出四万五千美元，购买一栋位在皇后区安姆赫斯镇可乐那街上的一栋小房子。那里以前是间工厂。这笔自备款中有一大部分来自沉家桢居士的慷慨解囊。他告诉我这算是笔借款。但是后来当我要还钱给他时，他没有接受。他说："如果当初不说这是借贷，你可能不会接受。那就写张捐款收据给我吧！"

我一直很感恩沉居士的护持，即使所有佛教联盟的人好像都在闪避我的时候，他仍旧坚定如一。像他这样的人很少，他不自私，不期待绝对的忠诚，尽管我离开大觉寺后，他对我仍然很好，从始至终没有改变。

时序渐移，我们的团体扩充了，学生多数还是西方人，但中国人也日益增多了。选择可乐那街这个区域，是因为房价比

较便宜。早期西方众的成员以大专学生为主，后来的中国信众则较为富裕。

可乐那街上的这栋建筑，原本是一所堆放着重型印刷机器的工厂。搬进去时简直一团乱，地板到处都是机油。我们没钱请包工或专业清洁人员，因此由弟子们自己动手清理打扫、涂油漆和做木工。每天，尤其是周末，都有人前来帮忙，也有很多人提供材料，如油漆、瓷砖、标识牌等。全力以赴了六个月之后，这里逐渐看起来有点模样，可以成为禅修中心了。

完工之前，我们已经起草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以后的禅中心将隶属其下。为纪念东初老人在台湾设立的中华佛教文化馆，我们也以此命名。

终于，禅中心在新的大楼内成立了，团体也稳定成长，定期举行打坐及禅修课程。我开始改进教学技巧和方法，逐渐形成了个人的禅风。

禅修教授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的中国禅法强调入定的修行，止心看静。修行者远离尘世，居住在山里或洞穴中，独立修行。

公元五八〇～六五一年，于禅宗四祖大医道信时期，才开始团体修行的方式，有的禅修团体甚至多达五百人。信众不再单独修行了。公元六三八～七一三年，六祖惠能大师再次改变

修行的方法。当他听闻《金刚经》经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后，开悟了。惠能大师之后，禅的修行变得非常有弹性。他教导的著名方法是"三无"——无念、无相、无住。如果能体认"三无"，便开悟了。从此以后，禅师告诉弟子们，倘若能够时时刻刻练习三无的态度，就不需要学习复杂的理论或修行方法。过去，禅师们通常除了责骂弟子们的昏沉和怠惰，不会给予什么真正的指导。"死亡就在眼前，"他们可能为了警诫弟子会说："生命无常，怎能终日昏沉，浪费光阴呢？"

后来，宋朝出现一位大慧禅师，他是唐朝临济禅师的传人，创立了话头禅法，教禅众默念一些表面不合理、甚至可笑的问题，例如："什么是无？"或"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或只是单纯的"无？"藉着专注于这个问题，以排除所有杂念，禅众的心变得更开阔、更了解三无的意义。

在此同时，曹洞宗主张默照的方法，使人清清楚楚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工作、走路都保持着全然的觉知，没有一点自我中心的执著。临济宗变成两者之中较具影响力的，默照禅由于大慧禅师认为它并非正确的禅修方法而因此声名受挫。大慧禅师是话头禅的拥护者，他并没真正了解宏智正觉大师的默照禅法，他认为默照导致心如黑洞。即使我现在致力于重振宏智大师的默照，仍有临济宗的人认为这是种误导的禅法。事实

上，默照与南传内观法、天台宗的直观法很类似，这就是默照禅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它吸引了很多对这些传统有兴趣的人。

我指导话头禅和默照禅两种方法，而且得到临济宗和曹洞宗的传承。我不认为何者较优，我尽力依照宏智大师传下来的原则去振兴默照禅。

弟子们通常会在禅堂里待上几年。有的听到一句话就放下自我中心的执著，有的甚至在禅堂开悟。但开悟的体验多数是在禅堂外发生的，当他们听到一个声响，或看到某件事情，突然引起强烈的反应，于是便开悟了。

我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去教西方人禅修，以符合在家居士的生活，这种方法适合那些只能够在寺里待上几天的人。我不赞同以前的禅修方法，不觉得要求他们立刻做到“三无”是可能的。我先教他们数呼吸，这是从我日本老师那儿学来的，它也被南传小乘佛教和中国天台宗所使用，尽管是极少数的人。

在美国，我把修心至“三无”的过程分成几个阶段：首先是集中心，然后是统一心，最后是无心。达到集中心，必须修行禅定，使心集中注意于某一点。但是我不真正教人入定。我告诉他们，当心念不再波动时，就达到集中心了。

下一步，是统一心，先是寻求身与心的统一。你不再感到身体是负担，非常舒适，不痒也不痛。感到身体像是棉花球，无重量地在空气中自由飘动。然后你不再感到身体的存在，身心与环境统一了。你也不再感受到与环境有主观与客观的分别，你与宇宙合而为一，没有时间、空间的感受，也没有任何极限。

最后一个阶段——无心，你不再把身体、心和环境看作是自己。你依然可以清楚地觉知你的心、身和环境，但不再有自我在里面。有一个关于禅的故事，有位学生问："在无心的状态中，数不清的现象在眼前呈现时，该怎么办？"老师答："红不是白，蓝不是黑，但都与你无关。"这就是说，你可以处理无数的现象，但是主观的自我与这些事物是没有主观和客观的对立。这是无住心。做你该做的，用慈悲与智慧的心，而不是用自我意识的心。最后这个阶段很难解释，没有证悟的人不能明白何谓"无住心"。

我的方法与中国禅堂中用的不一样。中国禅堂，除了在每炷香的禅坐之间，加入"快步经行"外，没有别的运动，在我的禅修教法中，除了快步经行外，还融合了南传的"慢步经行"。我也运用了印度瑜伽及中国的太极拳与按摩。西方人似乎很喜欢这种多元化以及动静参半的方法，他们有很好的

回应。

从早期在狼山开始，拜佛一直是我自己修行的重心，我也教学生拜佛。我一生中礼佛了多少次？难以计算。这种宗教礼仪，弯身屈膝，按着既定的步骤，低头直到脸贴至地面，然后起身，是极为有力的修行方法，虽然西方人在刚开始时会觉得有些困难。有些学生把佛前礼拜当成是种谦卑自我的练习，也有人则当成是在崇拜偶像。

藉由拜佛来消业的观念，也许对西方人来说是难以了解的神秘，因此我强调拜佛实际的利益是在于安定自己的心。对于无法安下心来的人，我教他们慢慢拜佛，充分体验身体上的动作。这样拜佛后，他们身体放松、安定下来，然后才可能进一步放松心情及调心。

唱诵和祈愿是我在禅修中教导的另一个单元。祈求的力量是心理学或科学所无法解释的。当我们祈祷时，心生产力量。以佛法来说，祈愿者与祈愿的对象好比钟与敲钟人，或镜子与照镜者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敲钟人，钟不会响；如果没有人站在镜子前面，镜子也不会反映。祈愿的对象，只有在人们对其有信心时，才会产生力量。基督教也是如此相信，唯有信者得救。就此一观点，佛教的信仰与西方宗教并无不同，信仰是祈愿的原动力。

另一个层次，禅的修行能够产生心力。例如，当母亲常想孩子的时候，孩子可能会觉得该写信或打电话回家了。他感受到母亲的需要，即使没有直接听到她亲口说。这种心力是遍行全球的，东方有，西方也有。而这仅仅是一个人的力量。试想当一千人齐诵大悲咒时，产生的力量可以引起巨大的反应，加速因缘的成熟，直到改变出现。

人们可以为购地建寺筹款而一起祈求，这个例子曾实际发生在我们为法鼓山——我们的道场和佛教大学、研究所购地募款的时候。这并不是观音菩萨使这些人有购地的意愿，而是称诵观音菩萨时，所产生的心力被引导出来的结果，当然促成这结果的因缘必须成熟，否则再多的人一起祈求也是无用的。

禅宗不鼓励个人藉唱诵来祈求某些特定的结果。禅师祈求某事，不只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了每一个人。例如，严重的旱灾来临，地面干裂，地方官员或许会请和尚求雨。和尚求雨得雨的例子很多，西方人认为这完全是迷信。这点我同意，可能纯属巧合，求雨得雨，其实只是刚巧下雨了，不管有没有人求雨。

然而我所做的和所教的，仍是不能以心理学或科学来解释。禅宗的开悟不能在实验室打造，也不能以机器去测量。开悟只有透过实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已经介绍了几种我指导学生的方法，这些方法的核心观念是因缘观——任何事物的生灭必有其原因。有些原因是我们知道的，有些并不知道。事情的发生有它的原因，如果我们不了解，是因为我们所知有限。

因缘法是佛法中最重要的义理。如果了解这点，就不会放弃，也不会强求达不到的事，或嫉妒别人、或恼怨自己。遇到障碍时，必须助长善缘，使成功的机会增加。虽然有些人修行很久，没有开悟，但是他们仍然觉得修行很有帮助，也很快乐。

我告诉学生不需想着开悟，因为其中的因缘不是我们可以完全理解的。我从一九七六年开始教禅，有些学生在跟我学习之前就开始修行，一直都没开悟。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知道因果是奥妙的，他们不会失望、过度兴奋，或充满骄傲。

在皇后区教禅的这些年，我从禅的修行者转变为禅师。禅师不是经由训练产生，也不是所有的出家人都能成为禅师。禅师必须符合几项条件：他们必须有见性的体验，必须十分明了佛法，而且能够清楚地解说，与人沟通良好，才能真正地触动他人，而且必须有一个教学的场地。

我一直到五十岁才成为禅师。在此之前，还在寻寻觅觅，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教学方法和具备老师的条件。一旦成为禅师，我必须妥善处理权力所造成的负担以及权威的影响力。纵观禅宗历史，禅师们知道权力只是尘世之物，必须有责任心地处理它。有些禅师因为修行不够好，沉溺于权力之中，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多数知名的禅师懂得如何处理名位和权力，有时甚至放弃它们！有个宋代的经典故事，一位正值盛年的禅师决定退休了。有个高官弟子思念他，于是前去寻找他。他来到一间颇负盛名的寺院，询问那里的出家众中有没有大修行人。

寺里的和尚回答："没有，我们都是普通人。吃饭的时候吃饭，睡觉的时候睡觉。"

"有人开悟了吗？"他问。

"说自己开悟的人，一定是没开悟的人。"和尚回答道："开悟是个人的事。"

后来，他在斋堂看到一位和尚，在为别人服务餐饮，看来很眼熟。他想不起来是怎么认得他的，就问执事的和尚："我觉得我好像认识他。他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名字，"执事的和尚说："他在这里待了一年多了，在厨房工作，也在花园施肥。"

“你觉得他是大法师吗？”他问。

“别乱讲，”他回答：“这里没有大法师。”

用斋过后，官员过去问这位眼熟、替人供餐的和尚。

“我在哪里见过你吗？”

这位和尚回答：“我不该说谎，可是也不该说实话，你可能认识他，但我不认识他。”然后就走开去做他的事了。

他的确是这位高官的师父，在辞去住持职位后，他到别的地方做着普通的工作。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对原来职位所拥有的权力毫无眷恋与执著。

第十八章 山中禅

在禅宗，闭关静修已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在中国大陆，曹洞与临济两宗在每年的夏、冬二季，各有三个月的时间停止对外活动，噤声禁语、打坐参禅。难得有在家人参加，不是因为不被允许，而是在中国的农业社会里，他们忙得没有时间或是无法腾出长时间隐居到寺院里。如果他们想要深入修行，可以出家。

此外，传统的禅堂一般都很小，无法容纳在家众，禅堂除了修行外，也是睡觉的地方。前方是打坐的空间，后边则放置被褥，也是大家晚上睡觉之处。法堂是听闻僧居清规及策励箴言之处，但难得真的会有人说法。

这些都改变了。今天，在家众踊跃地参加禅修，位于纽约皇后区的“禅中心”持续地成长，禅期增加，人数爆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可乐那街上的禅中心已不敷使用，我们决定要在皇后区外建立一个更大空间的禅修中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人生的目标，是来受报、还愿、发愿的。
人的价值，不在寿命的长短，而在贡献的大小。

心，地点最好是在乡间。

很幸运地，这些新增的信众是来自纽约地区的中国侨民，有一些对皇后区禅中心的发展很护持。这时，我在台湾的道场飞跃般地扩展，所以才有能力考虑在美国购地建道场。

经过了多次的寻觅，一九九五年，我们在纽约上州的松林镇找到了一处禅修的好地点。这原是片私人土地，后来成为“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夏令营。当我们看到这块地时，它已被女青年会弃置，许多房子已不堪修理了。但这片土地真是美丽，有湖、有林间小道，而且是寂然独立的。更好的是，除了一栋主屋、一栋餐厅之外，小山坡上还有间大的会议厅，正好可以做为禅堂。

这里离纽约市约两小时车程，位于象冈山脉（Shawangunk Ridge）南麓的山坡上，绵延起伏的丘陵地，是枫树、橡树和山毛榉的生长地，天然的小湖，是许多动物、鸟类、土拨鼠、鹿及黑熊出没的地方。这里充满了乡间景色，令人喜爱，而且在离纽约市区交通便利的范围内。不过也有一些问题，松林镇关切地税的收入，因为我们是宗教组织，免缴地税，所以我们告诉地方官员，愿意捐钱给镇上。我们未来的邻居看到我们是中国人又是佛教徒，也有意见。他们以为我们是神秘宗教团体，会举行奇怪的宗教仪式或施展什么邪术。我们客气有礼地

告诉他们，我们活动的本质是平和、宁静的，他们才渐趋软化了。最后终于买下这片土地时，我们快乐得不得了，丝毫不为破旧漏损所动。这些房子没有御寒建材、暖气不足、野鼠穿墙，然而这些都不能阻碍我们。那年冬天，就在那间原为社交厅的地方，我们举办了第一次禅七。

学员们似乎都能在这座松林镇道场的禅修中得到很好的利益，不过也有一些人面临了困境。我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能够一字不漏地记住我所教的每一件事。他每过一阵子就会从班上消失，我发现他对太太暴力相向而且吸食毒品。之后，他又会再次出现，来上课或打七，我问他怎么消失了一阵子，他回答说:“您的开示太有用了，我不觉得还需要更多。”我问他:“那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我就像部车，开了一阵子之后就需要进场维修。”

他的心确实曾经沉静下来，尤其是在禅期之后，他会停止吸毒；之后，他又会消失，再犯毒瘾。他的行为让我很伤痛，每一次他回来，我都试着劝解他，但不知如何才能真正帮助他。

如果他一直跟着我，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当他在用功修行时，一切无事，而不修行时，就靠不住了。他消失再回来时，在禅堂内是非常不安定的，而且很受折磨，不过禅修仍能帮助

他。最后，他再也没有出现了。

有一些学生苦于傲慢与狂妄的烦恼。曾有一次，一个学生问我："你是当今世上最棒的老师吗？"

我说："不是。"

他问："那谁是？"

我说："我不知道，或许现在我是你最棒的老师。"

他回答："既然你对自己是否是最棒的老师都没有信心，那我要另找高明的老师。"

几年后，他回来找我，说："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最棒的老师。有时会听说某个老师多高明，但是当我去上了他的课，并不认为他有那么好。"

另外有一个学生要求我帮他找个地方闭关六年，就像我当年一样，我没有那么做，他便对我非常失望。我告诉他，他还没有到不需要老师指导、自己修行的程度，况且能否找到闭关之所也不是由我决定的。我说："当年没人帮我寻关房，是我自己找的。"因为我没有鼓励他闭关，也没有帮他找地方，他很失望，就离开了我们的团体。

有几个人原本跟着其他传承的佛教老师学习，后来到我这儿来。他们离开原来团体的原因，是觉得原本的老师或团体不够好。刚开始时，他们虽然还保有原先学到的观念，但都很认

真，对我有信心。不过，终究我还是达不到他们心中的理想标准，他们变得具批判性，而且要我改变，甚至还要求我把其他一些人赶走。我不可能为了迎合他们的理想，改变我这个老师或这个团体。

这些人离开了，我们没有交恶或变成敌人，我也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气馁。他们只是要满足他们心中的理想，当我不再符合他们的追求，他们就继续到别处寻觅。他们来是好事，他们离开也是好事，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世间事就是这么变化无常。

此外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些东方系统的宗教团体发生了财务与性丑闻，媒体也广泛地报道。我的学生多数对我们这个团体有信心，相信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但有一些其他团体的学生前来查看。这一度造成了一些疑虑，不过没有人发现任何问题。

对这些事我处之泰然，女色与钱财是我一生中的两盏红灯，我总是小心翼翼。我以慈悲与智慧待人，而不是感情用事。

西方人非常热情，所以当我对他们好时，他们有时会有情感上的回应。不过我是个绝缘体，不导电的。即使他们带着情感与我互动，我是不受感染的。在西方，握手与拥抱是一般

的礼节。我会分辨握手是否合宜，有时我会拒绝。我不与人拥抱，美国女性喜欢拥抱，不过我认为有必要去拒绝。有一回在没有防备下，一个妇女意图抱我，自此之后，我就防备着她，不再重蹈覆辙。

我们的团体没有受到人际关系问题的伤害，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弟子们没有住在一起。禅期结束后，他们便各自回家。我们相聚是为了修行，这是很明确，也是唯一的目的。如果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或许也会出现人际关系的问题。

至于钱财，我不借钱给人，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私人的钱，即使有钱，也都捐给了“禅中心”。我也不向人借钱，如果我们需要钱购买产业，就向银行贷款，或募款筹集资金。这些原则使我们免于金钱纠纷。

我更试着不介入政治纷争。在美国，人们经常对政府发起抗议或举行反战的示威。越南的佛教团体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而抗议越南战争。我相信世尊的教诲，他关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有些弟子曾力促我及我们的团体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表明立场。他们指出，天主教会向来表现出鲜明的政治观点，而且天主教教宗在政治事务上也深具影响力。但是教宗还是不能制止战争的发生，也不能发动全球的天主教徒一次又一次地抵制战争。我的立场是：宗教团体最好不要介入政治。弟子们开

始时不能完全接受，后来也服膺了。

“禅中心”不多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有杰出的弟子们。果元法师跟随我最久，超过十八年。我们的关系是师徒，无论我到哪儿，他都跟随着我。他曾是“禅中心”及象冈道场的住持，现在是法鼓山禅堂的堂主。他协助我带领禅修，到世界各地旅行。我们的关系犹如父子般，一般的父子会起争执，但我们不会。

他感恩我的教导，我感恩他的协助，这就是师徒间正常的关系。我待他如徒、如友、如师。

我一直记得东初老人对师徒关系的开示，他说：“三分师徒，七分道友。”我不可能老是以对待弟子的态度来对待弟子，从他们的想法与经验中，我也在学习。我们是互为师徒，也是好朋友。

我遵行着东初老人的教诲。他曾说过：“师徒关系，犹如父子，亦如师生，也是道友。老师指导、批评、纠正弟子，但弟子的修行则是自己要负责。老师无法如母般忆子、忧子。老师只是带着弟子上路修行，弟子必须亲身走过这条路。”

有时弟子要求特别待遇，是会发生问题的。老弟子受益较多，是因为他们待的时间久了，并不是我对他们比较好。我平

等对待弟子，一视同仁。在人生最后三分之一的时期中，我终于决定以自己的风格和能力做老师及带领禅修，或许这种平等对待弟子的态度，是我在这最后二十五年间，弟子日益增加的原因之一吧。

我的身体向来羸弱，但在最后的这几年，我仍试图活得有生命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需要我，我就去；工作完成后，我就精力耗尽，整个垮下来了。在下一个任务来临之前，我需要休息恢复。医生告诉我，如果我不多休息，会很快死去。但每当工作来临时，我总觉得来日无多，必须善加利用时间，利益他人。在我还能工作的时候，我就必须工作。

第十九章 鼓震东方

当松林镇的禅修道场建设好了，我的心思就转向台湾法鼓山的建设。之前往返台湾的岁月里，我都在照顾农禅寺。我想在那里成立佛教学院，所以开始花较多时间停留在台北。

邻居起初反对寺院的扩建，不过我们仍进行着这项工作。后来，我们开始规划法鼓山的建设，那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除了寺院外，还有一所佛教大学及研究中心。有些当地的承包商希望取得工程，但是他们经验不足，也没有足够的技术来进行这么大的工程。最后，我们把工程交给了一间工程公司，再由他们把工作分包出去，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处理这些问题了。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过去已成虚幻，未来尚是梦想，把握现在最重要。

因为我们在台湾拥有一些地产，因此必须面对大众以为我们很富裕的形象，常被请求捐献土地及金钱的事情。我们试着解释，所收到的善款是教育建设基金，无论多崇高的理由，

都不能移作他用。我们举办活动，开办各种课程回馈乡里，这种社区关怀使法鼓山与当地社区的紧张关系得到了调和。

我领会到与社会各层面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性，包括地方民众、各党派人士、企业领导人、艺术工作者及农民们。我们的信众来自各层面，主要的护持者是普罗大众。我们对社会民众或政治团体没有偏颇，不会基于财务上的理由这么做。数以千计的台湾菁英人士参加我们的禅修活动，但我们不向他们募款。我的目的是要他们运用禅的方法和观念来帮助他们工作、利益他们的团体。这是法鼓山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我们的责任。

我训练弟子们向许多不同的人募款，如果我们的捐款来源只有少数一些人，我们只会与少数人建立关系，如果我们的对象是多数人，我们就能广结善缘。

我们的努力已经使法鼓山成为台湾重要的佛教团体之一，台湾的佛教团体之间，彼此并不对立，实际上我们经常有互动。中台山的开山惟觉老和尚，与我是同一个师父——灵源老和尚；佛光山创办人星云大师是东初老和尚的学生，与我有师兄弟之谊，而且和我是老朋友；证严上人是印顺长老的学生，而印老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先师东老是印老的师兄弟，所以我

们也算是源自同门。

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台山注重禅修；佛光山积极从事僧伽教育，并以出版刊物及电视传播弘扬佛法；慈济着重在灾难救济、医疗服务及教育工作。

法鼓山也做不少慈善及救灾工作，办大学及研究所，但以致力于佛教学术研究及教育著称，另外我们也致力于禅修方法和观念的弘扬。

我们提倡环保工作的方法非常多元，让大家能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落实，保持室内及室外环境的朴实与整洁，倡导在法鼓山及个人住家中过着简朴清净的生活。“礼仪环保”是人与人之间有适当的进退应对及礼仪。信众们穿着整齐，说的是柔软语、智慧语、慈悲语，对人有恭敬心、感恩心，不与人争执、冲突。我们也推行“自然环保”，不浪费资源。

最后一项是“心灵环保”：教育信众们用禅的观念和方法，帮助自己处理烦恼或情绪困扰，而不是让自己与环境处于对立状态。禅让我们打开心胸、接受现况、服务他人，并运用慈悲与智慧处理所有事情。

我期望禅的修行能实现人间净土的愿景——打造一个没有烦恼的地方。禅宗的净土思想与净土宗不太一样，后者是持诵阿弥陀佛圣号，期待投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个充满法喜与和

乐的地方。而法鼓山推动的禅宗净土，是在此世此地可以达成的，也就是自心净土。

禅修的观念与方法，不仅能帮助人们提升生活品质，还可以开发智慧与慈悲，减少困扰和愚痴。虽然我们仍是活在这娑婆世界中，但能不受环境、事物的影响，也不被烦恼、气愤、嫉妒、对立与挫折所折磨。世界上依然有地震、战争、水灾，但我们能以慈悲心来面对这些苦难事件。许多弟子们感受到烦恼减轻、智慧及慈悲增长，他们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转化了，这也是他们会继续追随我学习的原因。

法鼓山目前有五千多名的义工，有二百多位僧众，以我们团体的规模来看，僧众人数实在是很少，那是因为直到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培养僧众，但每年人数都有增加。

我投入许多时间在台湾的工作，也意味着在美国，中华禅的知名度无法变得像日本禅及藏传佛教那么高。我在美国的弟子无法团结一致，因为我经常要飞回台湾。我可能会带领弟子三个月，但之后就离开了。我离开之后，他们就没有人可以跟随、学习中华禅，因为其他在美国的华人僧众，只在华人地区发展，不会说英文。半年后当我再回美国时，英文生疏了，不容易吸引新的学生。西方弟子中最忠诚、最认真修行的人，是我来美国头两年带出来的学生，那也是我在美国停留最久的

时间。

如果我在美国一待就是十年，没有长期离开过，或许今天会有更多西方弟子。我的好友一行禅师就是如此，他在美国非常受欢迎。他在一九七四年离开越南，抵达美国，早我一年。他藉着诗与各种著作弘扬佛法，他的散文十分优美，很少禅师能像他一样有那么丰富的著述。

随着法鼓山组织日渐茁壮，责任与敌对也出现了。有句成语说："树大招风"，我们变成他人眼红的对象，因为我们壮大，拥有很多资源，有人因此想占我们便宜。但是我们用修行的态度、以慈悲心对待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嫉妒我们的人或投机分子。

第二十章 圆满

我自认是个世界公民，身为宗教师及出家人，我不属于某个民族或国家。我就像浮云一般，从一个地方飘到另一个地方。我的足迹踏遍全世界，地球对我来说感觉很渺小，每个地方都与其他地方相连。

如同俗谚所说："落叶归根。"这是说，当人老时，便想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所以几年前我回到了江苏——我出生的地方。

圣严法师智慧语录

智慧，不是知识、不是经验、不是思辨，而是超越自我中心的态度。

我的双亲早已不在了。母亲去世时五十多岁，父亲则是八十多岁，晚年过着独居的生活，就像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民一样，他们的子女必须挣扎着在贫苦中求生存。我清楚地知道，我如果留在大陆，不是离乡到外地谋生，就是无法在贫瘠的庄稼生活中挣得一分口粮，而必须到庙里做和尚。

即使我没出家做和尚，或者出于臆想，我真的想出办法留在养育我的父母身边，我也无

法对他们有什么真正的帮助。我观察到，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今天的社会，孩子们几乎照顾不到父母。相反的，父母却常常需要照顾孩子，即使到了他们的晚年也是如此。至少我不需要父母来照顾我。

我站在父母的坟前时，兄长告诉我，当父亲往生时，他完全不知道我在哪儿，因为离开大陆后，我们就断了音讯。父亲以为我已经在战乱中丧命了。当我凝视着他们的墓地，想到父亲在临死前，仍不知他最小的儿子还活着，我哭了，流下了惭愧和感恩的泪水。父母往生时，未能在他们身边，令我感到惭愧；对于他们给予我的一切，我感恩在心。

在父母墓前的悲伤逝去了，出家人必须把尘世的情感羁绊抛下，包括对父母、朋友及伴侣的情爱。我没有感情世界的牵挂，否则会造成苦恼，我对人仍有慈心、悲心，那是与有情众生的联结，如果一旦有了世俗的人际牵绊，我就无法好好做一个出家人，那会有问题的。

这几年，我的步伐开始慢下来了。我依旧每天早起打坐，在大殿做早课，之后我可能会去禅堂，早斋后我会阅读报纸，或者由我的秘书将网络上的新闻摘要念给我听。我依然备课，但不再个别指导学生，改由资深的弟子训练学生。

我花在行政事务的时间不多，只需要在重要的文件上签

名，或在特别的事情上给予指导。我经常向学生们请教，因为他们很多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多数的时间我是在接见访客，有些是重要的知名人物，有些不是。我不挑选访客，他们希望能得到我的指引，听闻一些佛法。

我现在年纪大了，需要午休，年轻时我每天不停地工作十六个小时，没有时间休息，那时候团体才刚成立，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完成，我可以勉强自己，但现在我需要慢一点的步调，有时我必须返回台北的处所休息，侍者及秘书会陪伴着我。

我尽量让自己接收新的经验、接触新的人士，才可以继续学习与成长。我特别喜欢“水涨船高”这句成语。

即使是在我的晚年，继续成长还是很重要的。我想起了大慧宗杲开悟的故事，他的师父圆悟要试他的悟境，给了他一本自己著作的唯一一份刻版，但大慧却把书给烧了。

圆悟问他：“你为何烧我的书？”大慧回应他：“猎人很难得有机会宰杀一头肥猪。”

圆悟大师很高兴地回答他：“我以前没那么胖，现在可是长了不少肉。”

大师很高兴看到他的著作被烧，因为他不用再继续教导那

些他已经知道、熟悉，已经在内心下过工夫的东西。所以你看，聪明绝顶的学生可以促使他的老师学习更多。我一直从我的学生中学习，他们使我的修行更深入。

时间过得真快，青少年、中年、老年就这么一一来临了。我相信我现在的内心世界一定不同于三十年前，但我无法确切地解释有何不同？我的禅修体验更深入了吗？我不知道。感觉到的唯一区别是，三十年前我拥有更多精力，我的身体也强健些。

当然，也有些其他变化，不过是很微妙的，现在我老了，我的想法、思维大多存在于心，内心安然自若。想要表达的事情不一定非要展现出来，有时是消融于自心。譬如以前我看到弟子们在禅修时懈怠，会用香板打他们，提起他们的精进心。现在当我看到同样的情形，就只会注视着他们，看看他们会不会觉察到自己不够精进。如果不会，我会在开示中提醒他们该如何做。或许是因为我的身体没有以前强健，心力也不如从前了。

我对女色、名利的反应也不同了。年轻时，看到女人，知道是女人，虽然我会持守戒律，不会触犯。现在女人和男人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同，都是人。我不需要再提醒自己：比丘戒律是不能触碰女人的。现在我对女人与男人没有什么不同的

反应。

我曾说过，女色与钱财是我此生的两盏红灯，现在这两盏红灯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我不需要去限制或阻止自己。以前我需要这两盏红灯去训练自心不受诱惑，现在这刻意的训练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已经内化于心。我已经够老，也已经习惯了。在我心中，金银与尘土没有差别，不过是物质而已。

回顾一生，我可以说从未刻意计划我的人生。年轻时未出家前，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即使在出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过出家生活，或出家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听说一间寺庙在找新人，而我没有其他的前途，所以就去了那间寺庙，出了家。

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我仍会是乡间穷人家的小孩，与我的兄姊或儿时的玩伴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在狼山的岁月中，我得到了人生的大方向——将佛法与他人分享。这个信念深植我心，即使在军中也未曾改变。

当我恢复出家身份时，国民党政府及高级官员都是基督徒，佛教是被遗忘的，我想改善这个状况，那也是我闭关的原因之一。那时没有学校接受出家人，但我想深入修行、阅读、写作、自学，充实自己，以期未来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也是我

去日本攻读博士的原因，这一切都是因缘促成的。我出过书，有朋友在立正大学读书，他们帮助我入学，纵使我连高中都没毕业。

我的生命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因缘际会：如果沉家桢居士没有请我去纽约布朗区的大觉寺，我不会因应西方学生的需要，而发展出禅修的教学方法；如果我没有研究这个修行法门，我不会来教禅法；如果我的师父没有往生，我没有回台湾，今天也不会有法鼓山这个团体在弘扬佛法。

我自认一生是非常幸运的。我有一个不变的原则：从来不让自己流于满足或陷入失望中。一帆风顺时，我不让自己志得意满；遇到困难、失败时，我不气馁。我会找到办法让自己走下去，当我走进死胡同时，我会转弯另找出路，继续保持前进，因为如果我停下来，就没有希望了。

那股往前的冲劲——无论遇到任何阻碍或困难时，都会继续下去，不放弃——成为我生命中引导我的动力。我现在老了，接近死亡，但仍看到面前的路，我不觉得我的工作完成了。

我不依恋往日的成就。人们给我荣誉，但荣誉不能吃，当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给我荣誉学位，校长说我不需要这个荣耀，我接受这个学位，是他们的荣耀。但我觉得很惭愧，自己

只不过是个非常平凡的人，不值得领受这份荣耀。我的成就并不是我个人的，是因缘际会的结果，我没有闪避，而心甘情愿去承担起来，因为我希望帮助人们离苦得乐。

我不邀功、不凸显自己功劳的态度，让我的弟子们有时会觉得失望。例如：李登辉先生在任内曾邀请我去他家中教禅坐。我的弟子们听说后，非常兴奋，因为“圣严法师现在是领导人的老师”。他们要散布这个消息，我说：“千万不可。”

我说：“你们不能这样想，因为我是个和尚。李先生只是听说我会教禅坐，而禅坐对身心有益，所以请我去教他。这有什么特别的？”当李先生竞选连任时，告诉大家“圣严法师是他的老师”。当我听到这话，我回应道：“我只教了两个小时，不是他的老师。李先生那么说是证实他对禅坐有兴趣。”

还有陈水扁先生在竞选市长连任失败后，前来看我。我送他一幅字，上面写着“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隔年他赢得大选，便把这副对联挂在办公室。当人们看到时又变得兴奋起来。我说：“那不是我的话，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佛法，陈先生把它挂起来是因为他有智慧。他的举止与我无关。”

我曾被问及生命中是否有后悔的事。我曾有过难堪的经验，难堪的事情也做了不少，但我没有后悔的事。当我犯错

时，我便会忏悔、承担责任，然后继续往前行。

最难堪的经验是我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当中国文化大学关闭佛教研究所时，我不应该有所批评，我诉请校长让研究所继续开办下去。校长对我说："法师，你是个出家人，不该执著于成败。"当时我真是羞愧。我是个出家人，但居然是这个在家居士教我佛法，然而这是个很好的经验，我学到了一个很好的教训。

相信通过我的生命，我能够帮助别人，也能够弘传佛法，但是我仍然认为，我就像是一个风雪中的行脚僧，哪里需要我，我就往哪里去。在台湾、美国与欧洲，我都成立了教授禅修与佛法的道场，在法鼓山也有很多信众。将我的生平故事发表是件好事，希望能有些用处。

现在，是该放下的时候了。

◎不要以富贵贫贱论成败得失，只要能尽心尽力来自利利人。

◎任劳者必堪任怨，任事者必遭批评。怨言之下有慈忍，批评之中藏金玉。

◎随遇而安，随缘奉献。

◎成功的三部曲是：随顺因缘、把握因缘、创造因缘。

◎见有机缘宜把握，没有机缘要营造，机缘未熟不强求。

◎人生的起起落落，都是成长的经验。

◎用智慧处理事，以慈悲关怀人。

◎以智慧时时修正偏差，以慈悲处处给人方便。

◎慈悲心愈重，智慧愈高，烦恼也就愈少。

◎面对许多的情况，只管用智慧处理事，以慈悲对待

人，而不担心自己的利害得失，就不会有麻烦了。

◎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

◎大鸭游出大路，小鸭游出小路，不游就没有路。

◎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

◎“精进”不等于拼命，而是努力不懈。

◎船过水无痕，鸟飞不留影，成败得失都不会引起心情的波动，那就是自在解脱的大智慧。

◎给人方便等于给自己方便。

◎甘愿吃明亏，是仁者；受辱吃暗亏，是愚蠢。

◎压力通常来自对身外事务过于在意，同时也过于在意他人的评断。

◎用感恩的心、用报恩的心，来做服务的工作，便不会感到倦怠与疲累。

◎随时随地心存感激，以财力、体力、智慧、心力，来做一切的奉献。

◎生命的意义是为了服务，生活的价值是为了奉献。

◎人生的目标，是来受报、还愿、发愿的。

◎人的价值，不在寿命的长短，而在贡献的大小。

◎过去已成虚幻，未来尚是梦想，把握现在最重要。

◎不用牵挂过去，不必担心未来，踏实于现在，就与过去和未来同在。

◎智慧，不是知识、不是经验、不是思辨，而是超越自我中心的态度。

◎积极人生，谦虚满分；自我愈大，不安愈多。

◎上等人安心于道，中等人安心于事，下等人安心于名利物欲。

◎你是有那些身份的人，就应该做那些身份的事。

◎在安定和谐中，把握精彩的今天，走出新鲜的明天。

◎担心，是多余的折磨；用心，是安全的动力。

◎财富如流水，布施如挖井。井愈深，水愈多；布施得愈多，财富则愈大。

◎面对生活，要有“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

◎只要还有一口呼吸在，就有无限的希望，就是最大的财富。

◎救苦救难的是菩萨，受苦受难的是大菩萨。

◎超越生老病苦三原则：活得快乐、病得健康、老得有希望。

◎超越死亡三原则：不要寻死、不要怕死、不要等死。

◎死亡不是喜事，也不是丧事，而是一件庄严的佛事。

◎每一个小孩，都是帮助父母成长的小菩萨。

◎对青少年，要关心不要担心，要诱导不要控制，要商量不要权威。

◎爱你的孩子，与其担心，不如祝福吧！

◎夫妻是伦理的关系，不是“论理”的关系。

◎能不乱丢垃圾，随时清捡垃圾，都是做的功德。

◎眼光，是你的智慧；运气，是你的福德。

◎喜爱的就想占有，讨厌的就会排斥，患得患失，烦恼就来了。

◎经常少欲知足的人，才是无虞匮乏的富人。

◎心不平安是真正的苦，身体的病痛不一定是苦。

◎明知心不平安是苦事，就赶快以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来安心吧！

◎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拥有再多也无法满足，就等于是穷人。

◎不要用压抑来控制情绪，最好用观想、用佛号、用祈祷来化解情绪。

◎慈悲是具有理智的感情，智慧是富有弹性的理智。

◎南北东西都很好，行住坐卧无非道；心中常抱真惭愧，忏悔报恩品最高。

◎修行人要开诚布公、真诚相待，不存邪念恶念，就是所谓的“直心是道场”。

◎当烦恼现前，不要对抗，要用惭愧心、忏悔心、感恩心来消融。

◎踏实地体验生命，就是禅修。

◎拥有身心的健康，才是生命中最大的财富。

◎呼吸即是财富，活着就是希望。

◎心里如果“打结”了，最好能向内观看自己的起心动念处。

◎被烦恼撞着了，此时最好享受自己呼吸的感觉。

◎心中有阻碍时，眼中的世界皆不平；心中无困扰时，眼前的世界都美好。

◎心不开朗就是苦，心境豁达就能转苦为乐。

◎生灭现象是世间常态，若能洞察生灭现象，便是智者。

◎把心念转过来，命运也就好转过来。

◎智慧并不只是通晓经典，而是要有转化烦恼的巧妙方便。

◎烦恼即菩提，并不是说没有烦恼，而是虽然有烦恼，但是你不以它为烦恼。

◎只要心平气和，生活便能快乐。

◎面对生气，要学会“反观自照”，照一照自己的心念，问一问为什么要生气?

◎操心就有事，放心便无事。

◎从自我肯定、自我提升，到自我消融，是从“自我”到“无我”的三个修行阶段。

◎要重视善因得培育，不要只期待美果的享受。

◎当你体认到自己的智慧不足时，智慧已在无形中增长了。

◎心要如墙壁，虽然不动，却有作用。

◎要做无尘的反射镜，明鉴一切物，不沾一切物。

◎当大家都在盲目地争夺之时，你最好选择另外一条路走。